

8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1962.7.12
 学术资料研究室藏

4-6

一九六二年

物質与场	黃友謀 (1)
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	杜 雷 吳俊光 (11)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認識是过程 (讀書札記)	刘 嶸 (17)
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别	李匡武 (25)
——評章沛的《論“邏輯眼界”》	
論僵化、碎片化、空洞化并非形式邏輯	
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郑毅男 (36)
——与章沛、陈政翔同志商榷	
論企业生产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	严克柔 (42)
略論社会主义国家銀行的作用	欧松江 曾祥才 王继造 (51)
略論朱执信的政治思想	张其光 (57)
論“民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階級地位及	
孟子政治思想	彭殷維 (64)
——与李蔭农同志商榷	
資本主义教育理論体系探索	杨荣春 (75)
我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	王季思 (85)
越南汉詩的渊源、发展与成就	黃軼球 (93)
黎族原始社会初探	王穗琼 (109)

动 态

- 广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关于部分質变問題的討論 (10)
- 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討論黎族社会性質問題 (16)
- 中山大学举行第五次 (文科) 科学报告討論会 (24)
- 广东历史学会决定有計劃地繼續开展关于社学問題的討論 (74)
- 陈汉标教授論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問題 (92)
- 华南师范学院举行第五届 (文科) 科学报告討論会 (120)

物质与场

黄友谋

“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

——列宁

自然科学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它首先必须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否则，自然科学便失去它的研究对象，失去它的存在价值，同时，科学也就不可能成立。自然科学的这三条“承认”，是有无数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思维实践做根据的根本前提，绝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

物理学是研究无机物质及其运动的基本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虽然近年来有象“生物物理学”那样边缘学科的出现，但是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还是没有改变。由于无机物质是物质中最低级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形式，所以在现阶段来说，物理学上所反映的物质概念，本质上可以代表整个自然科学的物质观。但是我们知道，物理学上的物质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提高和加深，而不断地提高和丰富它的内容，同时也更趋于真实。例如，在十九世纪初期，人们认为惯性质量是物质的唯一标志；并且认为物体是由无数多的物质原子集合而成，这些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弹性球体。到了十九世纪末，人们便发现原子是带有电性结构的微粒子，并不是不可分割。于是又产生了正电和负电才是物质的本质的想法。

从上面所说便可以了解，物理学的物质观由于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必然使得它是不全面的。虽然这样，只要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科学家一般是能够认识到的），不要把这些物质观看死了，更不要把某些物质的属性（如惯性质量等）拿来代替物质的全部内容，那么，由于这样的物质观是在人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各个阶段中经过较普遍的检验的总结，虽然因为要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全面，但对于科学的发展也能够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不过在这里必须指出，许多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和从科学园地跑出来一脚踏入哲学领域的“科学的哲学家”，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利用物理学在某一阶段反映出来的物质概念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服务，提出类似“物质消灭了”、“电子有自由意志”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谬说。列宁在他光辉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对这些谬论给予无情的反驳。他在这本

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粉碎了唯心主义哲学家、机械唯物论者和马赫主义者等对于物理学上所反映的物质概念的歪曲。当列宁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保卫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保卫了哲学；而且同时也保卫了物理学，保卫了整个自然科学。

列宁的物质观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第五章中有詳細的論述。他說，物质这个概念在認識論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識并且为人的意識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別的东西。”（第276頁）又說，物质的唯一的‘特性’——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認这个特性分不开的——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之外”。（第275頁）列宁提出的这一物质观，不但有效地堵塞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企图歪曲利用科学上有关物质属性的任何結論为他們的哲学观点服务的途径，而且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它不但为日益发展的近代科学不断地証明它的正确性，而且在物质科学的研究上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指导作用。

现代物理学的物质观便是按照列宁所指引的道路发展的。这特别表现在量子力学处理所謂物质的粒子和波动二重性的矛盾問題上。什么叫做粒子和波动二重性呢？这是指象电子那样微小的所謂微观粒子，它不但具有过去所謂物质微粒的性质：例如，有一定的、不可分割的靜止质量和电荷，可以用螢光屏或計数管等适当的装置来一个一个地計算它們的出现等；而且还象光波或电磁波那样，具有波动的性质：用适当的装置可以叫它显示干涉、衍射等现象。最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一种实验装置可以同时检查出电子的这两种特性：当它在某一实验条件下作为波动出现时，它的粒子性便被掩盖了（正确地說，应该是粒子性沒有了）；在另一实验条件下，当它以粒子的身分出现时，它的波动性又消失了。我們知道，在量子力学以前的所謂古典物理学上，粒子和波动这两个概念是矛盾对立的，而且这个矛盾又被認為是不可克服、不可調和的。換句話說，古典物理認為粒子不可能是波动，同时波动也不可能是粒子。这正和輪船不可能是海浪，同时海浪也不可能是輪船一样，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命題。假如有人說，他看见一件东西，有时象是一条船，有时又象一片茫茫的海浪，我們便会毫不迟疑地断定他不是錯觉便是活见鬼。当然，有时是船，有时又是海浪的“鬼”是不存在的；可是有时是粒子，有时又是波动的电子却是科学的实在。不但电子有这样的二重性，所有物理学上叫做微观粒子或基本粒子的东西，例如中子、質子等都有粒子和波动二重性。

在理論物理学上怎样把实验事实所要求适用于同一对象上的这两个矛盾概念統一起来呢？沒有談这問題之前，先讓我們談一談现代物理学上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关于场的概念。

二

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虽然沒有物质这一概念那么古老，但是，在相对論和量子力

学以前，场的概念就已被提了出来，表示某种物理状态在空间或物质中的函数分布。例如，流体中的每一个点，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它联系着，因此我们便说流体中存在着速度场。在古典物理学中，有两种基本的场和物质密切相关着，这就是重力场和电磁场。

重力场又称为引力场，是有质量的物体在环绕它周围的空间产生的万有引力的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的时候，是假定它传播不需要时间，即是靠所谓“超距作用”来传播的。因此，在环绕物体的空间，虽然万有引力按空间各点离开物体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例地分布着，但空间本身却不参加作用（所谓牛顿的绝对空间）。因此，按照牛顿的思想，重力场虽然是由物质所引起，但场本身却是毫无物质性的。

在古典物理学中，电磁场是被认为由电场和磁场迭加而成的场，而电场和磁场原来是各被独立发现的。实验证明，静电力和磁力皆与万有引力有同一的表现形式，在空间或介质中按所谓反平方定律来分布。所以电磁场最初也被认为是靠超距作用以传播的场。

一般地说，自然界一切作用和状态的传播总是通过某种媒介物（介质）来进行。物理作用或状态又往往在介质中用波动的形式以一定的速度传播。这种传播的方式叫做“接触作用”。和超距作用相反，接触作用这一传播方式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例如，水波在水中传播，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接触传播。由于接触传播是自然界所习见的传播方式，因此，不需要任何介质而且不需时间传播（即传播速度无穷大）的超距作用，在物理学上是不可以理解的。

到了十九世纪，英人法拉第和麦克斯威才首先认识到环绕带电体、电流或磁极周围的介质是担负着电磁现象的场所。麦克斯威从这一思想出发，并根据法拉第等所得的一系列实验事实，建立了古典的电磁场理论。根据麦克斯威的理论，电磁场和光本质上完全相同，它们都以波动的形式在一种叫做“以太”的假想介质中传播。在只有以太存在的真空中，电磁波和光波的传播速度相同，都是每秒三十万公里。

传播光波和电磁波的以太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它不可能是普通的物质；也没有任何实验可以证明它的存在。古典电磁理论要求以太应该是一种弥漫宇宙间无所不在的非力学性的介质，因此它只能是牛顿力学上的“绝对空间”本身。

把科学上不可理解的概念“以太”，用同样不可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绝对空间”来代替，这在实质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科学问题推到形而上学上边去。这样做，对科学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爱因斯坦在他提出的特殊相对论（1905年）中，便从理论上否定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存在，赋予空间以“以太”的机能，叫它做“物理空间”。这样一来，空间便不象牛顿的绝对空间那样，仅仅是物理现象在那里演出的舞台，空间本身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担负起传播电磁场的任务。物理空间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科学首次给空间赋予了物理的实在性，指出空间和时间并不是象康德所说的什么主观的先验形式。后来，敏可夫斯基把爱因斯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空间时间四维连续体，称为四维空间或“时空世界”。

相对论把电磁场和重力场先后进行了非古典的分析和处理，在时空四维世界中展开

了自己的电磁场理论和重力场理论。在相对论的电磁场理论中，把麦克斯威只能在三维空间内加成为电磁场的两个场，电场（向量场）和磁场（张量场），融合成为一个四维空间的张量场，即电磁场。所以比麦氏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概括。

相对论处理重力场问题是在特殊相对论发表之后十年(1915年)提出来的一般相对论中进行的。本来，特殊相对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认为一切物体的运动和场的传播，它们的速度都不能超过光在真空中的速度。这已明显地暗示出牛顿万有引力的超距作用（传播速度无穷大）是不合理的。所以在一般相对论中，把重力看成是四维空间（李曼空间）由于物质的存在而引起的弯曲，这弯曲也是以波动（重力波）的形式用有限速度传播。这样，空间又承担起传播重力场这一个积极的使命，同时又消除了不合理的超距作用。

相对论的最大成功，除了它给空间赋予物理的实在性之外，它还把古典物理学（指以牛顿力学和麦克斯威电磁学为基础的旧物理学）上看来好象不相关联的概念融合在一起：如时间和空间，质量和能量，电场和磁场等等。所以相对论是一个概括性很大的理论体系。但是在这里应该指出，它并不是象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追求的所谓一元论。首先，在相对论的电磁场理论中，仍然和古典电磁理论一样，还是不能够用场的量来表征电子或其他带电粒子，因此它不是一元的“纯场论”。其次，在相对论的重力场理论中，虽然成功地用场的概念表征出万有引力，但对于物质的原子性本身也还不能用量来表征，所以也不是纯场论。因此，相对论一方面承认了场的物理实在性；同时又必须在另一方面承认电子、物质的独立性——虽然它们和场有密切的关联，甚至是场的源泉，但是却不能从场产生电子和物质。再其次，相对论在更大的问题上也脱离不了二元论的性质：虽然长时期来，经过爱因斯坦、威尔（Weyl）、卡路查（Kaluza）等许多人的努力，想把电磁场和重力场融合成为一个场，建立所谓“统一场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使人满意的结果。所以在现阶段，相对论必须承认在微观世界仍然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独立的场：重力场和电磁场。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量子场论（后述）以前的所谓古典场论，虽然明确了场这一概念在物理学上的重要和它的客观实在性，但是还存在着下面两个问题没有解决：

（1）用量来表征物质原子性的所谓纯场论的建立；

（2）把电磁场和重力场融合起来的统一场论的建立。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看来是和进一步探索场的物质性，从而在理论上将场作进一步的物质化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在处理微观粒子和场的相互作用的量子场论中虽得到了初步的成功，但这成功只是局部的，不彻底的。所以总的说来，上边所列的两个问题，不管在宏观方面或在微观方面，现阶段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解决呢？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应该说，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过这解决一定是有条件的和阶段性的。这即是说，当旧的矛盾解决了，理论前进了一步的时候，

在新的阶段又会有新的矛盾出现，要求理論去解决新的問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說：

“人們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頁）的重要意义。关于解决問題的方向和方法，和量子力学、量子場論和基本粒子有关方面将在下面几节中提到；至于一般的方法，就不在这里談了。不过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用一种类型的場来概括所有其他类型的場，或者把总结某一水平（例如宏观水平）的場論无条件地推广到更高水平（例如微观水平）去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因为这样做是企图用局部去概括整体，用初級概念去包容高級概念，从辯証法的观点來說，显然是不会得到成功的。

三

讓我們在本节談一談前节提到的，量子力学（或叫波动力学）怎样解决物質的粒子和波动二重性矛盾的問題。原来，量子这一物理概念远在量子力学建立（1926年前后）前25年（1900年）就由德国的物理学家蒲朗克提出来，成功地說明了古典物理学无法解决的所謂“黑体輻射”問題。后来更进一步地說明了一系列用古典物理概念不能說明的实验事实，如光电效应、固体比热、綫光譜和原子結構等，获得异常的成功。量子論的思想是認為在微观现象中，能量的交换和传播是以叫做“量子”的能量顆粒的形式不連續地进行；古典物理学上認為是連續性的光波和电磁波，都是由叫做“光子”的量子組成的。所以量子的概念是和古典物理学中能量的連續性这一概念不能相容的。但是，当量子概念引进物理学中說明上边所列举的那些問題时，所根据的理論还是古典物理学的理論。因此，一般称这一段时期的量子理論为古典量子論，或簡單叫做量子論。古典量子論的做法是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这样便必然会使理論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所以当它碰到更复杂細致的問題时，便显得无能为力。这样便迫使物理学家非在理論上找寻新的出路不可。

1924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認為，既然古典物理学認為是波动的輻射、光波、电磁波都可以看作是顆粒性的量子；为什么不倒过来設想一下：古典物理学認為是粒子的电子和其他的微观粒子也可以看作是波动呢？这样做，可以使人們的思想摆脱古典物理学在粒子和波动两个概念間設布下来的那些框框，对于克服矛盾，找寻新的理論有很大的好处。因此，他便提出了电子波的假設。这假設后来便被实验所証明，真的发现了电子波。一个和古典物理学完全不同性质的新的理論体系——量子力学便这样地建立了起来。

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物質世界的有效的理論，它把物質的粒子和波动二重性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用高一級的概念“状态”或“波函数”統一了起来，解决了古典物理学无法处理的对抗性矛盾，提高和深化了人們对物質和微观世界的認識。

量子力学是怎样解决矛盾的呢？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所謂粒子和波动二重性矛盾的

性質及其產生的原因。只要我們仔細檢查一下有關的實驗操作和實驗結果，我們便可以發現：證明光子或電子等是粒子的實驗（例如光電效應和密勒根的油滴實驗等），不外是說，光是以一定的能量為最小單位，一份一份地被發射、吸收和傳播；電子被發現時總是帶有一定的質量和電荷等等。證明光子或電子是波動的實驗不外是說，發現光或電子用適當的裝置可以使它們呈現干涉或衍射現象，顯示出它們在空間具有“位相”。由於古典物理學描述宏觀物質現象時，可以分別用粒子和波動兩個力學概念（也可以說是機械模型）來相當正確地反映出上述兩類實驗所顯示出來的客觀現實；因此，在處理微觀物質現象時，便把這兩個概念作了不應該的過分的推廣，把它們也套在微觀粒子上邊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盲目的理論飛躍，是形而上學的獨斷。這便是產生所謂粒子和波動二重性矛盾的主要原因。所以，現在事實擺在面前，在客觀世界確實存在着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動性的微觀物質形態時，人們必須面對事實，老老實實地接受它，根據和它有關的實驗事實來考慮理論問題。

量子力學中所說的状态或波函數是微觀物質世界存在的客觀實體的數學表象，它不可能用古典物理學的語言和宏觀的模型來表達清楚。但是，人們對微觀物質世界的認識却首先非通過宏觀的觀測不可；而且物理學上的已成概念又都是描述宏觀物質現象時所用的概念。因此，在描述微觀粒子的理論中，又必然要和古典概念和宏觀模型打交道，要和它們發生一定的聯繫。量子力學中所謂海森堡的“測不准關係”可以看作是使用宏觀物理量去描述微觀粒子的可能限度，同時也是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聯繫的紐帶；而量子力學便是在原子的水平內無矛盾地表達了微觀粒子的状态和觀測量（也即是宏觀物理量）間的關聯的數學體系。這裡有一點必須指出，海森堡的測不准關係只是說明在量子力學上用宏觀物理量表征微觀物質時的限度。如果把它看成是人類認識微觀物質世界所不可逾越的界綫，那是錯誤的。量子力學本身沒有任何權利作出這樣的形而上學結論。如果我們這樣去解釋海森堡的測不准關係，其結果，不是把這“界綫”以外的領域計給無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去占領，就是自陷於不可知論的深淵中去了。

根據測不准關係，表征量子力學系統的状态的力學量中，存在着某些成對的所謂共軛量。在每對的共軛量中，如果決定其中一個量愈準確，則同時決定其他一個量便愈不準確。例如，粒子的坐標（位置）和它的動量（速度）便是兩個共軛量。測不准原理指出，如果我們想要準確地決定粒子的位置，則不能同時準確地決定它的速度。這種情況可以形象地表達如下：即是說當我們把微觀粒子的状态，通過“觀測”這一宏觀的投影作用，把它投射到只能顯示它的粒子性（位置）這一面宏觀屏幕上時，它的波動性（動量）便看不清了；反過來，如果把它投射到只能顯示它的波動性的另一面屏幕上時，它的粒子性便模糊了。由於宏觀世界的制約性，能夠把微觀粒子的状态同時、同樣清晰地顯示成粒子象和波動象的宏觀屏幕是不存在的。這樣一來，主張微觀物質的粒子和波動二重性有矛盾的根據便消失了。因此，我們可以說，量子力學的波函數是解決粒子和波動兩個矛盾的現象形態的數學表象，它比古典物理學上的粒子或波動帶有更本質的意

义，更能反映微观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

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物质世界的描象的正确性，不仅因为它能够解决物质的粒子和波动二重性的矛盾，和统一说明了古典物理理论无能为力的事实（如原子光谱和分子结构等），从而提高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固体物理学、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甚至生物学等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愈来愈广泛和愈深入的应用，对人类改造物质世界和发展生产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有关原子能、半导体、量子放大器等最新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发展，都是和量子力学的应用分不开的。

四

量子力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它也和科学上所有的理论一样，决不能是一个完全无缺的理论。量子力学原来是在研究原子的稳定性和光谱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粒子的运动速度较光速缓慢的前提下构成的理论，所以这一阶段的量子力学又称为非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但是微观粒子的运动速度有许多是接近光速甚至于等于光速的。因此，把特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便成为微观物理学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1928年英人狄拉克（P.A.M.Dirac）提出的电子理论便是属于这方面的最初的工作。狄拉克的电子理论是在满足特殊相对论（速度接近光速）的条件下，用量子力学去研究电子运动的理论，它说明了谱线的精细结构，引导出电子的自旋，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且为后来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电子本来是古典粒子，在量子力学中赋予了波动的性质，成为量子化的物质粒子。狄拉克的电子论便是把电子看成电子波的场，用场的概念去描述电子的理论。和这恰恰相反，在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又把辐射场、电磁场等原来是经典的波动场，赋予粒子的性质而成为量子化的波，用所谓场量子（在这一情形下的场量子是光子）去描述带电粒子和电磁场的相互作用问题，建立了辐射场和电磁场的量子理论，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量子电动力学。

狄拉克的电子论和量子电动力学是今天量子场论的基础。量子场论的思想认为场必有粒子伴随着，这粒子叫做场量子，电磁场的场量子便是光子；反过来，像电子等所谓物质粒子也可看成是伴随电子波场的场量子，这即是说电子波场的场量子便是电子本身。所以量子场论是把麦克斯威电磁学和相对论中的古典场的概念进一步地物质化，从而企图把物质和场的二元论加以一元化，将物质和场统一起来的理论。

在量子电动力学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理论计算中有许多地方出现某些物理量（例如电子的质量、电荷和自能等）成为无穷大的项，这显然是没有意义而且也不符合事实的。这个困难叫做无穷大困难或发散困难。后来，许温格和朝永（Schwinger—Tomonaga）等成功地使用了重整化理论克服了这一困难。许温格等的理论不但使量子电动力学摆脱了无穷大的阴影，而且在证明场的物质性上也起了重要的作

用。因为后来兰姆和勒色福 (Lamb—Retherford) 利用微波技术观测出氢原子中电子的能级和按狄拉克电子理论计算的结果有很微小的差异, 而这个叫做兰姆移动 (Lamb shift) 的微小的相差, 却恰恰和根据重整化方法把电子质量看作是场的反作用所产生而计算所得的数值完全一致, 这可以看作是场的物质性的重要证明之一。

量子电动力学的成功同时也暴露出物质和场的矛盾与量子场论本身的缺陷。这种矛盾和缺陷, 当用量子场论的方法来处理原子核力、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等所谓强相互作用问题时更加显得突出。

为了解决原子核内核子 (中子和质子) 间的结合力问题, 1935年日人汤川秀树提出了一个有静止质量的核力场量子的假说, 这个场量子的存在后来被证实, 而且现在还可以人为地在加速器中产生出来。核力的场量子现在叫做 π 介子。 π 介子有三种, 其中两种带电, 一种不带电, 它们都有一定的静止质量 (约等于电子质量的 270 倍) 和一定的电荷 (等于一个电子的电荷)。它们都是自旋等于零的玻色粒子 (Boson)——这是场量子的特征。电磁场的场量子 (光子) 是自旋等于 1 的玻色粒子, 但没有静止质量, 也不带电。所以 π 介子的发现不单标志着场论应用于核子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初步的胜利, 而且有力地表明了核力场所具有的强烈的物质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由于实验装置和实验技术的飞跃发展, 除了战前已被发现的一些所谓轻粒子 (正、负电子, 正、负 μ 介子, 中微子), 核子 (中子, 质子) 和作为场量子的光子和三种 π 介子外, 还发现质量约等于 π 介子的 3.5 倍的一系列的 K 介子和质量比核子还要大的一系列的“超子”。轻粒子中的中微子原来是为说明 β 衰变现象而提出来的质量等于零 (或差不多等于零)、电荷也等于零的假想粒子, 战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此外还发现象正电子和负电子那样, 伴随这些基本粒子成对产生或湮没的一系列的“反粒子”, 如反质子、反中子等。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基本粒子 (包括它们的反粒子) 的数目已超过了三十种。这些基本粒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 (特别是战后发现的那些所谓“新粒子”) 都是不稳定的, 在它们产生后平均经过百万分之几秒有些甚至于千万亿分之几秒便自行衰变或互相转化。基本粒子的衰变和相互间的转化表明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之间、物质和场之间的变化运动, 同时表明基本粒子并不“基本”, 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和上述在实验上许多新事实被接二连三地发现这一情况相反, 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的理论却远远地落后于形势。在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曾经发挥很大作用的量子场论, 在处理基本粒子间的强相互作用时, 显得软弱无力, 所谓“无穷大困难”依然不断出现, 在许多情况下重整化的方法不再能解决问题。虽然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场论和数学的处理方法, 包括近年来风靡各国的色散理论在内, 对于基本粒子 (特别是新粒子) 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它们的许多特点, 除了作局部的和唯象的说明外, 很难建立一个统一的基本粒子理论。这是现阶段基本粒子理论的情况。

打开这一困难局面的途径，一般說来似乎有两条：一条是找寻新的理論武器——新的数学或处理方法；另一条則是提出新的实体概念或模型。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必須两方面都同时着手，而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人在搞。问题是应以哪一方面为主？这却是值得人們研究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基本粒子理論——場論的主要矛盾在哪里。这时我們首先会发现到，量子場論在量子电动力学中虽成功地把物质和場統一起来了。但这个成功是比较勉强的，同时也恰恰在它成功的地方暴露出量子場論的缺点。这个缺点无可奈何地被帶到基本粒子問題上去处理强相互作用时便表现得愈加明显。这个缺点就是物质和場的矛盾。量子力学和量子場論虽然証明了場是带有明显物质性的客观实在，但它和过去物理学习慣上叫做物质的还是有所区别，它是另外一种的物质形态。所以，现在微观物理学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一种是电子和核子那样，服从費米·狄拉克統計的費米粒子（Fermion），也即是所謂物质粒子；另一种是光子和 π 介子那样，服从玻色。爱因斯坦統計的玻色粒子，也即是所謂場量子。实验証明这两种物质形态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但是，在理論方面，对于費米粒子轉化为玻色粒子（例如，正、负电子湮沒，轉化为光子）的现象虽然容易理解；对于和这相反的过程，即玻色粒子轉化为費米粒子（例如，光子轉化为正、负电子）的现象則难于解释：为什么自旋等于零或整数的粒子可以轉化为自旋等于半整数的粒子呢？看来，正如在量子力学的阶段理論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粒子和波动二重性上一样，在量子場論的现阶段，主要矛盾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在物质和場的关系上。許多物理学家认为产生这矛盾的基本原因是由于量子力学的理論結構要求把所有基本粒子的半径都看作等于零的所謂“点模型”的緣故。由于把粒子看成一点，所以在理論上便产生了許多发散困难。重整化理論虽在某种程度上补救了这些困难，但是它只是把困难掩盖了起来，把矛盾回避了开去，并没有从本质上去克服困难。所以当理論进一步发展时，物质和場的矛盾便愈形尖銳化起来了。基本粒子点模型的另外一个大缺点是由于点的制約性，它不能把新粒子的許多自由度，如电荷、自旋、奇异量子数等从理論中自然地推导出来，而成为外加在理論上的东西。当新粒子的种类和它們的性质被发现得愈多时，这样附加在理論上边不可以理解的累贅物便愈来愈多。这样必然造成了理論的臃肿，因而逐漸丧失理論的战斗能力。

因此想彻底解决物质和場的矛盾，物理学必須接受列宁所作的“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第277頁）这一英明論断，放弃基本粒子的点模型，把粒子看成有限大、有結構的实体。这样便可以从本质上消除发散困难，同时又可以把规定粒子特征的上述那些自由度，自然地吸收到粒子内部去。对这样的实体作数学处理时，初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困难些，但是只要实体模型选择得正确和找

到合适的数学形式，是肯定可以把现阶段存在的矛盾解决得更好和更彻底，从而把当前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向前推进一大步的。

近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粒子结构模型。这些模型中，有的是把三十多种基本粒子中的某几种当作更为“基本”的粒子，其他的粒子都看作是由这些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复合体；有的则把所有的基本粒子都看作是由一种基本的物质所构成，由于这基本物质的数量和分布的情况不同，便形成各种类型的基本粒子。后一种模型看来比较彻底，但数学处理和实验证明都比较困难。前一种模型，虽然比较不彻底，但现实性却比较大些。目前这些模型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够根据某一种模型把各种类型的基本粒子的特性和相互作用给予统一说明的理论。将来能否找到这样的模型和理论呢？那是肯定可以找到的。但也同样可以肯定，那新的模型和理论也决不能成为完全的、最后的模型和理论。那时候，科学上又会出现更多的新的问题，发现更多的新事实，从而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因此，也就要求理论更进一步去解决这些新的矛盾。这说明物质世界是无穷无尽的，物理学的世界形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也说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矛盾进程中不断前进。

广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讨论

我国哲学界展开的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讨论，已逐渐引起了广东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广东哲学学会曾邀请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讨论关于部分质变的问题。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写了论文，根据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情况，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的正在积极收集资料，准备撰写论文。

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生理教研组区元懿在他的有关论文中认为：植物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休眠种子到萌动种子；从萌动种子到成长植株；从成株的营养生长到生殖发育；从花芽分化由受精卵到合子的形成；然后再从合子发育到胚原始体建成及种子的形态成熟；最后从种子的形态成熟到生理成熟而完成了从一个质向另一个质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合子的形成标志了新生命的开端，也是根本质变的开始，在这以前屈总的量变过程，从休眠种子到合子形成之前的各个阶段，属于总的量变过程的部分质变；而从合子形成到种子的生理成熟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则属于根本质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根据对上述运动过程的考察，他同意这样的意见：部分质变不但普遍地存在于总的量变过程之中，而且在某些总的质变过程亦同样存在。他认为，前一种部分质变是为根本矛盾规定的次要矛盾的解决，后一种部分质变则促使新质的进一步转化，因而与新质的量的扩张有别。他还认为，在质变过程中事物的质是处在“亦此亦彼”的过渡阶段之中。广东林学院物理系吴世宜则认为，在水的物理变化过程中，部分质变只存在于总的量变过程，而在质变过程中则没有部分质变。他认为，水从摄氏零度到一百度这一过程中，在摄氏四度时密度最大，在四十度时热容量最小，这些都是水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两次部分质变。而一旦水的温度到达沸点时，即产生根本质变，液体内部产生了大量小汽泡，急剧地汽化，但此时水的潜热、粘性系数、膨胀系数却又保持不变，因此在总的质变过程中不存在部分质变。

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杜 雷 吳俊光

几年以来，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论述自然科学的真理性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这对于探讨自然科学理论和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无疑地起着积极的作用。《红旗》1962年第2期刊登的何祚庥同志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更系统地论述自然科学研究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实践标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问题。读后，得到不少的启发。但对其中一些论点，不甚了解，似有讨论的必要。兹就有关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提出一点肤浅的见解。

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对于实践标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这个问题是同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必须先谈谈如何正确认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即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所谓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是指两种不同的真理，而是指同一真理的两面性。一切真理都有相对和绝对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一切真理既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纯粹的相对真理和纯粹的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真理是纯粹相对的，那就是相对主义；反之，如果认为真理是纯粹绝对的，那就把真理变成凝固的、僵死的东西。

这样说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区分，似乎太不确定了。是的，两者的区分既不确定，但同时又是确定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早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①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时，特别强调地指出：相对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5页。

真理和絕對真理之間是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的。

那末，什么是真理的相對性和絕對性？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無疑地包含着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② 這裡列寧很明確地指出，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是有條件的，所以說真理是相對的。但是並不否定真理的客觀性，也就是不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列寧更明確地說：“當一個唯物主義者，就要承認感官給我們揭示的客觀真理。承認客觀的即不依賴於人和人類的真理，也就是這樣或那樣地承認絕對真理。”^③ 關於這一點，恩格斯曾說：“對自然界的一切真實的認識都是對永恆的東西、無限的東西的認識，因而這種認識在本質上是絕對的。”^④ 由此可見，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就是指這種真實認識的相對性和絕對性，而不是指兩種不同的認識，也不是指一個認識的不同部分。恩格斯又說：“我們只可能有以地球為中心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氣象學等等，雖然斷言這些科學只對於地球才適用，因而只是相對的，可是它們並不因這種說法而損失什麼。如果我們認真地要求一種無中心的科學，那末我們就會使一切科學停頓下來。對我們說來，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況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那便夠了]。”^⑤ 這段話更具體地揭明真理的相對性，同時也絕不抹殺它的絕對性。

但是對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這種區分，有人卻感到不能滿足或不可理解，而力求要有一個所謂確定的區分。他們認為作為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區分的標準，應該是按照反映客觀實際的精確程度。於是他們把人類的知識分為若干類，凡是正確反映客觀實際的知識，便是絕對真理，似乎不能同時又是相對真理；凡是基本正確，但包含一定的錯誤的知識則為相對真理，似乎相對真理可以允許包含部分錯誤的東西。例如，他們認為發現原子內部存在電子，這就是絕對真理。那末，在發現電子之前，人類關於原子是組成物質的微粒的知識，是不是正確的知識呢？如果是，那它也就是絕對真理了。可是按反映客觀實際的精確程度而言，它是不如電子理論反映得精確的。隨着原子科學的發展，在原子核中還不斷發現新的粒子。顯然地，電子的發現，又比較得很不精確了，那末還是不是絕對的真理呢？如果說不是了，那末什麼時候才能是絕對真理的認識呢？結果必然陷入相對主義。他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兩種不同的概念。把反映客觀實際的精確程度和反映客觀世界的正確與否混為一談。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確理解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

②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6頁。

③ 同注②，第131頁。

④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頁。

⑤ 同注④，第200頁。（着重點是原有的）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我們的認識是不是真理，主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这是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的。实践是認識的基础和目的，又是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說：“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产活动，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⑥。又說：“馬克思主义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⑦ 这些都指明，我們的認識必須依賴實踐并以實踐为标准去验证認識的真理性的。恩格斯也說过：“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視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維的影响；它們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維。但是人的思維之最本質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⑧ 这就是說，人們認識自然，主要依賴于人們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的活动，以它为基础，并以它为标准。人們这种引起自然界变化的活动，就是人們的認識賴以实现和验证的社會實踐或科学實踐。这是唯一可靠的基础和标准。我們要正确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必須首先肯定这一点。列宁在論述認識論中的实践标准时，正是在強調实践标准的可靠性的基础上指出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因此，承認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根本不涉及什么可靠不可靠的問題。如果說，实践标准还不完全可靠，那不是等于說人对自然界的認識始終可以怀疑、无法判断嗎？那不是在實質上認為客观真理是不可認識的嗎？

那末，應該如何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呢？实践标准这两方面和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具有同等的意义。无限的真理，只可以实现于有限認識的无限連續中，也可以說，无限真理的認識，只可以依賴于有限实践的无限連續。一切有限的实践都只能引起有限自然界的變化，获得有限自然界的認識。它只能在它的作用范围内認識科学理論。验证科学理論，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完全可靠的标准，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绝对的；同时，正因为它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才适用，所以，它又是相对的，在这个范围以外使用它，就会得出錯誤的結果。列宁說：“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記：实践标准實質上决不能完全地証实或駁倒人类的任何表象。”^⑨ 这句话不应給人留下可靠不可靠的印象。一切具体实践虽然不能完全地証实或駁倒人类的任何表象，但它已經証实或駁倒的理論，却是完全可靠的。接着，列宁就指出：“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識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⑩ 这里，列宁是在肯定实践标准的可靠性的基础上指出实践标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1頁。

⑦ 同注⑥，第273頁。

⑧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頁。

⑨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頁。

⑩ 同注⑨，第142—143頁。

准的可靠性有相对性的一面，也有绝对性的一面。目的在于反对形而上学对实践标准的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同时又阐明实践确是人们认识的基础和认识可靠性的唯一客观标准。因此，如果离开实践标准的可靠性来谈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实质上就会否认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结果，也就会否认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述，有些地方却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实践的基础上，并经实践验证的自然科学理论，似乎仍然不甚可靠。他从实践的相对性出发，认为：“就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来说，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第23页）又说：“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第23页）“我们在科学工作中必须看到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不应抱迷信的态度。”（第23页）接着，当他谈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时，他却认为：“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都是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已有大量的科学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所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分也就越多。这种已经有大量实践为基础的绝对真理的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新的实践只会丰富或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或者进一步给这个理论划定它所能适用的界限。”（第23页）这样，一方面，既认为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凡经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种成分是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消失的。前后就自相矛盾了。并且，他认为实践标准所以有绝对性的一面，只是因为凡经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作出这样的规定，仍是不充分的。因为根据他的看法，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绝对真理成分不会消失，但是，同样为实践检验过的相对真理的另一部分，当然就会消失了。这样说来，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似乎只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正确的，另一部分或小部分是不正确的。请问：已由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其中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不正确的呢？如果当时的实践水平还未能检验其中不正确部分，那末，这正说明那些不正确部分是当时的实践水平未曾检验过的。这就不能把它说成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了。按照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的论述，实践似乎还不是衡量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

下面想就何祚庥同志提出的有关实践标准的具体运用问题，提点意见，以供讨论。

一个科学对象，不能有两种科学理论

何祚庥同志说：“由普洛特假说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上理论观念的变革，常是很激烈的。在不同水平的生产实践基础上，便建立起不同的自然科学理论。”（第23页）我们知道，自然科学理论是客观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的反映。同一个科学对象，不能建立两种科学的理论。至于科学假说，则不仅在不同水平的生产实践基础上，就是在相同的实践水平下，也可以存在不同的推论。因为当实践水平还不足以证实任何推论或假说时，就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拿普洛特的假说来看，即使原子量测定得很精确，

不同元素的原子量确实与氢原子量构成正数倍比的关系，也完全不能证实一切元素都是由氢构成的假说。因为构成正数倍比的关系，也可推论一切元素都是由比原子更小的共同粒子组成的。何祚庥同志清楚地知道：假说的不同，不能说明一个事物可以有两种理论。所以，他接着又举出相对论和牛顿力学来。他说：“就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来说，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第23页）由于出现新的实践条件，“原来的理论就可能显得陈旧”。（第23页）这指的是什么呢？难道牛顿力学由于相对论的出现而由正确变为相对正确吗？由生动变为陈旧吗？根据他自己的分析，相对论并没有使牛顿力学损失什么！只不过是在牛顿力学没有研究过的高速运动的条件下发展了牛顿力学。牛顿力学还是完全正确、照常生动的，因为在自然界中仍有速度较缓慢的条件客观地生动地存在着。不然，为什么“当物体的运动速度变成缓慢时，相对论就自动地还原为牛顿力学”（第23页）呢？至于牛顿力学是不是超出它的实践水平的范围之外，过头地作了理论概括，这都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其实，过头的部分恰恰不是当时的实践所证实过的部分，这仍不能归咎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

虽然，何祚庥同志明知这些实例都不足以证明一个科学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科学理论，但是，仍不见他对下述问题有所说明，那就是：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仍应持批判的态度，以及原来的理论就可能显得陈旧，不应抱迷信的态度，等等，是不是仍然有效的告诫呢？

关于批判的审查

谈到批判的审查，何祚庥同志指出：“当我们对前人的工作进行批判的审查时，必须对它的实践根据有充足的估计。”（第24页）这一点，可以完全同意。对前人的工作，应该分析其中哪些是有实践根据的；哪些是没有实践根据的，予以充分估计。肯定、继承和发展有实践根据的东西，继续验证或否定没有实践根据的东西，不断地推动科学向前发展。何祚庥同志接着说：“假如我们的科学实践仍然处在前人的实践所达到的范围以内，那就不可能期望在这个范围内推翻任何自然科学上的定律（除非前人工作包含有错误）。”（第24页）这一点，也是可以完全同意的，但仍有不够的地方。不包含前人工作错误的自然科学定律，固然在前人所达到的实践范围内不能推翻，就是科学实践超出前人所达到的范围之上，也不能推翻前人确经实践验证过的科学定律。在发展的实践水平上如果企图推翻这种科学定律，那就仍然是：“实际上，这就是企图否认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否认实践验证过的相对真理中包含有绝对真理成分，而这将导致从根本上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从而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第24页）岂只这样才是否定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实际上，不承认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同样，也是否定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真理的客观性。如前所述，绝对性是指实践标准的全部，也是客观真理的全部。当然，绝对的全部也是相对的全部的。既不能把绝对

性看成是实践标准或客观真理的某一部分，也不能把绝对和相对绝对化起来。因此，无论相对真理或绝对真理，都是不能推翻的。它们都是对同一个真理而言的，不能说可以推翻这一个而不推翻另一个。

“在自然科学上，看来也确有一些基本定律曾被‘推翻’过，如宇称守恒定律。”（第24页）何祚庥同志举出这个实例，也不认为是真正被推翻，因为，“宇称守恒定律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过去的实验曾经证明它正确，而现在的实验却证明它是不正确的”。（第24页）实际上，实验的结果只表明“弱相互作用过程内宇称是不守恒的”。（第24页）“曾经由大量实践证明的如在电磁相互作用过程内，宇称却仍是守恒的。”（第24页）可见，这被推翻的并不是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科学定律。

总之，何祚庥同志还没有举出一个实例，能够说明一个科学对象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科学理论，说明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科学定律曾被推翻过。其实，只要产生科学定律的客观条件永恒地、生动地存在着，科学定律就永恒地、生动地放射着它的光辉。一旦产生它的客观条件消失了，永恒的科学定律也就成为历史的了。

*

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讨论黎族社会性质问题

广东民族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最近结合《黎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的修改工作，对黎族社会的性质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关于黎族原始社会瓦解后是否经历过奴隶制阶段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黎族原始社会瓦解后可能越过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主要根据是：①在考古方面迄今未有青铜生产工具发现；②文献上缺乏有关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记载；③从解放前黎族社会经济结构中，找不到曾经存在过奴隶占有制度的明显痕迹。但是，有的同志对第③点提出质疑：解放前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工子”其性质类似奴隶，如果黎族社会没有经历过奴隶制阶段，这种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关于解放前黎族“合亩制”地区的社会性质问题。从“合亩”内部的生产关系来看，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即存在着严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有轻微剥削的；基本上平等互助的。这是一致的意见。但对于“合亩”的性质，则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第一类“合亩”剥削者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利用“合亩”组织对“龙子”（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类似农奴）、“工子”及其他贫苦成员进行封建剥削，这一类“合亩”可视为变相的庄园制。另外有的同志认为，“合亩制”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异常复杂，其中既有浓厚的原始家族公社的残余，又有农奴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某些因素，但就其整体来说，封建地主经济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其根据是：地主阶级主要利用“合亩”形式进行封建剥削；土地占有日趋集中，这些土地除自己的“合亩”经营外，都出租给别的“合亩”，收取实物地租，租率达收获量的50%；上述第二、三类“合亩”的成员虽然占有自己的若干土地，但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原因，这些土地也必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后备和补充。但是多数同志不同意上面两种意见，认为提庄园制是比较牵强的，因为“龙子”和农奴有显著的差别，第一类“合亩”的土地虽然绝大部分为剥削者占有，但仍然利用“合亩”共耕的形式，而且“合亩”内其他一些成员也占有一定的土地。至于说地主经济占主导，就涉及地租形态的问题，既然剥削阶级主要是利用“合亩”共耕形式对贫苦的成员进行剥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地租形态呢？目前仍需要研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在分析“合亩制”的性质时，要如实地反映其本来的面貌，一方面固然要揭示“合亩制”的阶级内容和剥削实质，一方面也要全面反映作为家庭公社底残余的“合亩”这一共耕组织的特点。“合亩制”的封建性质是肯定的，但是正因为它具有复杂的内容和自己的特点，所以对“合亩制”地区各社会阶层作具体分析时，一般地使用“地主”、“富农”或“农奴主”等名词是不适当的，应该沿用其本民族原来的称谓以避免一般化。最后大家认为，根据黎族剥削阶级利用家庭公社底残余形式进行封建剥削这一基本特点，使用“宗法封建社会”一语，是比较能够概括地反映黎族“合亩制”地区的社会性质的。但是对于这一名词，因为理解各有不同，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認識是过程

(讀書札記)

刘 嶸

(一) 認識是“螺旋的曲綫”的过程

列宁指出的“真理是过程”、“观念是……一个过程”^①，都是說明馬克思主义哲学認識論的一个重要思想：認識是过程。所謂認識是过程，是說明人們的認識运动，有它自己的发展史。它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直綫式的，而是一个反复曲折、但又是不断深化的无限发展过程。用生动的形象說法，認識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螺旋的曲綫”的过程。列宁說：“人的認識不是直綫（也就是說，不是沿着直綫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綫。”^②

为什么認識一定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反复曲折、不断深化的无限发展过程呢？这是因为人們的認識发展源泉是实践，認識是依賴于实践的。我們知道，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具体事物或什么具体过程，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离开了实践，就无所谓認識。从人們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具体过程的認識运动来看，只有通过实践，从感性認識阶段，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認識阶段；再經過理性認識阶段，能动地回到实践，指导实践，以达到認識上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从整个人类認識运动来看，人們的社会实践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因此，人們的認識运动也就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人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步登天，也不可能有一个終結。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由于它的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永远没有一个完；因而，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个解决了，又产生另一个新的矛盾，人們的認識运动也就永远没有一个完結。这就是为什么人們的認識运动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发展的过程。然而，人类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从来也不是象一条康庄大道，不是沒有反复曲折的，而是表现为一个波浪起伏的前进运动。因此，作为依賴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与反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認識运动，也就不会沒有反复曲折的，同样会表现为一个波浪起伏的前进运动。其次还因为，在生产斗争和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4、215頁。

② 同注①，第411頁。

斗争的实践中，人们的认识还常常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具体事物或具体过程未充分发展，因而，它的本质方面未充分暴露，使得人们不能一眼望穿；又如由于技术条件和科学条件的限制，也会使人们的认识，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使得人们的认识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有通过反复比较的过程，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认识运动不是直线式的，而是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

为什么认识是过程，还可以从人们的认识秩序来分析。就人们的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先由特殊到一般，然后，又由一般到特殊。在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特殊，因此，只有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来检验和补充。有时，要经过几次循环反复的过程。而且，由于事物范围极其广大，发展是无限的。所以，在一定场合表现为普遍性、一般的东西，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为特殊性、特殊的东西。于是出现了这样循环反复、不断深化的过程。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个“螺旋的曲线”的过程中，有一串小过程，好似一串小圆圈一样。这些一串小圆圈的过程，构成大的“螺旋的曲线”的过程。“螺旋的曲线”的过程，是就整个人类认识运动来说的。所谓“圆圈”，是指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具体发展过程的认识运动。前者，是一个大过程，人们的“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③；后者，是一个小过程，人们的“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④。前者，通过无数相对真理的途径，走向绝对真理；后者，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回到实践，达到思维和客体的一致。但是，二者都是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这样的认识过程，好比一个大螺旋上的无数个小圆圈。在这个大小认识过程中，一方面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反复曲折的过程。因此，不仅有正确的认识，而且有错误的认识。随着实践的推动和检验，人们的认识运动，表现为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和发展的过程，错误的认识不断否定和克服的过程。同时，正确的认识总是在和错误的认识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总之，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客观世界辩证发展过程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人们认识运动，也是螺旋式的发展。所以，列宁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⑤。

表面看来，似乎说认识是一个过程，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永无止境的过程，对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不对。事实上，正因为它是认识运动本身的一个规律，因此，人们只有遵循这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道路，才能认识真理，才能愈来愈接近绝对真理。否则，只能把人们引导到唯心主义的道路上，铸成大错。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就是违背这一认识过程，主观地把这个“螺旋的曲线”的过程的任何一个方面或阶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8页。

④ 同注③，第208页。

⑤ 同注③，第410页。

片面地加以夸大，并且把它绝对化起来。如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认识过程中的感觉阶段，加以片面夸大，把感觉和客观物质完全割裂开来，从而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世界就是感觉的综合。又如客观唯心主义则把认识过程中的概念阶段，加以片面夸大，并且把它神化成为世界的创造者。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⑥所以，正是由于认识是这样一个“螺旋的曲线”的过程，人们就有可能溜到唯心主义那边去，或者为唯心主义所迷惑，这也就是为什么唯心主义所以能谬种流传，影响深远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阶级社会消灭之后，仍有可能产生唯心主义的原因。可见，理解认识是怎样一个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从而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露唯心主义的错误，削弱唯心主义的影响，或者防止我们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二）认识是从片面到全面、现象到本质、外部联系到内部联系的一个反复曲折过程

人们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始于感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是低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那么一切认识，就象水无源，木无本。但是，认识的运动，不能停留在这一步。认识的任务，是通过感性认识阶段，到达理性认识阶段，以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因为，感性认识阶段还只是认识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就要把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但是，到达理性认识阶段，认识运动过程，尚未完成，还须回到实践中去。这是因为，理性认识之所以重要，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认识世界，正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阶段到达理性认识，还不能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理性认识是否与客体一致，只有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才能解决。在实践中，正确的认识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错误的认识能得到纠正，不完善的认识能得以补充发展。所以，回到实践中去，是检验认识和发展认识的阶段，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也是整个认识过程的更高级阶段。可见，认识运动是一个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不能超越某一阶段，也不能停留在某一阶段，不能颠倒秩序，也不能片面夸大某一阶段、忽视另一阶段的作用。否则，就会犯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

那么，是不是可以简单地把认识运动看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一次就完成了呢？不是的。对某一具体事物或具体过程的认识，远不是简单的一次循环就完成了的，而是许多个不断上升的循环，构成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如由感性

^⑥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页。

認識阶段能动地发展为理性認識阶段，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反复曲折过程。从感性認識阶段的要求来看，就要求詳細占有材料，只有材料十分丰富和符合于实际，才能据以做出正确的結論。材料不全，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結論。更不能先下一个結論，再去收集材料来証明結論。这样做，不費什么劲，也好像不必有什么反复曲折的过程。可是，这正如列宁指出的，不过是一种儿戏。列宁指出：“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因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証实任何一种意见）”^⑦。要詳細占有材料，就要有一个过程，这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从理性認識阶段的要求来看，对于已有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改造时，也不是一刹那的“頓悟”。同样，是要經歷一个反复思考的深化过程。因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不能仅借助于显微鏡、化学反应剂，而是要依靠科学的抽象，进行分析、比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可能因所获得的感觉材料，有假象、有錯觉；也可能因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本质的东西尚未充分暴露；还可能因当时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因而，“涇渭难分”，未能正确地或者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因此，人們所形成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符合于实际，部分地或全部地錯了，都是有的。因此，“許多时候須反复失敗过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預想的結果。”^⑧

那种認為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必經過长期的艰苦研究，不会有任何挫折和失敗的想法，是不符合認識的发展规律性的，因而是空想。所以，恩格斯說：“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發揮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講空話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領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⑨

那种認為在革命和建設的工作中不会有任何困难和錯誤的想法，同样是不符合認識的发展规律性的，因而也是一种空想。所以，列宁在談到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說过：“这种过渡乃是一种創举，是一件难事，这当然会产生許多所謂摸索的步驟，許多錯誤和动搖，——沒有这些现象，决不会有任何飞速的前进。”^⑩

認識既然是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人們要認識真理、防止錯誤，就要采取符合認識发展规律性的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們，在决定問題之前，就要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在决定問題之后，就要經過試驗，“一切經過試驗”。这就是根据認識的发展规律性所采取的既积极又慎重的馬克思主

^⑦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頁。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3頁。

^⑨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47頁。

^⑩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頁。

义工作方法、工作作风。

(三) 認識是通过无数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作为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发展过程的認識运动，通过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由理性認識到实践的途径，并且常常經過了多次的反复，認識到了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具体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在实践中取得預期的效果，这个認識运动过程算是完成了。然而，客观事物或发展过程，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作为人們的認識运动，也就相应地跟着推移和发展，开始新的認識运动过程。人們的認識运动，就是这样从一个过程到另一个过程，从一个圆圈到另一个圆圈，构成整个“螺旋的曲綫”的过程，而永无止境。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結，人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結。”^① 作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推移，是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的推移，因此，人們的認識过程，也是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的不断推移，永无止境。但是，在这个永无止境的認識运动中，由于实践的不断推动和檢驗，人們的認識不断深化，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又是无可怀疑的，是绝对的。正是人們对客观世界每一具体发展过程、每一部分的認識，构成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总的認識，无数这些相对的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长河。毛泽东同志說：“馬克思主义者承認，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們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②

人們認識就是这样通过无数相对的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绝对真理好比一条流不尽的长河，无数相对真理好比无数流入长河的支流。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沟，相对真理中有绝对真理的部分，人們对每一具体发展过程的正确認識，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統一。

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都不懂得認識过程的辯証法，不懂得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辯証关系，各执一个片面，加以夸大，从而根本违背了認識是一个“螺旋的曲綫”的过程的原理。绝对主义的錯誤，在于認為绝对就是绝对，否認認識是无限的发展过程，从而否認各个具体发展过程的認識的相对性，否認相对真理。这是一种片面性。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看問題绝对化、僵化。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或者，表现为否認真理的具体性，不問時間、空間和条件，生搬硬套。相对主义的錯誤，在于認為相对只是相对，排斥绝对，否認真理的绝对性，从而否認真理的客观性，而走向唯心主义。这是另一种片面性。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模棱两可，隨波逐流，缺乏革命原則性；或者以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怀疑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4頁。

^② 同注①。

切，否定一切。

正确理解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認識是过程的原理，正确理解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絕對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辯証法，是掌握認識辯証法的关键所在。絕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有其共同的認識論根源。它們都是违背認識辯証法，都是违背認識是一个“螺旋的曲綫”的过程的原理，片面地把認識过程中的絕對性或相对性，加以絕對化起来。因此，我們常常看到具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从一个片面性，走到另一个片面性；或者，以一个片面性反对另一个片面性；也就是以相对主义反对絕對主义，或者，以絕對主义反对相对主义。

既然，認識运动是从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推移，是一个“螺旋的曲綫”的过程。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工作者，就要按照認識运动的规律，来認識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指导我們的工作。这就要求永远保持謙虛謹慎、学无止境的精神，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当形成和制訂了一个思想、路綫、計劃、方案时，就不是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以群众的实践的經驗，不断地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如果，发生了缺点和錯誤，則勇于改正，有“聞过則喜”、“聞过則改”的高貴品德；而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經从某一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轉变时，認識也就要相应地跟着推移轉变，跟上形势的发展。

在客观发展过程推移轉变的时候，往往可能发生“过”和“不及”的情况。因为客观发展过程新阶段的规律性尚未被認識，而革命和建設工作却不能踏步不前。因此問題在于懂得認識是过程这一原理，保持謙虛謹慎的精神，繼續采取有效的方法，及时总结經驗，解決問題。如果，思想上犯死板僵化的毛病，以为符合前一发展过程或阶段的認識是正确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或阶段，也一定是正确的，不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这是右的錯誤。如果，思想犯了直綫性的毛病，只按主观愿望，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或者正确的理想，放在今天来做，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这是“左”的錯誤。不論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是离开了認識的辯証法，不懂得每一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絕對真理的統一，不懂得真理的具体性，其后果，都会使革命事业受到損害，以至失敗。

（四）正确的認識总是在和錯誤的認識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在人們的認識运动过程中，随着实践的推动和檢驗，正确的認識不断肯定和发展，錯誤的認識不断被否定和克服。正确的認識总是和錯誤的認識并存的，并且在和錯誤的認識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正确的認識是在和錯誤的認識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

正确的認識根源于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但是，正确的認識，却不是一开始就为千百万人民所承認，总是首先为少数人所承認，逐步发展为大多数人所承認的。古今中外，毫无例外。这是因为人們所处的地位不同，人們所处的条件不同，因而人們認識真理、承

認真理，有先后、快慢之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承認、接受真理的過程中，不僅是正確認識的簡單積累，而且是人們思想中錯誤認識被克服的過程。因此，正確認識和錯誤認識的鬥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在階級社會中，由於反動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和偏見，統治階級經常採取各種方法阻撓真理的傳播，宣揚反動的、落后的東西。於是正確認識和錯誤認識的鬥爭，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成為階級鬥爭的一個方面。這樣一來，正確的認識和錯誤的認識的鬥爭，就要經歷一個反復曲折的道路，只是有時長一些，有時短一些。這種鬥爭，在社會科學領域內是這樣，在自然科學領域內也是一樣。如科學歷史上，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都是遭到反動統治者的種種迫害。

儘管這樣，真理最終總是戰勝謬誤，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因為，真理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真理是千百萬人民群眾作為和自然鬥爭以及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人們會在實踐中逐步辨別何者是真理，何者是謬誤，而接受真理，拋棄謬誤。真理最終戰勝謬誤，實質上是人民群眾的勝利。

真理和錯誤作鬥爭的過程中，不僅是由最初少數人所認識到被大多數人普遍承認的過程，不僅是真理戰勝錯誤、取得勝利的過程，而且是日益發展豐富起來的過程。

有兩種不同性質的錯誤，一種是反動剝削階級、反動派的階級偏見、錯誤思想；一種是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錯誤思想、錯誤認識。在同反動的階級偏見、錯誤思想作鬥爭時，由於反動階級常常利用和歪曲科學的新成果，打擊、壓迫革命運動，因此，就促使人們更好地吸收科學成果，正確總結革命運動經驗，同他們的錯誤思想作有力的鬥爭。就是他們錯誤思想體系中一點點有用的東西，也將被批判地吸收來，作為和他們作鬥爭的材料。如列寧一方面曾指出過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教授們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下的有學問的幫辦；而哲學教授們不過是神學家手下的有學問的幫辦”。另一方面又指出：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汲取和改造這些‘幫辦’所獲得的成就……，並且要善於消除它們的反動傾向，貫徹自己的路線，同敵視我們的各種力量和階級的整個路線作鬥爭。”^⑭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都是輝煌的例子。至於在同自己隊伍中的錯誤思想（這些錯誤思想，或者是由於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的影響，或者是由於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的錯誤，或者是由於缺乏經驗所造成）作鬥爭時，則是採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通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來克服、糾正的。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真理與錯誤、正面的經驗與反面的教訓的比較，客觀事物的本質及規律性得以進一步充分暴露，從而獲得較全面的、深入的認識。“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意思。這樣，錯誤就成為正確的先導，失敗成為成功之母。毛澤東同志說：“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着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

^⑭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2頁。

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中山大学举行第五次（文科）科学报告讨论会

中山大学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和检阅文科各系科研成果，于五月初至六月初举行第五次科学报告讨论会（文科）。

这次科学报告讨论会，是在去年以来学校进一步深入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政策以后，新老教师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举行的。

这次提交科学讨论会的论文共有53篇。属教授、副教授的19篇，讲师13篇，助教19篇，研究生2篇。其中有关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20周年的专论，有杨荣国的《服务与改造》、吴宏聪的《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大革命》等15篇；有关作者专业特长和结合当前学术界争鸣讨论的论文，有金应熙的《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刘节的《孔子的“唯仁论”》、张志铮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级差地租的若干理论问题》、黄春生的《试论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和质变过程中阶段性的区别》等34篇；有关教学经验总结研究的，有王宗炎的《语文矛盾与英语教学》等4篇。

这次科学报告讨论会的论文，从内容和范围来看，是比较丰富和广泛的；论文的选题，注意到了理论、历史、现状等方面，并且对理论的研究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有的是经过了作者较长时间的研究，能够提出新的见解，引起参加讨论的同志的注意和兴趣，开展了热烈的争论的。如何竹淇教授《宋代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的论文，从两宋农民战争的政治口号、行动措施和宋王朝的诏令等各方面材料论证了两宋农民起义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争取土地而斗争，并且论证两宋农民起义的自觉性质，认为它“不同于一般的自发性，而是由自发性转变为自觉性了”、“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讨论的参加者，有的基本同意上述看法，但认为作者对宋代农民争取土地的意义和作用估计偏高；有的则不同意作者的看法，认为农民觉悟性与农民战争自觉性是有所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自觉革命性质；作者把宋代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估计过高。李坚讲师在《论晚清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了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是为追求产品的价值以及这些企业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腐朽性、垄断性等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基本上已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早期企业等看法。这篇论文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哲学系讲师黄春生的《试论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和质变过程中阶段性的区别》一文，是配合着当前哲学界关于部分质变问题的讨论而写成的。作者提出了质变是新旧质之间的临界点、临界线；某些质变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在有过渡阶段的质变形式中量变质变的界线是在质变的开始之点；质变开始于量变的最高点，在此以前是属于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范畴，在此以后，是属于质变过程的范畴等等看法。对这篇论文所持的论点，参加讨论会的广州哲学界人士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他如张志铮讲师的《关于人民公社级差地租的若干理论问题》、刘节教授的《孔子的“唯仁论”》、刘燧副教授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丘世发讲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科学性与革命性》等论文，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讨论中都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在这次科学报告讨论会上，不论年青教师年老教师，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精神。这对进一步开展和提高科研和教学水平将有很好的帮助。

（翦畏）

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别

——評章沛的《論“邏輯眼界”》

李 匡 武

一、“主观視野”是唯一的根本区别嗎？

《新建設》1960年12月号刊登了章沛同志的《論“邏輯眼界”》一文。讀了之后，觉得其中的一些见解值得商榷。这些见解牵涉到如何正确地理解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关系和区别；如何正确地引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和如何正确地理解形式邏輯这門科学的性質等問題。

章文論及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底关系的許多方面，但作为全文底中心思想的，是它底“钥匙的意义”，即“两种邏輯的区分，是‘眼界’上的区分，而不是其他任何的区分”（着重点是引者加的）^①。它接着指出：“‘眼界’指的是我們看东西的主观視野，也就是說，通过我們的眼光看世界时所能达到的深度。”这种看法，章沛同志說是以《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为依据的。但我认为这样去理解恩格斯的話，是有問題的，而且正是这一“钥匙的意义”，最值得商榷。

章文把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区别归結为它們底認識作用的区别，再归結为“主观視野”的区别。照这样看来，这两門科学的区别，就只有主观方面的区别，而且仅为主观所决定。我則认为：这两門科学的区别，应该首先是、主要是它們底客观方面的区别，然后才是、也才能是主观方面的区别。換句話說，要区分这两門科学，首先应从它們的产生根源、客观基础、特别是与此密切联系的研究对象底分别出发，然后才能說明它們在認識作用、适用范围方面的区别。根据辯証唯物主义原理，应该肯定：客观方面的区别是根本的、主要的；主观方面的区别是派生的、次要的。章文把它們底派生的、次要的、非唯一的区别看作是根本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区别；把它們在“主观視野”方面的区别看作它們的全部区别，从而忽視了研究对象及有关的社会实践，客观基础底分别的决定性意义，使这两門科学的区分完全丧失了客观的标准。

^① 《新建設》1960年12月号，第36頁。

章沛同志把这两門科学的区别完全归结为“主观视野”的区别、“思维水平的高低区别”、“整个主观世界的高低两层”的区别，不但完全不符合实际，理論上也免不了矛盾和混乱。尽管章沛同志声明：“眼界的突破、发展，不是由于某个天才的发现”。但离开了研究对象及有关的社会实践和客观基础等去强调“唯一”的主观方面的区别，强调“理解所能达到的深度”，势必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才能的区别。这种思想显然和辯証唯物主义背道而馳。同时，章沛同志不从社会实践，客观基础方面的区别去找寻“主观视野”底区别的根据，而孤立地考察那“唯一”的区别，并认为“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是两种思维方法、思维工具的区别，而不指明它們究竟在思维了些什么”，这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是非辯証的、非唯物的——把不应孤立的东西孤立了，把不能割裂的东西割裂了，并漠視了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結果这些“方法”、“工具”也必成为抽象、空洞的东西，而无法說明为什么这两門科学能够起着不同的認識作用。

思维发展的历史表明：思维的发展不但在思维形式方面有改变，思维内容也有不同。恩格斯說：“每一时代的理論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正如其他的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之实际应用于經驗的領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②

一切科学（和哲学）的形成发展都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及通过社会实践所反映的客观规律密切联系着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各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才有可能和必要。恩格斯說：“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社会实践是一切学问的泉源；不同的科学即起自各种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底社会实践的不同需要。毛泽东同志說：“什么是知識？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两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阶级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③可见科学不但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而且是以通过实践所反映的客观情况为依据的。它們的继续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因此，人类的認識，不論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④作为社会实践底成果的科学，必須而且可以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作为客观规律的反映的科学规律，也应该而且能够被用作認識客观规律的工具。

这些道理，对于邏輯科学來說，是完全适用的。离开了社会实践的需要和客观基础，思维底形式规律的形成、发展和作用都将无法获得正确的解释。列宁指出：“邏輯的范畴

②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818頁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頁

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为人们服务……”。又說：“思維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⑤

由于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互异，（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互异，社会实践的需要不相同，当时已达到的科学水平不一样，人们在同时代所反映、所能认识的客观规律也有分别。客观世界本来是一个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有机整体，其中各部分普遍地相互联系着、经常地发展变化着。但它具有一般的规律，也具有特殊的规律；有整体的普遍的现象，也有局部的特殊的现象；有显著的发展变化，也有相对的静止状态。不同的科学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应社会实践的不同需要而分别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规律、现象或状态的反映底结果。关于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曾作非常明确的论述。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⑥事实上，历来的比较正确的科学分类都是以此为标准的。恩格斯自己便曾不止一次地根据这个标准来划分科学。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都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例如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全部的知识领域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包括所有关于非生物界、多多少少可用数学方法处理的那种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包括研究有机物的那些科学。……第三类科学，即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状况来研究人的生存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上面还尽可以举出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那些科学，即逻辑和辩证法。”⑦

客观世界具有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主要处于量变阶段）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即主要处于质变阶段），它本身却是这些状态的统一体。有的科学主要是反映客观世界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特点或规律的；有的科学主要是反映客观世界在急剧变动状态下的特点或规律的；有的科学（哲学）则反映客观世界全部相互联系、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的规律。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实践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规律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当时社会实践的特殊需要、通过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所反映的主要是客观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一般特点或规律（因此也主要适用于这种状态下的事物），要求解决思维的正确性问题。这也就是形式逻辑底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并不等于“狭隘的眼界”）。它是“以最普通的、眼睛最常见的东西为指导”的（列宁语）。客观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一般特点或规律，是较明显，较易掌握的，与日常生活、工作的联系也较直接、较广泛。

⑤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09页。

⑦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9—92页。

因此，这种較简单的思維形式和规律，不但早已为人类自发地、熟練地运用，而且对它們的自觉的理解和討論也較早。西方的古希腊，东方的我国，都早在公元前数百年即已出现有系統的邏輯学說。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当时的政治經濟情况、科学水平等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及当时思想战綫上的階級斗争的实践需要（在古希腊是各种哲学派別的論爭，在我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爭鳴）密切联系着的。

尽管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都是关于思維及其规律的科学，但“关于思維的科学，正如其他的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維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維之实际应用于經驗的領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⑧ 形式邏輯是以人类思維的初級规律和形式为研究对象的。比起形式邏輯来，辯證法^⑨是比較复杂的一門學問。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維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⑩ 这些规律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当时的社会实践底特殊需要通过有关的社会实践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作为一門邏輯科学，辯證邏輯着重要求解决思維的本質及其发展规律問題。这就是辯證邏輯底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并不等于“較寬广的眼界”）。而对于客观世界的这些普遍规律的認識和掌握，自然比較困难。因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辯證的思維“只对于在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滿的发展則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⑪。也就是說，辯證邏輯底规律的自发的、熟練的运用，比形式邏輯晚得多；而关于辯證邏輯这門學問，虽然亚理士多德和黑格尔曾作研究，黑格尔还作出了一定貢獻，但它的逐漸确立，却要迟至十九世紀中叶以后——当各种客观条件均已具备的时候。在这些条件中，首先是长期积累了生产劳动和階級斗争的实践經驗，物质的生产方式已发展到一定形式，特别是資本主义已发达到一定程度，工人階級有了較丰富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經驗；其次是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如思維的形式规律的本性、发展的长期探索，有关科学史、思想史、語言史等的研究，特别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經濟学說、英法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的出现，还有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这些客观条件具备了，辯證邏輯的产生就有了可能性，当时的社会实践的需要也在推动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伟大的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个时候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經驗、學識和修养，总结了生产劳动、階級斗争、科学实验等社会实践的經驗；吸取了当时科学研究成果的合理部分，把这一客观可能性加以实现，以适应当时社会实践的需要。譬如說，在当时的科学研究領域中，形而上学的范畴“在实践

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⑨ “辯證法”和“辯證邏輯”在精神實質上是相同的，它們的关系也极密切，故本文一般用作同义語。但它們还有一些分別：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認識的本質及其发展规律的；辯證邏輯，作为一門邏輯科学，則在兼顧自然、社会及感性認識等有关問題的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地探討思維的本質及其发展的规律——按照列宁的指示：通过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儿童智力发展史、动物智力发展史以至心理学、感觉器官生理学等等的研究，着重明确思維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⑩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頁。

⑪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5頁。

中已被排除”，辯證法成为唯一适合于自然科学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更高的思維方法，“因为只有它才能对于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对于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对于从一个研究領域到另一个研究領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且从而提供說明方法。”^⑬ 同样，生产劳动或階級斗争中較复杂問題的解决，客观世界的許多較复杂现象的正确理解，也都只有运用辯證法才可能办到。

辯證邏輯，比起形式邏輯来，的确处于更高的阶段。由于它是自然、社会和人类認識的普遍規律的唯一正确的反映，它能起着更大的認識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使人的認識更全面、丰富、深刻，行动也更有預见性。但它之所以能够發揮如此的作用，与其归功于主观的才能，不如归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的思維之最本質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⑭

列宁在《再論职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中更从“对象”和“实践”等方面指出辯證邏輯之所以比形式邏輯“更进一步”的道理。他写道：“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这是第一。第二，辯證邏輯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須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底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滿的‘定义’中去。第四，辯證邏輯教导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⑮

总之，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教导：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应各有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产生根源和客观基础。也只有承認了这些差別，它們底不同的認識作用和适用范围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章文完全沒有从社会实践方面去說明二者的区分，因此也无法正确地說明它們底“主观視野”的差別。对于它們在研究对象和客观基础方面的区别，虽略有接触，却完全沒有把它們放在适当的位置（按照他自己的邏輯，也不可能对这些区别予以应有的重視），反給自己带来了显然的矛盾。

章沛同志一方面根据恩格斯的意見，承認眼界的区别具有客观基础：“眼界之作为形式邏輯与辯證邏輯的分級綫，虽然是思維自身的区别，但又有其客观基础。”^⑯ 但接着又指出：“形式邏輯反映着客观辯證法中的‘同一’的环节，而且是按照‘同一’的眼界来反映它。在这个意义上，眼界的区别，其客观基础就最后归結为对现实世界的同一或对立同一的性質、关系、本質的反映的区别。”可见在这个問題上，章沛同志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似乎承認客观基础的区别，同时又把这种区别“归結为……反映的区别”。到底哪一方面的区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呢？如果章沛同志貫徹自己的主張——“钥匙

^⑬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⑭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2頁。

^⑮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84頁。

^⑯ 《新建設》，1960年12月号，第43頁。

的意义”，那末，仍不免陷于原来的泥淖。反之，如果承认客观基础的区分是更重要的，决定性的，那末，就会和他自己的“钥匙的意义”自相矛盾。

必须指出：即使章沛同志承认了客观基础的区分决定作用，仍然是有问题的。机械唯物主义也承认客观世界的决定作用，但由于它没有从实践方面着眼，也就无法真正沟通客观和主观的关系——无法正确地说明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又如何改造客观。离开了社会实践去谈“客观基础”，必然是软弱无力的。

其次，章文又依据恩格斯的意见，承认这两门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有所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⑥。但接着又以“困难不在于把它们对象的不同部分弄清楚”为理由，轻轻地放过了这一重要的区分标准，而仍旧坚持着他的“钥匙的意义”——以“主观的视野”为唯一的区分标准。其实，不管从研究对象方面去区分这两门学问是否容易，即使真的容易，也不应该因而加以忽视。譬如在十九世纪时，从研究对象去区分一些自然科学，本来困难不大，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却不厌其详地再三指出：这些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的区分，是它们所研究的物质底对象形态和运动形态有所不同，恩格斯并没有因为这种区别容易而忽略了它。因为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区分科学，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而不是、不应该是划分时有无困难或困难大小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这两门科学在适用范围方面也是有区别的。但所谓适用范围的区别，并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划出区域，指定这两门逻辑在不同的地区活动。”它们的活动区域并不是“各不相同”的。但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既然主要是客观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特点或规律，那末，根据“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原则，它的适用范围应该主要是与其相应的状态。对于较复杂的事物关系或问题，它虽然不是完全用不着，但已不够用。另一方面，辩证逻辑的客观基础既然是客观世界全部相互联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它的适用范围也应是与其相应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形式逻辑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和辩证逻辑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些较简单的事物关系或问题，形式逻辑（在辩证逻辑指导下）已足以解决，这时辩证逻辑只是通过形式逻辑起作用。为了使辩证逻辑的运用不庸俗化，它的主要活动领域应该是事物的较复杂关系或较重大的问题，譬如生物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宇宙演化规律、特别是思维发展规律等问题。

二、真正是恩格斯的原意吗？

章文中的“钥匙的意义”据他说是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逻辑眼界”的一段话为依据的。如上所论，我认为章沛同志在区分这两门科学时，并没有认真体会恩格斯以至其他经典作家有关言论的真正精神，而只是把恩格斯那一段话孤立起来考察，

^⑥ 《新建设》，1960年12月号，第39—40页。

从而作出实质上是违反恩格斯底真正原意的結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原来是这样写的：

“下面的事实也足以說明杜林先生完全不懂辯証法的本性，他認為辯証法是某种单纯証明工具，正象由于狹隘的理解可以把形式邏輯或初等数学看成是这样的工具一样。可是甚至形式邏輯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辯証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而且，辯証法突破形式邏輯的狹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上也有相同的相互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至少就总的說来，是在形式邏輯的范围内活动的，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按其本质來說也不是别的，而是辯証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简单的証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領域内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較，肯定地落到了次要的地位。可是高等数学中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証明开始，几乎所有的証明，从初級数学的观点来看，严格地說都是錯誤的。同样，象在这里那样要用形式邏輯去証明辯証法領域中所获得的結果，那么情况也必然如此。”^①

从这段話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为了駁斥杜林的錯誤看法——指出杜林不理解辯証法的全部作用，却把它看成“单纯証明工具”。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不要說处于高等阶段的辯証邏輯，即使处于初等阶段的形式邏輯，也不是“单纯証明工具”，而“首先也是寻找新結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能起認識作用的方法。恩格斯接着又說明（还是从認識作用方面說明）二者的区别：“辯証法突破形式邏輯的狹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其后即以数学作比喻，作例証，說明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各有它們自己的主要活动領域。二者的应用范围虽然不能严格划分（也不应割裂），但在某些场合主要是用形式邏輯（当然要在辯証法思想指导下），在另一些场合則主要是使用辯証邏輯（虽然也要遵守形式邏輯的基本要求）。相反地，如果企图用形式邏輯去代替辯証法，正如想用初等数学去証明高等数学的結果一样，一定会犯錯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是着重地从認識作用方面討論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异同之点，因为他原来就是从这些科学的認識作用方面駁斥杜林底謬见的。自然，甚至在这里，恩格斯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其他方面的区别。当他用数学作比喻时，即牵涉到研究对象的問題，指出初等数学是研究“常数”的，高等数学是研究“变数”的。恩格斯决不是（也不可能是）認為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区别仅仅是認識作用方面的区别，而没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区别。同样，初等邏輯和高等邏輯間的区别，前面已詳細討論过，也不可能、不應該只是認識作用或“眼界”高低的区别。无论如何，恩格斯在这里不是从科学划分的角度去討論这两門邏輯科学底全部区别的。因此，在这里，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客观基础和适用范围等方面去討論二者的区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引用恩格斯这一段話去“証明”形式邏輯和辯証邏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8—139頁。

輯的區別僅僅是“主觀視野”的區別，我以為却是錯誤的。

三、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是否對立？

章文關於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底關係的討論，不但沒有從社會實踐的需要、研究對象等方面予以區分，也沒有把經過“修正”的、在辯證法指導下的形式邏輯和舊的形式主義邏輯加以辨別，因此對形式邏輯作出不正確的斷語，從而無法正確闡明二者的關係。他說：“要了解形式邏輯的‘狹隘眼界’即‘同一律的眼界’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眼界，必須從同一律的認識論特點分析着手。同一律規定着思維形式（概念、判斷、推理等）的自我同一。……客體的運動被固定下來，被僵化了。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內含着相互同一性。……相互同一性排除着差異，形成了沒有內部差異的抽象同一性。……由此可見，‘同一律的眼界’包含着幾個特點，即局限於自我同一，局限於同異，局限於單一的形式。因此，同一律的眼界，形象地說來，就是僵化的，抽象同一的、碎片化的眼界。”^⑭

由於章文全部貫穿着對形式邏輯的這種看法，它對“形式邏輯”的估價是很低的——把形式邏輯用作形式主義邏輯的同義語。在最後一段結語中，這種混同的思想更為明顯：“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的區別……歸根到底，是能不能自覺地分辨出和掌握住現實世界中客觀辯證法的全部豐富內容並以之作為思維方法來指導自己的思維的區別。”換句話說，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根本分別就是前者能夠如此，而後者不能。試想：不能用唯物辯證法思想作為思想方法來指導自己的思維的形式邏輯，是什麼樣的形式邏輯呢？不用說，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思想指導下的形式主義邏輯。（儘管專門研究辯證邏輯和專門研究形式邏輯不是一回事，但要正確地理解和運用形式邏輯，必須對辯證邏輯具備一定修養，並以之為思想指導去探索形式邏輯的形式和規律。）是否接受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指導，應該是新邏輯（經過修正的、科學的形式邏輯）和舊邏輯（形式主義邏輯）的主要分別之一。

章沛同志認為形式邏輯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僵化”、“點截化”、“抽象化”）；“這些形式邏輯的局限性，是要用辯證邏輯才能加以克服的”，而且“……克服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實質就是辯證邏輯的出現”^⑮。因此，如果用辯證邏輯作思想指導去修正形式邏輯，就會把形式邏輯變成辯證邏輯。因此，形式邏輯已經沒有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下修正的可能和必要。一定要修正，那只有用亞理士多德的观点（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观点）作思想指導。他說：“在形式邏輯中去除形而上學雜質的首要問題，在於正確地解釋作為形式邏輯最基本規律的同一律。必須恢復同一律等三個基本思維規律的亞理士多德的解釋，把形式邏輯理解為在‘同一’的範圍中的思維方法”。^⑯又說：“……

^⑭ 《新建設》，1960年12月號，第37—38頁。

^⑮ 同注⑭，第66頁。

^⑯ 同注⑭，第63頁。

要划清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学的界綫，清除杂质，必須从形式邏輯的基本思維規律的正确解釋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決問題。”²¹

我認为要划清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学的界綫，不但对于几个基本的思維規律应作正确解釋，对形式邏輯中的一切形式規律也都应有正确的理解。而所謂正确的理解，就是（而且只能是）在唯一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的理解。章沛同志口头上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但实际上是否定的。因为，如上所述，他以为用唯物辯証法的观点去指导形式邏輯，就会“……把形式邏輯变成了辯証邏輯，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形式邏輯”。²²

章沛同志这种不以唯物辯証的观点作形式邏輯的思想指导的观点，是和他以“主观視野”作为分別兩門邏輯的唯一区分标准的观点分不开的。因为如果它們的区別的确只是“眼界”的区別，那末，用唯物的、辯証的观点作思想指导去理解形式邏輯的形式規律似乎就会混淆二者的界綫。其实，形式邏輯决不会因接受了辯証法的指导而变成辯証邏輯，正如物理学不会因接受辯証法指导而变成哲学一样。因为，上面已討論过，二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从研究对象及有关的产生根源，客观基础等方面作出分別。

其次，只要我們承認形式邏輯的形式規律具有客观的依据，因而也能适用于有关的方面，那末，在这种意义上，也是要把它的眼界“强加”于客观世界的。譬如同一律的客观基础主要是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质的規定性，因此它也能适用于这种情况下的事物——我們可借以断言同一事物在同一時間，同一意义下保持同一性质。这岂不是把这种規定“强加”于客观世界了嗎？难道同一律只应该“表现着抽象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²³嗎？难道形式邏輯可以脱离客观世界而成为只研究思想与思想間关系的學問嗎？难道形式邏輯应该“只要求着：‘在同一思維过程中，每一概念和它自己相同’”²⁴嗎？这不可能是唯物辯証法指导下的形式邏輯的定义，而只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指导下的形式主义邏輯的界說。

章沛同志为了說明“悟性思維”的“同一律的‘眼界’”的局限性，很想从感性認識方面找寻它的根源。他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感性認識的理論，然后接着說：“所以悟性思維就对过程中的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过程、过程的点截、片面、片面的变化过程、关系等等，都通过悟性的概括而抽象成为各个具有独立性的单一的思維形式。这样，原来联系在一起的統一的东西，就被独立的单一形式分割成为‘碎片’。”²⁵这样解釋“悟性思維”的“同一律的‘眼界’的局限性”，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明确地指出：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过渡，是一种“飞跃”或“突变”——从事物的现象、片面，外部联系的認識过渡到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的認識，可见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感性認識会发展为正确的思維（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²¹ 《新建設》，1960年10—11月号，第64頁。

²² 同注²¹，第66頁。

²³ 《新建設》，1960年12月号，第87頁。

²⁴ 《新建設》，1960年10—11月号，第63頁。

²⁵ 同注²⁴。

所謂“悟性思維”的“同一律的‘眼界’的局限性”，其实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局限性；黑格尔所指責的“悟性思維”的缺点，其实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形而上学的范畴”的缺点，所謂“悟性思維”的“同一律的‘眼界’的局限性”，不应从感性認識方面去找尋，而应从作为思想指导的世界观方面去找尋。

在章沛同志看来，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是处处“相反”的。他說：“因而，形象地說来，辯証邏輯对立同一律的眼界刚刚和形式邏輯的狹隘眼界相反，它不是僵化的，而是灵活的、流动的；它不是抽象同一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碎片化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②⑥}这种把兩門邏輯科学加以对立、割裂的看法是目前較流行的一种錯誤看法（我們自然也反对把二者混淆）。从这种观点出发，如何能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教导，說明它們是（也應該是）同一系列的、在理論上彼此一致、在实用上互相調协的科学呢？如何闡述它們的高等、初等或指导、被指导的关系呢？如何解释它們的許多共同之处呢？（尽管它們也有不少的区别）

不錯，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旧邏輯”的缺点（如表面、片面、分离、孤立、僵化地看待事物或問題），并拿它和辯証邏輯相对比。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指出：“辯証邏輯和旧的純粹的形式邏輯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維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論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联系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辯証邏輯却以此推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們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們互相隶属，从低級形式中发展出高級形式。”^{②⑦}旧的形式邏輯之所以有許多缺点，主要是因为它还没有接受唯物辯証法的指导，而依然是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指导下；人們把它“絕對化和超絕化”，把它当作世界观。指明它的缺陷就是指明它的修正的必要性。后来列宁在《哲学筆記》中一再指出旧邏輯理应受到蔑視和嘲笑，在《再論职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中明确地指出它必須修正，并为这种修正提供了正确的方向：要清除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應該結合实际；應該承認它的客观基础和認識作用；等等。这些都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亞理士多德的解释。照理，經過修正的新邏輯應該与“旧邏輯”大有不同，應該不再是与辯証法相反，而是彼此一致的了。如果承認它应接受辯証法的指导，又断言它处处与辯証法“相反”，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它不應該再象修正前那样：表面、片面、分离、孤立、僵化地看待事物或問題了，因为它已經有辯証唯物主义作思想指导。

旧邏輯是形式主义的“純邏輯”，只管形式的妥当，不問内容的真实与否，否認实践对于它的重要意义；否認思維底形式规律的客观基础和認識作用；拒絕用相互联系、轉化的观点作思想指导去理解思維的形式和规律——使形式邏輯变成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实际是为剝削、統治階級服务。相反，經過修正的新邏輯既要管形式的妥当，又要过問内容的真实；承認实践对于它的重大意义；承認思維底形式规律的客观基础和認識

^{②⑥} 《新建設》，1960年12月号，第38頁。

^{②⑦}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頁。

作用；要用相互联系、轉化的观点作思想指导去理解思維的形式和規律；^②处处要結合实际，为人民服务。

自然，經過修正的形式邏輯在認識作用方面还是有它的局限性的。由于它的形式規律主要是客观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一般特点或規律的反映，它只能解决相对稳定状态下的較簡單的問題。凭借它去認識客观事物，还是不能象辯証法那样全面、丰富和深刻。但它也不应象旧邏輯那样：把相对稳定看作絕對不变，把相对分立看作絕對独立，把片面看作全面，把局部看作整体，把现象看作本质，“把同一和对立分开来看，只能根据‘同一就是同一’、‘对立就是对立’、‘同一不是对立’的公式来思維”。換句話說，有了辯証法的思想指导，在运用形式邏輯时虽然主要是从某一方面、部分或相对稳定地，相对分立地反映事物，却不把它們“絕對化或超絕對化”，而以全面、整体、相互联系、轉化的观点作思想指导，时刻防范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入侵。譬如：在看到事物的一方面时，还知道它有另一方面；在看到它們的相对分立时，还知道它們的相互联系。在看到事物的“同一”时，还不忘記它們的“对立”；在看到事物的“对立”时，也不忽視它們的“同一”——至于“对立”和“同一”的辯証关系等等本身的專門探究和深入分析，自然是辯証邏輯的任务。

形式邏輯（經過修正的）和辯証邏輯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应是对立的。不但在理論上应彼此一致，在实用上也应互相調协。在認識作用方面，它們确有高低之分，但所謂高低，不应理解为截然不同的“兩层”，而应该更多地着重它們之間的密切关系。如果一定要用思維水平的高低区别去說明辯証邏輯和形式邏輯的不同，那末，就应该承認人們可以兼具高低两种思維水平，而且这两种水平往往紧密結合，互相为用。那些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經驗的人們（譬如伟大的革命導師們）往往能把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結合运用得很好，就是最好的說明。

总之，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虽然各有自己的主要对象和任务，各有自己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基础，但它們仍有許多相同之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作为邏輯科学，它們确有高等、初等的分別，指导被指导的关系；但在实际运用时，經常互相結合——在正确地运用形式邏輯时，必須接受辯証邏輯的指导；在正确地运用辯証邏輯时，必須遵守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有时以形式邏輯为主，有时則以辯証邏輯为主。但無論如何，在正确使用时，决不应该、也不能够是其中一者的单独使用；也只有將它們适当地配合运用，才能發揮它們的应有作用。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脫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修改

^② 譬如对于归納法和演繹法，应该知道它們的互相依存和結合运用——至于它們底辯証关系的專門探討，自然属辯証邏輯范围。

論僵化、碎片化、空洞化并非 形式邏輯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与章沛、陈政翔同志商榷

郑毅男

僵化、点截化（碎片化）、抽象化（空洞化）是不是形式邏輯的局限性或認識論特点？修正形式邏輯是不是應該克服这些东西？这是修正形式邏輯的一个关键性的問題，也是我同章沛、陈政翔分歧的一个焦点。

我在《关于形式邏輯的修正問題》（《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一文中，曾涉及了这个問題，但未具体地討論这个問題。考虑到章沛、陈政翔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这篇短文稍詳細地來討論一下这个問題，不妥、錯誤之处，請同志們指正。

章沛、陈政翔認為：“僵化（沒有轉化、发展）、点截化（碎片、沒有內在联系）、抽象化（空洞化）”是形式邏輯的注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①或認識論特点，并認為要在修正形式邏輯的时候克服这些局限性，就会“把形式邏輯变成了辯証邏輯”，就是“取消”了形式邏輯。

章沛、陈政翔提出了两个論据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論証。

第一个論据是：形式邏輯“……使思維形式局限于自我同一”，“这就形成了僵化、抽象化”、“点截化”^②。

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究竟是什么呢？

自我同一不是形式邏輯范畴，只是哲学范畴。在哲学中，只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辯証法、形而上学的自我同一观。

章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說：在辯証法与形而上学的自我同一观之外，还有一个所謂“形式邏輯的自我同一观”，这种“自我同一”是介于“自我同一被絕對化”和“……包

① 《关于修正形式邏輯的几个問題》（《新建設》1960年10—11月号合刊），以下凡引自該文的文字，均不一一注明。这里应指出：不能把認為僵化等等东西是形式邏輯的注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的观点，看作是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恩格斯所謂“狹隘的眼界”只是說形式邏輯不是世界觀，一絲一毫也沒有說形式邏輯具有不可克服的僵化等等的局限性。列宁在摘引黑格尔的看法时，也一絲一毫沒有指出僵化等等东西是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只是指出了僵化等等东西是旧邏輯的特征。所以这个观点只能說是章沛、陈政翔的观点或他們所同意的某些人的观点。

② 參見章沛：《論形式邏輯同一律的認識論特点及其根源》第2节。

含着差异、变化、发展等的自我同一”之間的所謂“……自我同一的本身”、“停滯于同一”的“自我同一”^③。我认为，这种既非辯証法、亦非形而上学的“純洁的”“自我同一观”，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承認这种东西必然会引起哲学上的混乱。——正如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外承認有所謂“第三种哲学”会引起哲学上的混乱一样。

自我同一就是自己和自己等同或自身等同于自身，也就是靜止、稳定或确定。

章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說：不能把自我同一理解为靜止、稳定。他的理由是：运动变化中的对象、不稳定的对象也是自我同一的。^④这种說法，乍看来似乎有些道理，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只有靜止地、稳定地去看对象，不稳定的东西才等同于它自身，运动才靜止于运动，运动才是不动的；相反，不靜止地、不稳定地去看对象，不稳定的东西并不等同于它自身，运动并不靜止于运动，运动并不是不动的。^⑤

思維是运动的，除了运动的思維以外，沒有别的思維。思維的运动必取一定的形式，思維形式就是思維运动的形式，思維有許多的运动形式，概念、判断、推論等等都是。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教导我們：任何东西（物质的或思維的）的本质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由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构成的，离开了矛盾就不可能理解本质为何物。思維形式也是这样，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性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不自我同一性即不稳定性或灵活性，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統一和斗争构成了思維形式的本质。思維形式内部包含着的这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斗争引起了思維形式的运动也采取了两种状态即相对靜止的状态和显著变动的状态。

形式邏輯是不是局限于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呢？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在形而上学占統治地位时期，旧的形式邏輯用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观点来处理（研究）思維形式，因而，局限于研究思維形式的自我同一，即仅仅研究概念、判断、推論等的确定性。但这只是历史上的暂时性现象，只是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学結合所产生的結果。作为一門科学說，形式邏輯并不必然的、永远的如此。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形式邏輯的变革。形式邏輯并不研究思維形式的一切方面，也不局限于研究自我同一性：形式邏輯（只）以邏輯形式为側重面研究邏輯形式和思維内容的特殊的矛盾性，从这种特殊的矛盾性的研究中发现并掌握与内容处于对立統一中的各种邏輯形式及规律性；形式邏輯在研究这种矛盾的时候，必須从思維形式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相对稳定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的統一和斗争出发进行研究，因为只有这样的概念、判断、推論，才是科学的、有实践意义的。

自我同一是不是会形成僵化、碎片化、空洞化呢？

③ 章沛：《論形式邏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載《邏輯問題討論集續集》，第400頁。

④ 同注③，第391、394、403頁。

⑤ 黑格尔在讲到芝諾反駁运动的第三个証明（“飞矢不动”）时說：“那自身运动的东西永远在‘自身同一的’‘此刻’，在自身同一的‘此处’，是在‘不可区分的東西内’。……我們不把这叫做运动，而叫作靜止”。（见《哲学史講演录》第1卷，第290頁）

計我們从事实說起。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中的概念、判断、推論有沒有自我同一性、确定性呢？肯定地說：有；那末，是不是就形成了僵化、碎片化、空洞化了呢？肯定地說：沒有。对于这个問題，章沛、陈政翔所作的可能的解释是这样：馬克思他們是用辯証邏輯克服了形式邏輯的局限性。然而，根据章沛、陈政翔的观点，克服这些局限性則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形式邏輯（推論下去就是：在任何科学的思維中、任何科学的著作中，都要克服这些局限性，所以，在任何科学的思維中、任何科学的著作中，形式邏輯都将被“取消”）。这样，不可避免的結論是：馬克思他們一方面教导我們学习形式邏輯、說形式邏輯有用、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形式邏輯在事实上又要被“取消”。

那末問題究竟在哪里呢？問題就在于：自我同一性、确定性并不等于僵化、碎片化、空洞化。自我同一、确定是思維形式的一种性質、一种状态；而僵化等等則是抛开实践、思維内容和过程，抛开发展、变化、对立統一的結果。^⑥

思維形式的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会轉化为僵化等东西。什么条件呢？列宁教导說：“这种（概念、思維形式——郑注）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运用——折衷主义与詭辯。”^⑦

同理，只有对思維形式的确定性加以主观地运用，才会造成僵化等等东西。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事物，就是一种主观主义，因为它不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所以，只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处理思維形式的确定性才会轉化为僵化等等东西。

如果对思維形式的确定性加以客观地运用，即根据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它，那末它就絕不会形成什么僵化等等东西。

綜上所述，形式邏輯的僵化等等并不是形式邏輯“使思維形式局限于自我同一”的結果和特点，相反，倒正是形式邏輯形而上学化的結果和特点；修正形式邏輯不是不能动这些东西，相反，倒正是首先要克服这些东西。

章沛、陈政翔的第二个論据是：形式邏輯的僵化等等“不是人为的規律，它总結着人类悟性思維的規律性，有其在思維中的認識論根源”。也就是說：“形式邏輯同悟性思維之間”有着“內在联系”，形式邏輯具有“悟性的特征”，形式邏輯是悟性思維的邏輯。^⑧

悟性思維究竟是什么呢？

章沛、陈政翔說：理性認識分为悟性的、辯証的环节（小阶段），悟性思維是理性認識的一个环节。^⑨悟性思維“接受感性材料（表象），加以概括、抽象”：从認識形

⑥ 參見拙作：《形式邏輯必須根本改造》（《新建設》1960年12月号）“旧邏輯体系批判”一节。

⑦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頁。

⑧ 并見章沛：《論形式邏輯同一律的認識論特点及根源》、《論“邏輯眼界”》。

⑨ 认为悟性是理性一环节的論点仅见于《論形式邏輯同一律的認識論特点及根源》一文。章沛、陈政翔在《关于修正形式邏輯的几个問題》中只說：悟性思維是人类思維运动过程中的超感性認識、尚未达到辯証思維的一个阶段。而未具体指明悟性思維是否属于理性認識阶段。两文同时于1960年11月发表，我們无从确定那个說法是最后說法。根据推測，我們姑以《論形式邏輯同一律的認識論特点及根源》一文的論点为最后說法。

式上看，它表现为“从表象到概念的飞跃”；它的特点，集中到一点上说，就是“从表象到概念的飞跃”使得“对统一的现实世界的割碎、僵化有了新的发展”^⑩。他们认为，这个论点和《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不是相冲突的，而是一致的；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来源于恩格斯、列宁。^⑪

章沛、陈政翔关于悟性思维的论点和《实践论》究竟是不是一致呢？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差别，而是有了性质上的差别。”^⑫

从表象到概念的飞跃是认识过程的突变，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感觉材料经过思维的改造（只要是科学地）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章沛、陈政翔认为从表象到概念是使现实世界更碎片化、更僵化了的论点是错误的。

章沛、陈政翔可能说：我们说的是理性认识的低级阶段——悟性阶段，毛泽东同志说的是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辩证阶段。我认为，理性认识或思维并没有什么非辩证的（悟性的）、辩证的环节之划分。硬把理性认识或思维分为悟性的和辩证的环节或阶段，认为在悟性阶段思维改造感觉材料（“接受感性材料，加以抽象、概括”）只能形成一个对现实更加割碎、更加僵化的概念，然后进到另一个所谓辩证阶段才形成了不是割碎、僵化现实的概念，正是否认了在认识过程中，思维根据于实践基础对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科学地改造，就可以达到“……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⑬

章沛、陈政翔还可能说：我们说的是主观辩证法问题，即人们是否自觉地掌握和运用了辩证法的问题。我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的确经历了自发的辩证法、形而上学、自觉的辩证法等阶段，一个人的思维发展就其自然过程而言也可能重复这几个阶段（但如同在一定条件下一些民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样，在现代，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人的思维发展也具有一下子就跃进到自觉的辩证法阶段的可能）。但是，当人们一经自觉地掌握了辩证法以后，他就势必（应当、必然）要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到他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认识的全过程中去，而绝不会是先“留一手”（即在理性阶段的前半截不用辩证法），最后，到了理性阶段的后半截才拿出“真本事”来。这叫做一个人的具体认识过程不同于他个人的认识能力的成长过程以及整个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当然有共同性）。例如，我们到一个人民公社作调查，看了许多的东西，听了许多人的说话，收集了许多的材料，然后分析研究这些材料……，这中

⑩⑪ 并见章沛：《论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认识论特点及其根源》。

⑫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4页。

⑬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0页。

間，从一开始就要自觉地用辯証法，絕不是先非辯証一下、悟性一番，然后才用到辯証法。誰不这样作，誰就要不可避免地碰釘子、犯錯誤。

总之，在人的思維过程中根本不存在着什么悟性思維这个阶段或环节。然而，这并不是說它在思維现实中一点“影子”都沒有。思維能主动地改造感觉材料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多种因素，是多方面的规定性、多种因素的矛盾統一体，其中包括思維的分析、抽象等作用。章沛、陈政翔把思維的矛盾統一体中的分析、抽象等作用抽出来，使之孤立化、夸大化，这就形成了所謂思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悟性环节或阶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結果实的花”。^⑭

章沛引証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中关于黑格尔的悟性和理性的区别“有一定的意思”的論点，认为这就是承認了悟性是思維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实恩格斯的这个論点只是說黑格尔的这个区别中含有合理的內核，这个合理內核不是别的，就是“依照这个区别，只有辯証思維才是合理的”，辯証思維“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⑮。

章沛、陈政翔屡次引証列宁《哲学筆記》第262—263頁中的一段話（即“如果不把不間断的东西割断……”这一段話），认为这就是談論悟性思維的特征。事实并不是这样。列宁那一段話是針對黑格尔的下述論点而說的，即黑格尔在《哲学史講演录》第一卷讲到“第二个証明”时說：思維把不間断的时间 and 空間分割成了間断的各个点、限度，而物体的运动又必須通过它們，这是一个“困难”，黑格尔說造成这个“困难”的是思維，又說思維也能克服这个“困难”。列宁針對黑格尔的这个論点写下了章沛、陈政翔引証的那一段話。列宁的那一段話并不是談論什么悟性思維的特征，仅仅是說：把不間断的东西割断等等并不是思維給运动造成了什么“困难”，而是不这样思維便不能描述运动（要注意：仅仅割断并不能描述运动），以及“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描繪全部自然界……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⑯

那末，章沛、陈政翔关于悟性思維的論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黑格尔把思維过程分作“抽象的或知性的（知性即悟性，下同——郑注）”、“辯証的或消极理性的”、“玄思的或积极理性的”二个阶段（环节）。^⑰黑格尔认为在思維过程的悟性阶段中，思想的特点是：局限于“堅执的，孤立于异之外”的自我同一，即抽象的同一：“将一本身具体的事物轉变成……單純的形式”；“抽象的同一只是对立者之一面”^⑱，等等。“在辯証的阶段中，这些有限的概念扬弃它們自身，并且过渡到它們的反面。”“玄思的或积极理性的阶段于概念的对立中而認識到它們的統

^⑭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2頁。

^⑮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185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⑯ 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4頁。

^⑰ 黑格尔：《小邏輯》，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83頁。在哲学上，第一个确定地区别悟性和理性、认为悟性是認識的一个阶段，并认为形式邏輯是悟性邏輯的人，不是黑格尔，而是康德。

^⑱ 同注⑰，第183—184、256、267頁。

一，或于对立双方的分离和过渡中，而認識它們所包含的肯定。”^⑨

黑格尔把思維过程划分为悟性、消极理性、积极理性三个阶段，虽然含有思維形式之区分为低级和高级、強調辯証思維的合理性等合理内核，但是，从整体上看，他却是从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思維、划分思維过程的。他把思維矛盾統一体中的分析、抽象等作用孤立化、夸大化，排除于理性之外，使之成为思維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悟性阶段，并把玄思尊为至上，从而完成了他对于思維过程的“正、反、合”划分——把这三个阶段作为“正、反、合”的填充料，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完全一致的，十足地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神秘和晦涩。章沛、陈政翔虽然認为他們不同于黑格尔的对于思維过程的划分、不把悟性排除于理性之外等等，但这改变不了事实上他們毕竟是接受了黑格尔的传统，把悟性思維認作了思維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的、非辯証的阶段，特别是改变不了他們事实上是完全按照黑格尔的說法描述了悟性思維及其特点，而这些正是黑格尔的悟性思維观点的根本所在。

黑格尔認为形式邏輯是悟性邏輯（即“知性邏輯”），辯証邏輯（“玄思邏輯”）是理性邏輯；他是哲学史上第一个确定地提出辯証邏輯以与形式邏輯相区别的人。黑格尔所謂形式邏輯是悟性邏輯，不是別的意思，只是說：形式邏輯的形而上学化就是形式邏輯本身、形式邏輯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維理論，形式邏輯、形而上学同是悟性思維的产物。所以，他处处把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学列在一起作为辯証邏輯的对立物予以排斥、否定。

章沛、陈政翔認为形式邏輯是悟性邏輯，形式邏輯具有僵化、点截化、空洞化的悟性特征，正是接受了黑格尔的传统，特别是和黑格尔一样把形式邏輯的形而上学化認作了形式邏輯本身。不过他們又不同于黑格尔，这就是黑格尔否定具有僵化等等特征的形式邏輯，章沛、陈政翔則認为僵化等等是形式邏輯注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或特点。

綜上所述，形式邏輯的僵化等等并没有什么客观必然性，并不是人类悟性思維特征的总结，并没有如章沛、陈政翔所說的認識論根源，相反，形式邏輯的僵化等等正是根源于形式邏輯的形而上学化、唯心主义化。

^⑨ 黑格尔：《小邏輯》，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87、182頁。

論企业生产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

严克柔

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是一个不停頓的运行、不断更新的长流。这条长流并不是直綫地、平靜地流去，而是迂回曲折、波涛起伏地流去的，其中，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在發揮作用。我們的責任正是在于发现这条規律在企业生产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探寻不平衡的性質和根源，找到从不平衡轉化为平衡的方法。这是企业計划工作的核心，也是全部企业工作的核心。目前，在貫徹国民經济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針的时候，研究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尤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实践的意義。

—

有人認為，只有資本主义經济才会出現不平衡，社会主义經济是沒有不平衡的，因为社会主义經济是有計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起支配作用，而不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在起支配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資本主义經济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社会主义經济也是一样，有平衡的方面，也有不平衡的方面。問題是資本主义的平衡和不平衡，和社会主义的平衡和不平衡有着性質上不同的区别。資本主义的不平衡是由于生产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會化这个对抗性矛盾引起的，它的平衡是通过周期性的經济危机才能达到的。社会主义的不平衡并不是对抗性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社會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的平衡是可以通過国家自觉的計划去实现的。有人一提起不平衡，就象提起“老虎”一样，觉得可怕。其实，“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国民經济的发展，包括企业生产的发展，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充滿着内部矛盾的斗争和統一的运动过程。矛盾的斗争引起了事物的不平衡，矛盾的統一又給事物带来平衡。矛盾的斗争是絕对的，因而不平衡是絕对的，矛盾的統一是相对的，因而平衡就是相对的。毛泽东同志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时的相对的統一。过了—年，就整个說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統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

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①毛澤東同志在這裡說得很清楚，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律，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不是有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就沒有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恰恰相反，這兩個規律是有密切聯系的。正因為有不平衡、不按比例的情況，才会有有計劃、按比例的要求。社會主義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能夠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

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就是如同列寧說的：“經常的、自覺地保持的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②。但是要達到經常地、自覺地保持平衡，做到計劃性，並不是輕而易舉的。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只是提供了通過計劃來實現平衡的可能。從可能性到現實性是有一個過程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的計劃是主觀的，要求兩者的相互適應就要有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如果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就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人為地破壞平衡，或者使不平衡的情況更加嚴重。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不同。資本主義經濟是自發性的，要通過危機才能達到平衡，社會主義經濟卻是自覺性的，通過計劃安排可以達到平衡。不過社會主義經濟的自覺性和計劃性卻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是主觀和客觀的認識一致。然而，我們對於客觀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很完全的。對於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全部合乎客觀規律的。一定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基本合乎規律，有些計劃則不合乎規律或基本上不合乎規律，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要經過曲折的發展，要經過不斷的修改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這樣，人們就逐漸認識了客觀規律，綜合平衡的計劃也就比較可靠了。

一個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縮影，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對企業同樣起着支配作用。整個社會經濟是由無數的經濟單位構成的，因而每個企業對於社會經濟的平衡和不平衡起着籌碼作用，反之，社會經濟對於每個企業生產的平衡和不平衡也起着決定的作用。為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平衡，也為了企業生產的平衡，決定性的一環是國家加強企業的計劃管理，而企業則絕對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然而，真正做到計劃性，就要深刻認識和掌握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及時發現不平衡，及時求得平衡。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3頁。

^② 《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6頁。

要認識企业生产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首先就要分析企业生产的矛盾运动，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平衡和不平衡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内部矛盾的矛盾运动所引起，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外部即大范围内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我們的研究，暂时撇开大范围内矛盾运动的情况，先行研究企业内部矛盾运动的情况。企业内部矛盾的矛盾运动，是企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的矛盾斗争所造成的。那末，企业的劳动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有什么要素构成它的矛盾运动呢？馬克思說：“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間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調节，来統制人与自然之間的物质变换。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資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③这种人与物的对立，在人一方，是人自己和他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自身；在物的一方，是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它們之間結合和分离，它們的对立和統一，构成了劳动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經濟組織里，作为劳动的人是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的物的主人，而不是物的奴隶。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們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制約，它們的結合是有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的条件、历史的条件、社会的条件和人为的条件。因此，它的相互适应只是相对的，它們的不相适应才是絕对的，从而形成了平衡和不平衡的波浪式发展的进程。

在生产劳动諸要素之中，劳动手段是一个中心环节。这不仅因为它是处在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間，把劳动者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去，使整个劳动生产成为可能；而且，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程度和性质的决定因素。因此增加和提高劳动手段，則是发展生产力的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任何劳动手段的增加、革新和提高，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破旧的平衡，要求劳动力和劳动对象与之相适应。可是，增加和提高劳动手段，也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約，除了社会关系的限制之外，还要受到生产力其他諸要素的制約，就是受到劳动者的增长和成长与及劳动对象的来源和供应的制約。由于这些制約，使得企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走着平衡和不平衡的波浪式前进的道路。

先从劳动手段和劳动者之間的矛盾运动來說。现代化劳动手段发展的过程，需要有劳动者从低級劳动变为高級劳动，即把手工操作的劳动者变为机器操作的劳动者的过程。这里需要两个变化过程和解决两个矛盾。第一、需要有把劳动者从低級劳动手段部門調整到高級劳动手段部門，特别是需要把农民变为工人的过程。一个企业的新建和扩建，都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来源多半是来自手工业和农业的。但是，分配社会劳动力是要按一定比例的，决不应该随意地从这个部門抽調劳动力到那个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1—192頁。

部門。要發展現代化的勞動手段，就要發展重工業，而重工業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在短期內提供生產物的，如果過多地把勞動力抽調去從事這種生產，就勢必影響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馬克思說：“有各種事業，它們會在長期間取去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但不會在這期間內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生產物。有各種事業，則不僅在一年間，繼續地或多次地，取去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且也同樣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社會化生產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決定前一類事業應以什麼規模進行，才不致有害於後一類。”^④ 在重工業給農業提供大量的現代化勞動手段，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之前，是不可能把農民大量轉移去做工人的，因此，重工業發展的規模是應該根據農業所提供的勞動力的可能程度去進行的。第二、需要有勞動者操作勞動手段從不熟練到半熟練再到熟練的過程。要使勞動手段充分發揮作用就非要有熟練的勞動者不可。但是，一個企業不會一下子就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者的。正因為多數勞動者是從低級勞動手段部門轉移過來的，因此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去教育培養。這樣，勞動者熟練程度的提高和勞動手段作用的發揮是成正比例的；而勞動手段作用的發揮和使用勞動者的數量變化是成反比例的。這就構成了勞動力數量和質量互相轉化的過程。

再看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一種矛盾運動。所謂勞動對象，就是原料、材料、燃料等等。並不是所有的勞動對象，都是自然直接提供的，除了採掘工業的勞動對象是自然已有的外，其他工業的勞動對象，都是曾經勞動過濾過的，因而是勞動的生產物。這就是說，勞動對象並不是輕易取得的，並不是取之不尽的，它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是自然條件的限制，一是勞動條件的限制。例如，自然條件不好，資源枯竭了，就限制了採掘工業的生產；農業受災了，就影響了原料來自農業的工業生產；又如，勞動條件不好，某種原料產品生產不善，供不應求，這也影響了使用這種原料的工業的生產。這樣看來，勞動手段要受到勞動對象的制約，沒有那麼多的原材料就不能建設那麼多的工廠，沒有那麼多的原材料，企業的生產規模也不可能有那麼大；反之，勞動對象也要受到勞動手段的制約，原材料生產多了，加工設備就會跟不上。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這種不平衡的情況是可能出現的。有時候，原材料供應多了，加工設備不相適應，因而要增加加工設備；有時候，加工設備過多了，原材料又供應不上。原材料供應緊張是較多地存在的情況，特別是農業遭受了自然災害，或對採掘業注意不夠，情況就更為突出。因此，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特別是原材料的優先增長，就成為一般的規律。同時，要把生產物變為勞動對象，也還要有了一個過程。有的生產物，既可以成為勞動對象，又可以成為消費對象，例如柑桔，它既可以成為食品加工工業的勞動對象，也可以成為人們吃的消費對象。而且，生產物是有種種屬性的，它可以作許許多種勞動過程的原料，例如谷物，它可以作制粉業、制糊業、造酒業、畜牧業等等的原料。正如馬克思說的：“一個使用價值，究竟是表現為原料，是表現為勞動手段，還是表現為生產物，完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頁。

全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确定的机能。要看它在劳动过程内的地位。地位轉換了，它的规定性就会改变。”^⑤因此，一个企业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原材料的供应，还要确立和搞好企业間的协作关系，因为，这个企业的生产物是那个企业的原料，那个企业的生产物，則是这个企业的原料，企业間的协作关系不确定或者中断了，都会使得原材料的供应发生問題。

此外，为了再生产的过程得以实现，还要有一种媒介物，这种媒介物就是资金，不仅扩大再生产需要资金，简单再生产也需要资金，扩大再生产需要建設资金，简单再生产需要流动资金。而资金数量的多寡，资金流轉的快慢，对企业生产的矛盾运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要增加劳动手段，要增加劳动手段，就要投放基建资金，而基建资金的来源則是依靠企业的积累。积累增加了，劳动手段才能增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才能加速；但是要积累增加，則又要发挥企业的劳动手段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新增加的劳动手段有的是不能一下子就发挥作用的，有的是可以立刻见功的，这两种劳动手段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比例，才有利于积累的增加。同时既要增加新的劳动手段，又要发挥原有的劳动手段的作用，应该新建和維修同时并举，才能避免浪费。另一方面，維持再生产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资金过少了就会周轉不灵，影响生产，过多了会积压资金，影响建設；同时，还要加速资金周轉，才能以少量的流动资金，达到更高的經濟效果。

从上述几方面来闡明的生产劳动过程各个要素之間的矛盾运动，是一个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某种劳动手段发展了，不仅使得劳动力和劳动对象跟不上，要出现不平衡，而且也引起和它上下联系的其他劳动手段不相适应，也造成不平衡。同时，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組織程度提高了，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不足，也造成不平衡。还有劳动对象供应的多寡、分配的方法、周轉的快慢，也要引起和劳动手段不相适应的不平衡。总之，不平衡是經常地产生的，因此，也就要求經常地、自觉地保持平衡，才能保証生产的正常发展。

三

不仅企业内部的矛盾运动，产生了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情况，而且，整个国民經济的矛盾运动，也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也是按照平衡和不平衡的規律在运动着。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包括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以及生产部門和流通部門，生产部門和运输部門，都是矛盾統一的关系。它們相互間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国民經济的平衡和不平衡的波浪式前进的情况。

^⑤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8頁。

现在我不想去分析这个矛盾运动的具体情况，因为它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我只是想说明，这种大范围内的矛盾运动怎样影响企业内部生产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的。如果整个国民经济是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下，企业的生产也会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然而，相对的平衡总是要被打破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时，企业的生产也不得不受到影响，而出现不平衡的状态。例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出现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出现不平衡，不能不直接影响每一个企业的生产，农业的丰收和歉收，不仅影响到原料来自农业的那些轻工业企业的生产，而且，也影响到重工业企业的生产发展。又如：工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某个部门太过突出，对生产资料 and 劳动力占用太多，就会削弱其他有关部门的生产；某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要求其他部门为它服务，要求得到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就要引起这些工业部门企业生产的变化。再如：同一个行业内部，有些企业新建，有些企业扩建，不能不引起各企业之间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还有，某一个部门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就引起了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比例关系的变化，因而影响了有关企业的生产不平衡。总之，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的情况经常出现，也就经常影响企业的生产，需要经常进行调整。

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国的工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技术力量有了迅速的增加，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已经初步地建立起来，设备和重要材料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业技术上出现了许多有效的创造发明，劳动者的政治觉悟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来的生产力的程度和性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异常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的大些，有的小些；由于经验不足，可能存在的计划安排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由于自然灾害而使农业歉收；这些，就自然地会出现某些不平衡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客观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不平衡，是直接影响到每一工业企业的生产的。农业由于自然灾害而歉收了，原材料供应减少了，商品粮减少了，自然影响工业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由于有的工业部门发展得快，有的发展得慢，出现了先进环节和薄弱环节，需要适当放慢先进环节的发展速度，而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又由于生产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起了变化，有些企业的生产任务不能与需要相适应，因而需要调整生产任务。

所有这些不平衡的状况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为了有系统地克服这个不平衡，逐步协调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有个调整的过程。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以建立新的平衡，以便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当前党中央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客观依据。而每一个企业，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工作。调整某些工业企业的任务（如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加强某些工业（如采掘工业和采伐工业）的生产能力；促使企业认真考虑提高质量和降低消耗；改进分配方法，

把原材料用在重点上；等等。因此，在一个企业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仅对于克服企业生产中的不平衡状况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克服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平衡的必要基础。

四

如何运用平衡和不平衡的规律，做好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呢？工业企业的调整工作，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企业内部各种关系之间，是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而我国又是一个大国，调整工作就更为艰巨。如何理出一个头绪来呢？一方面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大范围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要自下而上、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进行调整，即基层单位的内部的平衡。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中心环节，就是在企业中进行“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五定”担负着这样的两重任务：一方面，通过“五定”，摸清企业的底，使它有条件地逐步做到相对稳定的正常生产；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整个工业生产的计划性，为调整国民经济提供科学的根据。

在企业中进行“五定”，应当以查定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为纲，也就是说，要着重地抓第一定，以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来带动其他几定。其实，“五定”是矛盾的五个方面，它们都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但是第一定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定定不下来，其他几定也很难定，但是要定好第一定，也必须照顾其他几定的情况。定好第一定，不仅为企业本身确定指标、提出任务的依据，而且可以依照综合生产能力，计算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产品数量，为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依据。怎样来计算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生产能力一般包括三个不同的概念：一是指设备能力，如高炉按照容量乘以设计的技术经济定额得出的日产生铁能力，平炉按照炉底面积乘以设计的技术经济定额得出的日产钢能力等。二是指企业的生产能力，即指一个企业的生产设备的总体生产能力。这是企业把不同的设备能力加以综合平衡后确定的一个平均先进的生产能力。三是指部门（行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它是部门（行业）内部各个企业的总体生产能力，是部门（行业）把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从生产过程的关联上进行综合平衡后得出的综合生产能力，也是实际可能实现的社会生产能力。我们进行查定的生产能力，不是第一种生产能力，而是第二种生产能力，它是第三种生产能力的依据。当然，我们在查定企业的生产能力时，要考虑到设备的设计能力，但不是设备能力的总和，它是在原料、材料、燃料、动力一般正常供应和设备一般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不依靠基本建设和重大技术措施，经过积极平衡以后，所达到的产品生产能力，也就是修正了的设计能力。在企业内部进行小范围的综合平衡以后，还要拿到部门（行业）中去进行大范围的

綜合平衡。这就是在企业核定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礎上，根据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和厂外运输、厂外协作等条件，并考虑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綜合平衡，以核定一个地区或全国范围内某一工业产品的綜合生产能力。掌握以产品生产能力为基础的綜合生产能力，可以发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工业与运输业之间的較强和較弱的环节，以便着手調整其比例关系，核定各个企业的“五定”方案，这样，各个方面的生产能力調整好了，“五定”好了，才能有节奏地均衡地組織生产。

企业“五定”，必須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針。所謂积极平衡的方針，就是不留缺口，紧而不死的方針。查定生产能力如此，其他几定也是如此。在查定生产能力时，应该从一个企业的产品生产作业綫着眼，发现其薄弱环节，也就是查出这种产品全部設備能力的不平衡的地方，然后进行企业内部的綜合平衡，根据仍然存在的薄弱环节的能力来核定产品的生产能力，这样按照薄弱环节的水平进行平衡，就是不留缺口的平衡，由这种平衡所制定的“五定”方案，就是体现了“以調整为中心”的方案。这是一个相对的稳定，但不能长期停留在这里，还要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填平补齐，充实提高，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制定出第二个平衡方案，即是充实提高的方案。

定人員机构，是要和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而且还要注意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来完成生产任务。劳动力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这就要求先进的合理的定員和劳动定額，要求一个精簡的机构。先进的合理的定員，就是在性质相同、条件相当的企业中，在保証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人員配备相对地少，直接生产的人員和非直接生产的人員所占的比例恰当（力求合理地提高直接生产、技术人員的比重，降低行政管理人員和服务人員的比重）。先进的合理的劳动定額，就是既能比較确切地反映实际已經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又能比較充分地反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积极可靠的因素，它是在正常条件下多数工人經過努力能够达到的或者超过的劳动定額。机构力求精簡，就是要有科学的管理机构和科学的劳动組織，避免机构臃肿，架床迭屋，把过多的管理人員和服务人員，放到生产第一綫去。定員和劳动定額的制定关系到生产中人和物等方面的許多复杂的因素，必須認真研究和解决这許多方面的矛盾，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針和精簡节约的原則，把人員和机构定在先进合理的基础上。

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額和供应来源，也要采取不留缺口、紧而不死的积极平衡的方針。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等这些劳动对象和生产能力即劳动手段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一方面是力求降低消耗定額，另一方面是稳定供应来源。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取得最大的适合社会需要的經濟效果，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原则，企业要根据已經达到的水平，并估計到加强管理和合理利用的情况，制定平均先进的消耗定額。同时，国家在确定原材料分配的时候，又要采取集中力量优先供应重点的方法。因为同类型的各个企业之间，在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使用、产品质量、劳动效率等各个方

面，經常地普遍地存在着先進和落后的差別。因此，在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分配上，就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須在全面安排生产的基础上，抓住重点，首先保證重点的需要，把有限的物资优先供应那些产量质量高、品种多、物资消耗少、成本低的重点企业。这不仅使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分配有保證，而且也会促使企业降低消耗定額。

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是国家交给企业使用的生产条件。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也要根据生产任务来确定，做到紧而不死。任何的再生产，都包括有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必要的流动资金。固定资产要根据现有生产规模来核定，然后調整余缺；流动资金要根据生产周轉和商品流通的需要进行核定，严格管理、節約使用和加速周轉。

定协作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工业的生产，分工比較細，相互之間的联系錯綜复杂，每个企业都必須取得很多单位的协作，并且很好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才能保證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几年許多原有的生产和供应的协作关系已經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或者被打乱了、中断了，新的协作关系又还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因此，每个企业都要清理和整頓协作关系。原有的协作关系，要繼續保持；中断了的，要尽可能迅速恢复；由于条件变化而不能恢复的，要另行安排；不正常不合理的，也要重新安排；需要建立的新的协作关系，要迅速建立。一切合理的、必需的协作关系，都应当尽快地固定下来。凡是固定下来的协作任务要納入計劃，协作双方簽訂的經濟合同，要严格执行。

“五定”只是綜合平衡的开始，要从不平衡轉化为平衡，还要有一个量变和許多部分质变的过程，还要針對在过程中出现新的矛盾，及时給予解决。

而且，綜合平衡是要由人来执行的，“五定”方案，只是提供了綜合平衡的可能性，要变成现实，还要依靠群众的行动保證，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發揮出来。因此，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之后，就要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就是：保證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證不超过工資总额；保證完成成本計劃，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的使用期限。企业在“五定”范围内，超額完成任务的，根据多超多得的原則，按照规定的比例，在上繳利潤中提取奖励基金。这就促使企业更好地依靠群众，实行計劃管理，全面地超額地完成国家計劃。

略論社会主义国家銀行的作用

歐松江 曾祥才 王繼造

銀行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在商品貨幣關係和貨幣的支付功能進一步發展以後，就產生了作為支付中介人和借貸中介人的銀行。資本主義的銀行，是資本家的私人企業，或者是名義上是國家的，實際上是由大資本家集團支配的企業。銀行資本本身不生產剩餘價值，只是參加瓜分剩餘價值。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資產階級利用銀行的功能，加緊剝削勞動人民，攫取利潤。“銀行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資本，即變為產生利潤的資本，把所有一切貨幣收入集合起來，交給資本家階級去支配”^①。這樣，集中社會一切閑散貨幣資本，充當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的資本主義銀行，就成為把貨幣資本自發地分配給各經濟部門的特殊機構，從而“在社會範圍中造成了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公共分配制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②，“從內容上看來，這種生產資料分配制絲毫不是‘公共’的，而是適應於大資本——首先是最大的壟斷性資本——利益的私有的分配。”^③ 這樣，銀行一方面促進資本的集中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促進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又促使資本主義一切矛盾尖銳化，使生產無政府狀態更加嚴重，導致信用危機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加深勞動人民的苦難。

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政權把銀行這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工具拿到自己的手中，並使它變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工具。列寧指出：“大銀行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國家機關’，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為現成的機關從資本主義方面奪過來，而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只是要把資本主義丑化這個絕妙的機關的東西斬斷，使它成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羅萬象的機關。”^④ 社會主義銀行雖然保留了資本主義銀行的舊形式，但它的本質和作用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銀行。

社會主義銀行是國家的即全民的財產，是國家的金融管理機關。它是國民經濟各部門資金活動的樞紐，也是國家通過貨幣形式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各企業進行監督的重要

①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30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8頁。

③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頁。

④ 《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頁。

工具，它在社会主义国民經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銀行是国家銀行，它在国民經济活动中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調节分配資金；二是进行貨幣監督。两者密切联系而不可偏廢，共同为发展国民經济服务。

銀行調节分配資金的作用，是通过信用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通过其存款、放款、轉賬結算等业务活动，尽量地把国民經济中一切暫閑資金动員和积聚起来，然后又按照各經济部門生产和流通的实际情況，把資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以补国家預算資金分配形式的不足，并在信貸資金的周轉中，在各部門、各地区、各企业間进行資金調剂，以利整个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

銀行动員的暫閑資金主要有三項：一是財政性存款。包括各級財政的結余款項、待拨款項和各經費单位已領未用的财政拨款；二是各类性质的企业存款。这是企业在生产經營过程中，由于資金运动特点所决定而形成的暫閑貨幣資金；三是城乡人民儲蓄存款。这些暫閑資金，根据他們收入的不同来源，都代表着一定的不同的物資。銀行通过信貸方式集中与分配这些資金，实际上也就是在分配这部分物資，使暫時閑置的社会物質財富充分地發揮其效用。

銀行的信貸資金来源，除吸收的社会暫時閑置資金以外，还有財政撥給的信貸基金和必要的貨幣发行。国家財政撥給銀行的信貸基金，是国家財政用于增加社会积累的一部分支出，依据財政收入来源于不同的生产經營部門，都代表着一定的不同的物資。銀行取得这些資金，意味着一部分社会积累通过銀行来分配，用以增加生产和流通的流動資金。这三种不同的信貸資金来源，在一定时期内都是有限度的。財政所能撥給的信貸基金，受一定时期内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中积累与消費的比例制約；吸收的暫閑資金，則因一定时期内社会所增加的資財有一定限度，因而也是有限的。因此銀行所能动員的自然也就有一定的限度。并且存款是要提取的，銀行所能运用的仅是經常可以占用的數額；至于貨幣发行，則必須服从于商品流通的正常需要，严格控制。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們，国家銀行发行貨幣應該根据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当商品流通需要增加貨幣发行时可以相应地增加一些投放，如果票子增加，商品庫存随之相适应地增加，那么，投放虽然大了，但回籠的力量也会相适应地增大。因此，只有由收购商品需求所增加的貨幣发行，才能适应貨幣流通規律的要求。沒有物資而增加的发行，便是不正常的过多的发行，由于这种发行而扩大的信貸資源，是虛假的、不能真正解决生产經營部門的資金需要的。而且，票子多了，必然会冲击市场有限的物資，破坏正常的貨幣流通，影响物价的穩定。实践証明，銀行不能无限制地靠貨幣发行来增加信貸資金来源，那些把銀行当作求之必应的“搖錢树”，逼迫銀行无限制地增加发行的做法，必然会給国民經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

銀行調节分配資金，把从各方面积聚起来的信貸資金，对工业、商业和农业发放短

期周轉性的貸款，以滿足企業和人民公社正常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流動資金需要。這種資金勢必是要向物資轉化的，貸款在不同部門、企業使用，結果就必然產生對各種物資的需求：農業貸款需要農具、化肥等；重工業貸款需要重工業原材料；輕工業貸款需要輕工業原材料；商業貸款需要各類商品物資。而信貸資源則是依據不同的來源代表著不同的物資，因此，銀行調節分配資金，就是使物資使用方向轉移。為了使貸款能夠掌握到相應的物資，這就要求貸款的發放收回必須與物資運動緊密結合，貸款必須有相應的物資保證。銀行對企業放款，企業增加了流動資金，如果沒有相應的物資作保證，這些資金就可能轉為市場上額外的購買力，要求國家額外供應物資，衝擊國家的物資分配計劃，對國民經濟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堅持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必須與物資運動相結合，必須有物資保證，乃是發揮銀行調節分配資金作用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銀行發放貸款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生產和商品流轉計劃的實現，這就決定了貸款的發放必須按計劃進行，各項貸款指標的確定必須服從於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在資金分配與物資一致的情況下，分配了資金，就等於分配了物資，貸款分給那一部門或企業，就是該部門或企業得到了相應的物資。國民經濟計劃指標規定那些部門發展，發展到什麼程度，就要相適應的分配貸款，以保證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實現。貸款的方向和數量，由銀行信貸計劃具體規定。信貸計劃依據著國民經濟計劃指標，規定著存款放款方面的任務，納入國民經濟計劃，成為國民經濟計劃的組成部分。銀行調節分配資金要以國民經濟計劃與銀行的信貸計劃為依據，這就是銀行信貸的計劃性原則。如果銀行調節分配資金脫離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或者在執行過程中不按計劃進行，就會使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實現受到破壞。實踐證明，堅持貸款按計劃進行乃是保證信貸真正納入國民經濟計劃，從而促進國民經濟計劃順利實現的重要環節，也是正確發揮銀行調節分配資金作用的重要關鍵。銀行工作的生產觀點，首先就是遵守計劃的觀點，無計劃或者不按計劃進行的貸款，是同社會主義信貸的目的根本不相容的。

在有物資保證，按計劃地調節分配資金中，銀行貸款還必須有借有還，按期歸還。這是因為信貸資金的來源是社會的暫閒資金，具有周轉和流通的性質，只有按期歸還，才能靈活地進行調節，才能維持經常的周轉。因此，堅持貸款有借有還，按期歸還，乃是正確發揮銀行調節分配資金作用的前提條件。

二

人民銀行在分配調節國民經濟信貸資金的同時，還發揮著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各企業的貨幣監督作用。

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過來又影響生產。銀行作為組織和管理資金分配的機關，為了保證按照國民經濟計劃，按照黨在各個時期的政策要求分配資金，就必須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各企業進行貨幣監督。列寧多次強調銀行對國民經濟與企業的核算監督作用。

他說：“統一而規模巨大無比的国家銀行，……这是全国性的簿記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統計机关，这可以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⑤ 这一論断，說明了銀行信用不仅有必要与可能在資金分配上服务于經濟，而且也有必要与可能通过信用活动反映国民經济情况，監督企业的經济活动，从而又服务于經济的发展。

国家組織經济的工作，就是要不断的解决生产、交换、分配、消費等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从而推动經济工作向前发展。要解决矛盾，首先就要暴露矛盾。要正确处理和解决问题，就必须充分了解情况。銀行在国民經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它具有綜合反映国民經济情况的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商品貨幣关系存在的条件下，不少的經济活动都要通过貨幣形式来进行。人民銀行是現金中心、結算中心和信貸中心，国民經济中各部門、各企业单位的經營情况，一般都会通过它們在銀行的存款、放款、現金出納和轉賬結算等賬戶反映出来，并且具有及时、灵敏的特点。譬如，財政的收、支、結、存，反映了基建投資、社会集团购买力以及国家物資后备力量；工資的支出，基本上反映了銀行現金投放和社会购买力的情况；通过存款和放款反映企业生产和物資儲备情况。因此，銀行完全可以通过收、付、存、貸綜合反映产、供、銷、儲等方面的情况，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向經济領導机关反映，促进有关部門按照党的方針政策，采取具体措施，加以处理和解决。

銀行在反映与暴露问题的基础上，促进问题解决的有效方法，是通过銀行本身的业务活动，对企业的經济活动进行正确的貨幣監督。在我国，一切貨幣收付，都要通过銀行这口子，銀行則依据国家政策、有关规定，通过貨幣收付、繳撥、存貸等活动，把口子，按計劃按用途地使用資金，对于符合政策和計劃用途的，及时按需要支付；对于违反政策，不符合計劃用途的，則严格控制和堵住。从而通过貨幣監督活动，促进国民經济計劃的实现，促进企业改善經營管理，合理而有效的使用資金，这就是銀行更好地服务于經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重要工作。

發揮銀行的貨幣監督作用，首先就是貫徹执行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要求。国家的資金，不論財政資金还是信貸資金，抑或企业資金，都是发展国民經济的物質力量，都必须按統一的国民經济計劃，进行分配和使用，使資金用得好用得省，把錢用在“刀刃上”，从而使国家計劃所規定的項目与指标，及时得到应有的資金，保證生产建設的順利发展。如果不按計劃用錢，或者把流动資金移作它用，这就势必使該用錢的得不到錢用，影响了生产发展，而不該用錢的却多用了或多占用了，盲目地发展，打乱了国民經济計劃，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

銀行的貨幣監督作用，也是加强企业經济核算制所必需。毛泽东同志指出：“……節約是社会主义經济的基本原则之一。”^⑥ 企业要取得經營成果，就須節約地合理地使用資金。企业是否節約，是否合理的开支，資金使用是否得当，应收进来的錢是否及时收

^⑤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88頁。

^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頁。

进来，資金周轉是快还是慢，这都是資金使用能否節約、合理的主要环节。銀行对企业加强信貸、結算等貨幣監督形式，是为了使企业按計劃按用途地开支，不該支出的絕不支出，保証流动資金用于生产周轉上；消灭不合理的互相拖欠，把应收进来的錢及时收进来；减少积压，加速資金周轉。显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企业加强經濟核算的重要措施。相反，如果銀行放弃必要的監督，“有求必应”，随便供应資金，势必助长企业不按計劃乱用錢，或是搞計劃外基建，或是盲目采购，或是把流动資金用在非生产开支上，或是有了积压也不处理，別人拖欠了資金也不催收，不設法扭轉亏损局面。显然，这一切都只有削弱企业經濟核算制，都是不應該的。有些企业說：“錢多不是福，只有精打細算，合理使用資金，积极改善經營管理，才能加强經濟核算。”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

發揮銀行的監督作用，也为信用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信用是有償的短期資金調剂方式。貸款只有按計劃有物資保証的发放，貸款才能按期归还，从而保証灵活地进行資金調剂。如果銀行放弃監督，貸款发放不当，企业不能按规定使用，按期归还貸款就沒有基础，貸款形同財政支出，失去了信用的調剂能力。同时，信貸資金运用得当与否？又直接与市场貨幣流通量有关系。信貸支出，最終总有一部分变为市场流通的票子，沒計劃沒物資保証的乱貸或乱用，如用貸款搞計劃外基建、弥补亏损、除銷商品、預付貸款等，使市场票子多了，但却沒有相应的物資，于是不适应于流通需要的过多票子，就会冲击市场，引起計劃外的市场物价上涨，对生产建設和人民生活带来极为不利的影響。

由此可见，銀行正确發揮貨幣監督作用，是国家、企业、銀行的共同要求，是管好用好流动資金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和建設的重要手段。銀行調剂分配資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資金調剂，促进企业生产經營活动的发展，銀行运用貨幣監督手段的目的，也是为了使資金使用合理，促进企业生产經營活动的发展，两者目的是一致的，两者互相交錯在一起，服务里有監督，監督里有服务。过去一个时候，有些人对貨幣監督的意义有所忽視，認為要服务于企业，就不能对企业进行監督，監督就是干涉了企业，于是銀行口子把不紧，有些資金被用于計劃外基建，物資与資金被积压，企业間互相拖欠較多，亏损增加等等，因而給国民經濟的发展比例、市场、企业經營管理都带来一系列的問題。这需要在国民經濟調整中加以解决。无疑地，銀行如能正确的掌握監督原則，又有良好的工作方法，就使企业更能理解銀行監督措施的好处，更乐意接受銀行的有关建議。信貸監督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促进問題的暴露，发现資金使用上的問題。发现了問題，知道矛盾所在，銀行就通过向企业协商提建議方式，与企业共同求得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必要时还可以采用信用制裁的办法进行監督。因此，銀行不但是矛盾的发现者，而且有責任协助企业解决矛盾。自然，对于一些問題的克服，應該承認有一个过程，政策計劃是严肃的，但并不等于不問客观条件，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同时，銀行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需要，还应该区别对待。銀行的工作，無論是調剂分配資金，还是进行貨幣監督，一切活动的目的，无非是赤誠地积极地为生产服务，使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

例高速度地发展。因此，無論在任何时候或是何种条件下，支持計劃內的生产流通业务的发展，是銀行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当然，絕不能認为任何生产与資金的需要，都是銀行支持的范围。国家計劃外的生产，計劃外的需要，不适当的給以支持，反而会影响正常生产的发展，打乱了国家的計劃。銀行进行货币监督，就必须掌握区别对待原则，不能強調了按計劃、按用途，就忘掉了积极地为生产服务。国家的方針政策，就是一个方向和尺度，对計劃內正常的資金需要，应滿怀热情的支持；不符合政策的、不符合計劃的則坚决堵住，切实监督。

* * *

为了更好地正确發揮銀行的作用，銀行工作必須实行高度的集中統一。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經濟工作加强集中統一领导的必要。他說：“經濟和財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統一，關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須克服，而建立統一的、指揮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貫徹到底的工作系統。这种統一的系統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⑦銀行工作的集中統一，就是整个国民經济集中統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国民經济发展中，特别是在貫徹以調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針与市场政策时，只有切实貫徹銀行工作的高度集中統一，才能正确發揮銀行的作用，保證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保證国民經济計劃的順利实现。

⑦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97頁。

略論朱执信的政治思想

张其光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批参加了革命。随着斗争激烈展开，以至屡遭挫败，不少知识分子便消沉、动摇，甚至投降、叛变。能够始终成为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一直保持先进的杰出人物，象朱执信那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

孙中山给朱执信的评价很高。当他得到朱执信在虎门牺牲的消息时慨叹地说：“执信乃革命中的圣人！”这句话，今天来看未免过誉；但从当时民主革命处在困难时期，不少所谓“革命党人”纷纷动摇变节的情况来看，孙中山的话正出于真情实感，是可以理解的。朱执信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香凝先生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我的回忆》里面提及朱执信，也评价很高。她说：“朱执信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这番话是否有根据？可从朱执信一生的革命实践及其思想发展加以探讨而得到论证。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听其言而察其行，但总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朱执信（原名朱大符）出生那一年（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更为深重。直到朱执信东渡日本留学那一年（1905年），这二十年間，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迫中，同时革命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斗争也激烈地进行着。朱执信虽然出身在封建官僚家庭（他原籍浙江肖山，父亲当过张之洞的幕僚，但不“得志”），而他早年生活在广州，受过中等教育，且勤奋自学，受到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影响。到日本以后，很快就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当时同盟会“公推章太炎等以国学鼓吹革命，朱大符等以政治鼓吹革命”^①。从1905年到1908年，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史料，卷4，第282页，刘揆一：《黄兴传记》。

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許多文章，和君主立宪派的《新民丛报》进行思想、理論斗争。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鼓动作了出色的贡献。这一时期，有两篇文章最值得我們注意，即：1906年1月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它論述了馬克思和拉薩尔的学說；1906年6月写《論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闡发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尽管这些文章在观点上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但他显然比之当时一般民主主义者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肯定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具见年輕的朱执信的思想光芒。

自日本回国以后，朱执信直接参加軍事活动和武装起义。“自丁未（1907年）以至辛亥（1911年），凡广东革命諸役，无一不与。”^②一面繼續发表了許多政論。1912年到1914年，他坚决反对袁世凱，写了《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开明专制》、《革命与心理》等論文极力抨击袁氏窃国阴谋。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对朱执信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他写了《要运动乡下人爱国才有用》，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爱国运动；1919年他在漳州《閩星杂志》上刊发《革命党应该如何？》歌頌共产党人的革命刻苦牺牲精神。他說：“俄国的布尔雪維克的精神，只是在他們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們共产党员工作時間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給特別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作成一個革命事业。”（《朱执信集》第689頁，民智书局版。下文所引，只标明頁数）

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門联络民軍，被桂系軍閥枪杀，死时仅36岁，献身民主革命共16年。

二

朱执信是个真正勇猛的民主主义战士。在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中，以至民主主义内部革命派与妥协派的斗争中，朱执信总是站在彻底革命的立场上，行动是坚决的，思想和理論是进步的。

朱执信生平沒有“鴻篇巨著”，他写了近百篇政論文，絕大部分针对中国现实政治而发。在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和反对袁世凱軍閥窃国的斗争中，朱执信成为一个杰出的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同孙中山十分一致。朱执信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經作过許多精辟的闡发；而孙中山在后期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曾經受过朱执信思想言論的某些影响，都是有迹可寻的。

先就朱执信同君主立宪派的論争来考察：他全部立論忠实于《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駁之綱領》（《辛亥革命》史料卷2，第272頁），力主以革命求共和，成为《民报》的主干，又是清朝“預备立宪”的劲敌。

^② 《朱执信先生墓表》。載《朱执信先生殉国十周年紀念册》，广州执信女子中学印行。

丙午（1904年）清朝五大臣“出使考察各国政治”回来，即奏請早日立宪。不久，清朝便宣布“预备立宪”，企图緩和各地日益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挽救封建統治瀕于崩潰的危局。《新民丛报》贊成“开明专制”，支持清朝预备立宪欺騙人民那套把戏。民报則力主推翻清朝統治，要求通过民族革命实行共和，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民权立宪”。在这场論战中，朱执信有力地抨击了論敌，揭露清朝“预备立宪”的欺騙性。他写道：“滿州日言立宪，欲以为愚弄一世，具借保其大位也。夫其言之甚甘，且示以将实行之形，則昧昧者信之宜也。”（第7頁）接着駁斥那些認為“滿州从外患刺戟而悟变法自强之为急务”的謬論，指出清朝对外妥协对内鎮压的反动政策。他說：“夫滿州知内乱耳，何知外患？……夫所謂外患，又何損于彼？彼視汉人土地不甚爱惜，何靳以貽列強。宁有惊以为外患，复謀自新之事哉？”（第7—8頁）在当时就能够这样洞悉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真正关系，自是一种卓见。

袁世凱窃国称帝，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状态。朱执信在革命困难时期坚定地前进，在反袁斗争中又起了卓越的作用。当袁世凱丑詆共和民主为“暴民政治”，朱执信便針鋒相对地質問：“暴民政治者何？”并力辟其謬：“彼一面言国民程度不适共和，一面又不敢明倡君主之說；于是其表面仍称采国民之公意，而实际則只利用旧官僚及拥資畏禍者之一部分，以飾其行。于是凡不合于彼意者，皆曰暴民。……袁氏指广东、湖南两省为暴民专制，而謂去岁之义师为少数暴民互相煽惑。……此两省以革命党多之故，受中央（袁氏政权）之忌独甚。……在今日袁所謂暴民政治者虽絕其踪，而袁所謂暴民决不能阮誅悉尽。但使暴民不变为忠奴，則四万万人之民国，决不終成为五百余国民（按：指袁氏收买的議員——笔者）与四万万奴隶之帝国。时乎时乎！令当有变！我輩欲承認曾为真正之暴民政治而不能，恐袁氏亦复欲繼續彼所謂非暴民政治而不可久也。暴民勉之矣！”（第86—90頁）历史又証明这个預言說得很对。朱执信对于民主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是毫不动摇的，他痛恨袁世凱的反动投机的阴谋，他說：“彼徒以一身之不逞，而集怨于共和，因推怨于造成共和之人。……而当革命事起之秋，此曹审己身前此罪恶万端，假如追寻旧恶，将首丘之不获，故其栗惧甚；而其急于自表不反对共和也深。……然而始既假共和以全其身家，继又以滿廷退位为滿足。……故不敢攻共和，而攻国民程度之不足与造成共和者之为暴民。”（第85—86頁）朱执信这番話对于袁世凱的詭詐自私和野心揭露无遺。当然，較之列宁評論袁世凱來說，就沒有列宁那样深刻，那么科学了。列宁对此作了精到的階級分析，他写道：“……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階級，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凱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則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結而出卖民主派。”（《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3頁）列宁对袁世凱这个論断比朱执信深刻得多，而朱执信的論断比之当时許多中国民主主义者來說，还算高明的。当时甚至孙中山对袁世凱的反动阴谋也沒有看透，存着幻想与妥协态度；可见朱执信的政治见解确有“出类拔萃”之处。

在他許多政論中所持的基本观点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思想，其特点却在于較之同时代的民主主义者（如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等）更彻底，因而更伟大。

概括朱执信的政治思想，可归結为下列几个要点：

第一，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改良主义，反对調和論。他認為非革命不能立宪，不革命就无以“創造秩序”。他把革命理解为打破旧秩序和創立新秩序的过程。“秩序是永远有的，永远的秩序是沒有的；永远有秩序，所以革命是改造，不是毁灭；沒有永远的秩序，所以有进化，有革命，有改造。”（第507頁）他痛感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华民国”徒然得到一个虛名，曇花一现的民主秩序已被糟蹋，他便呼吁要恢复民主秩序，起碼要恢复“民尊官卑”、“言論自由”、“集会結社自由”这三种秩序，才能談得到創造秩序。

第二，极力主张民主立宪，要一种能表现人民的威力的宪法，而不要仅仅代表少数人的权利的宪法。所以他不仅反对清朝的君主立宪，还坚决反对“开明专制”和所謂“优秀分子”的立宪。他痛切地說：“国民现在已經完全自觉他有威力了，那就宪法应该把人民的威力表现出来。除了能够把国里人民和他种势力的关系完全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够成为有实用的宪法。你几百个人关了門自己做的宪法，只配自己用，不要拿出来污蔑国民。”（第417頁）朱执信把社会政治的进步，寄托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上面。他說：“吾人今日所当致力者，在促起人民之觉醒。而政治之改良，实恃人民之認政治为一己之事，乃能进而不止。”（第105頁）

第三，贊成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特別強調直接民权，認為人民除有选举权外还必須有“創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他指出代議制并不能代表“民意”，于是論述“国会之非代表性及其救济方法”，認為根本的救济方法就是直接民权，尤其是“复决权”是“救济国会专橫最有效之手段”。（第288頁）在这个問題上，朱执信深受欧美資產階級政治学說的影响，曾为文介紹瑞士的直接民权。

第四，与主张直接民权相关的，就是反对集权政治，而提倡地方分权。他認為民国成立几年来的灾祸，都是“統一集权的迷想同优秀分子的謬說”所造成的。他針对当时北洋軍閥借着“統一集权”企图扩大对全国的統治，予以抨击：“你們一听见地方分权，便怕得要死；听见联邦政治，便几乎要洗耳逃尧，大概总以为沒有集权政治便不成其为国家了。……中国人民除了分到各县的小区域以外，他的民权政治无由发生；中国人民除了分县各自改良之外，也沒有进步的机会。”（第421頁）这种见解是足以反映当时中国各省人民对抗北洋軍閥而希望地方自治的要求的。

第五，支持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并且認為学生运动必須联合工农群众。他說：“关于全国事情的群众运动，也一定要通于各階級各地方，才有效力。群众运动沒有形成之先，要有一个共同信念，逐漸結晶，到后来就变成了无可抵抗的力量，所以最忌是局限于一地方一階級。”（第555頁）

第六，認為只有“社会解放”才能使妇女彻底解放。他說：“如果男子解放完了，

女子的解放也就完了；女子沒有解放完的时候，男子断不能算是解放完。”（第429頁）这个见解，和馬克思主义者論述只有无产階級获得解放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的观点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并不那么确切罢了。

从朱执信的政治論著看来，具见其学习西方的新道理用功的勤奮。毛主席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时期內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怀疑的很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4—1475頁）朱执信正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求进步的人物。他学懂日本文和英文，后来又学俄文，讀了许多外国书，对于西方资产階級政治学說不限于吸收，还注意了批判——尽管这些批判是很片段的，也显得他并不盲从附和。在《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一文中便批評了欧美的国家学說：“在英美之学說，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为国家目的，即国家为国民自由幸福而存在者也。政治上之个人主义，洛克、休蒙（休謨）、卢梭之学說，至今犹存其外形，与功利主义之边沁、弥勒（穆勒）相应，以支配国民之思想。顧于实际，所謂最大幸福者，果最大多数之幸福乎？抑最大少数之幸福乎？所謂国家为个人自由幸福而存在者，为國中全体之个人乎？抑其为一部分乎？个人主义之国家，一方面对于国内要求大部分国民之牺牲，无异国家主义之国家；一方面对于国外，仍以統治异民族为根本政策，实行帝国主义，亦无异国家主义之国家。”（第182頁）能够这样指出資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的虛伪性，在我国旧民主主义者行列中是很少有的。所以，当我们探討朱执信的政治思想的时候，单肯定他是一个资产階級民主主义者是不够的。应该注意朱执信思想发展的后期越来越警觉到资产階級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問題，从而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傾向。

三

我們不能設想朱执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正确地認識馬克思主义。值得我們重視的却在于：尽管朱执信对于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仅有着許多模糊的認識，毕竟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階級斗争寄予同情；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說曾加以传播。他在1906年所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已能初步辨識馬克思学說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說：“前乎馬尔克（即馬克思）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資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由来，与謀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聞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資本家因訕笑之，以为烏托邦空想，未可得薪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家自为計之未审之过也。夫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第59頁）

朱执信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能够承認和贊成階級斗争，能够指望依靠工农劳动人民来夺取革命的胜利，也是进步的有远见的思想。1920年1月朱执信写《沒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支持工农劳动人民为生存权利和劳动权利的斗争，同情丧失生存权

利和劳动权利被迫淪为“土匪流氓”而轉入革命队伍的工农。他写道：“现在的社会組織威逼到他的生存权和劳动权上头，所以他們对于这种社会組織的打破，不能不認做他們的权利。”（第453頁）他又認为階級斗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駁斥“階級斗争由野心家煽动而起”的謬論。他說：“社会上这种生活不安，是逼人而来。沒有野心家，革命也是不能免的。讲到将来經濟上的階級斗争，也是如此。沒有能力，就无从煽动；有了能力，不要等煽动，也会爆发。……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离了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沒有真正的力量。”（第666頁）朱执信这里所指的“中国的革命”，只是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重視工农劳动人民的观点，还仅仅是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还没有認識到（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国民主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领导，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当时中国工人階級也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階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3—644頁）尽管这样，朱执信已經看到中国工人力量的不断增长及其伟大前途。这是当时許多民主主义的知識分子不可企及的。他这种进步的见解，同孙中山后来“扶助农工”的政策思想完全一致。民主主义知識分子能不能同工农劳动人民結合，这是能否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标志。看来，朱执信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朱执信因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产生了信念，而且表示要作“有益有力”的主张，曾见諸与友人論学的书信。他写道：“共产主义与自由恋爱主义，以思想及物質上趋势論，为进化过程将来可能实现之一范型（纵使非永久如此），故有实行之一日，此弟与足下共信者也。……依理論上，进化将来虽必經此階級（段），倘永无人主张，社会上不生政策之自觉，則此有害之制度不去，有益之制度不来。”（第617頁）但当他論述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就有許多糊涂思想，說什么“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以供給社会，此种实行，不必以各取所需随之。”（第618頁）正如列宁所指出：“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經歷这种高涨（按：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群众情緒的蓬勃高涨——笔者），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問題已經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問題。因此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們的主观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頁）的确，朱执信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派先进人物，在革命群众的影响下，同情社会主义而产生自己的主观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朱执信为了反击《新民丛报》对土地国有和社会主义的“譏弹”而作的《論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更其显著的反映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观点。它企图在政治上迅速推翻封建君主統治，同时在經濟上“防止资本主义”，实质是“防止无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欧美资产阶级那里吸取經驗教訓，想避免资产阶级沒落到消灭的命运，从而主张“节制資本，平均地权”，实行“民生主义”。所以列宁說：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朱执信在上述论文中就这样说：“抑于中国尚有利于速行社会革命之理由二：即中国今日富之积集之事不甚疾，一也；中国社会政策于历史上所屡见不自今日始，二也。中国经济上放任竞争之制久行而贫富今尚不甚悬隔……社会革命之业轻而易举。”（第30—31页）这种论调正是列宁所指出的“极其反动的空想”。可见当时民主派与立宪派关于社会问题的论争，各有各的错误。《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中的第十二项这样写：“《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辛亥革命》史料卷2第273页）这反映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害怕和反对社会主义；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则企图利用和“自制”社会主义。

基上所论，我们引用马克思论断英国诗人雪莱的精神来估计朱执信的思想发展前途就并非没有根据了。马克思说：“拜伦、雪莱间真正的不同之处是：了解并喜爱他们的人认为拜伦36岁死是福，因为如果他活得很久，他会变成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可是雪莱适得其反，他们惋惜他死在29岁，因为他完全是革命的，并且必会参加到社会主义先锋队上去。”^③我们惋惜朱执信死在36岁，有着同样的理由。

对朱执信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初步探索，就此告一段落。作为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在实践上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在思想上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的革新精神；而且热爱人民、热爱科学，寄托希望于工农劳动群众，向往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逐渐汲取唯物辩证观点方法^④，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委实难能可贵。“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对朱执信作这样的推断的确很有根据。

1962年5月再稿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平明出版社版，第301页。

^④ 朱执信没有哲学专著，我们只能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就其观点与方法加以分析，便可以发现他有着若干唯物辩证观点方法。

論“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階級地位及孟子政治思想

——与李蔭农同志商榷

彭 殷 維

《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李蔭农同志的《关于孟子的階級划分論》，提出的几个問題都值得大家討論。我在第一次拜讀李同志这篇大作时，写了一些讀后言，认为《关于孟子的階級划分論》所談的，其实可归納为“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階級地位及孟子的政治思想两个問題。孟子的政治思想毋宁是孟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弄清这一部分，对全面研究孟子思想是有好处的。孟子的政治思想评价，虽不能由“氓”和“野人”及“草莽之臣”的階級地位来决定，但弄清“氓”、“野人”、“草莽之臣”是奴隶抑是农民，是本国的奴隶抑是别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无疑对古代社会或古代思想史的研究，甚至对于讀古书及譯注古书都是有意义的。

一、“氓”不是从别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

“氓”是什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曾解释为“自他归往之民則謂之氓”；兰州师范大学的《孟子譯注》，也引段說来解释《滕文公上》“愿受一廛而为氓”；李蔭农同志則引伸为“从别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按这种解释只是根据近人字义，并不符合古义；从字义上看虽然可以解释得通，但“氓”在历史上的实际内容并不是这样。历史上有許多名詞的内容有了变化，但字未改变；也有些字一直以其本义相沿至今的。什么时候起了变化，什么时候未变，这就需要根据具体問題做具体分析，比如“氓”字就是这样。用现代詞汇解释为“流氓无产阶级”，表面看来也是通的，因为恩格斯曾經說过：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5頁）。但我們却不能据此便认为中国古代的“氓”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照近人字义，“氓”虽可以解释为“自他归往之民”，“野人”可以解释为“粗野之人”，但我們却不能离开孟子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氓”与“野人”在当时所赋

予的階級內容去看問題。我們以字義去考証古史，最重要的是應該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不能專求文字的形狀相似。如果要从文字上用功夫，就必須根據文字的發展源流，以造字和說字通例多方印証，才能符合具體歷史事實的具體內容，這種方法是清代的朴學大師和近代的新史學家承認應該如此的。“氓”和“野人”等名詞在古代有它的特定時代內容，有如“百姓”、“百工”、“后”等名詞在東周以前為貴族、百官、君王一樣，我們不能根據晚出的字義認為是老百姓、是匠人、是王后；同樣，我們也不能說“氓”是“流氓無產階級”或“從別國來僑居的自由民”。

甲骨文中沒有“氓”字而有“亡”字，它的字形為“卩”狀，據郭沫若同志考証：這是象人持手杖而行，讀為盲，也就是由俘虜而來的奴隸，順從的只刺傷它一只眼睛；頑抗不服的就刺傷他两只眼睛，於是成了盲人。它和“民”字同義，是被奴隸主刺目而強迫生產的奴隸。《說文》：“亾，从入从卩（音隱），為有亡，亦為亡失”。唐《語林》說：“有亡之亡，一點一划一乙；亾失之亡，中有人”，按“亡”的假借為有無的“無”，本義也因為奴隸等於牛羊，無一善終。“亡”即是“氓”，金文《班簋》中的“氓”字就作“亾”形，義與“盲”同，是周族奴隸主統治下的愚拙的殷族奴隸。《詩經·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箋》也認為這“蚩蚩”是愚拙之貌，他是“工商食官”的商業奴隸，所抱的布是奴隸主階級的，並非他自己所有。王船山說：“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為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讀通鑑論》卷十九），這種奴隸既愚拙又被“世治”，因此，我們不難明白：“氓”在西周不是從別國來僑居而受到優待的自由民，而是周族奴隸主統治下的殷族奴隸。

“氓”又與“𡗗”通。陸德明《經典釋文·孟子音義上》說：“氓，亡庚切，與𡗗同”，這是說“氓”音與“𡗗”同，義亦與“𡗗”同，古人以同音通假，簡直把它無差別地使用。《詩經·氓》篇：“氓之蚩蚩”，這個“氓”字的本形就不是“氓”，而是“𡗗”，有唐《石經》可証，後人改用為“氓”，音義亦無差別。《矢殷》：“錫厥𡗗又五十夫”，被賜而以夫稱，又愚拙無知，可見它是奴隸。《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劑治𡗗，以田里安𡗗，以樂昏擾𡗗，以土宜教𡗗稼穡，以興鋤利𡗗，以時器勸𡗗，以疆予任𡗗，以土均平政”，這個“𡗗”連居房和農器都要統治者供給，又以下劑致之，說明它不特是奴隸，而且是生產奴隸。“氓”字又通作“萌”。李蔭農同志轉引的“不憂民氓”一語，其實不僅見於《戰國策》的《秦策》，也見於韓非子的《初見秦》篇，只是它不是“民氓”而作“民萌”。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說這個“氓”字原是“萌”字，“後人于經傳中萌字，皆改作氓”，又說：“說文眾萌字，毛本作氓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真”。這個“萌”字的通假，據章太炎《文始》說：“雙聲轉陽，變易為萌”；它的文義據賈誼《新書·大政下篇》說：“萌之為言盲也”；《前漢書》卷36《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萌與𡗗同，無知之貌”；《周禮·地官遂人》的“𡗗”，又作“萌”，鄭玄注：“萌，猶懵懵無知貌也”，原來從字義上

看，“萌”也是愚拙无知又被刺目而盲的奴隶。既无知又被刺目，既被当做物品来赏赐，又被强迫从事农业生产，我们能说它是从别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吗？

也许有人要说：战国时代的“氓”，身分有了改变，它已有离开本籍、迁徙他国的自由，因此“氓”就是从别国来侨居的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如李蔭农同志还举出：“近者悦，远者来”，“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诱三晋之人”等等为例证，来说明“农民成为个体生产者，有较大的自由”，因此“氓”就是从别国来侨居的自由民。其实，李蔭农同志在这里使用了代入法，即战国时代农民有较大的流动，于是“氓”也就成了从别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了。战国时代的人口流动是事实，各国君主争取农民或其他自由民也是事实，但李蔭农同志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明自己的论点。《史记》、《战国策》及其他先秦古籍甚多，也不见举出一条证据能说明“氓”就是当时的从别国来侨居的自由民。相反地，在《孟子》本书上如“寡人之民不加多”，仍是用“民”而不用“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禁游客之民”，《庄子·让王》：“民相逐而从之”，《管子·牧民篇》：“国多财，则远者来；地群举，则民留处”。都是用“民”而不是用“氓”来说明移动的人民。可见古人用字虽不象我们现在注意它的科学含义，但不致把奴隶硬说成农民，这是可以肯定的。书中使用“氓”字也使用“民”字，正是注意了它的对象的区别：奴隶不是农民。即使“民”、“氓”同音通假或“民氓”连用是泛指一般人民，但在同一书中分用不连，就说明“民”和“氓”的身分实有差异。这种差异起因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春秋时代，“民”和“氓”同样是奴隶身分，到了战国时代，由于许多国家生产关系的变革，有许多奴隶被解放为自由农民（如《左传·哀公二年》：“人臣隶圉免”）；也有奴隶主阶级中的某些奴隶主降为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采却管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但二者比较起来，奴隶的解放是更多于淪落为奴隶的。由于奴隶的解放，自由农民的数量增多起来，所以叫解放过来的奴隶为“民”。《战国策》·《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贖之百金，不与，乃請以左氏，群臣諫曰：‘一百金之地，贖一胥靡，无乃不可乎？’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十左氏将何以用之’”。这是“胥靡”被贖也称为“民”的一个证明。《谷梁传·成公四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这个“民”包摄士、商、工、农，又是自由民的通称。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一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民”字就是这样，在奴隶社会里，它是奴隶的通称，到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时，它就变为包括农民在内的自由民。《孟子》书中的“与民同乐”（《梁惠王下》），“民之为道也”（《梁惠王上》），这些“民”字自然指的是自由民（包括农民），但“氓”却不是这样。

将“氓”解为“自他归往之民”（段玉裁）或“民之流亡而来归者”（梁启超），是很晚很近的事，我们不能因为“民”的阶级地位有了改变，便根据近人字义说战国时代的“氓”的身分也有了改变。毛主席指示我们：“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不能以主观臆测从事学术研究。“氓”在战国时代仍是指奴隶，是因

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的残余还严重存在，所以这个名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这里试举一例来做说明：

《韩非子·难一》：“桓公不知仁义。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故伊尹以中国为乱，道为宰于汤；百里奚以秦为乱，道为虏于穆公——皆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辞卑辱，故谓之仁义。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得见，是小臣之忘民也；……是故四海之内，执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

看了这一段引文，也许有人会說：既然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难道还会是奴隶嗎？我們說：这个分职受事的“萌”正是奴隶，这从文内所引的伊尹和百里奚的事实上可以知道。原因是伊尹为有莘之媵臣，百里奚自鬻于秦，原来都是奴隶，所不同的不过是奴隶主从奴隶中提拔来“分职受事”罢了，这从“为宰”、“为虏”等字义中亦可以看出。“宰”，从宀从辛。辛，是有罪的意思。《说文》：“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甲骨文宰作“𠄎”（《铁116》）“𠄎”（《新97》），都象罪人在屋下服役。《前汉书·陈平传》：“平为宰”，《左传·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都是执贱役奴隶称呼的遗存；“虏”，从母从力，《六书正譌》：“生得者曰虏”，正是俘掳过来的奴隶。

很明显的，韩非子笔下的“萌”（氓）是奴隶，而非自由民。请再举一例来做说明：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公命柏遽巡国，致能歌者，晏子闻之不悦，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见公曰：‘霖雨十有七日，坏家乡数十，飢氓里有数家’”。

晏子在这里是把“民”和“氓”分别很清楚的，“民”是指农民，“氓”是指奴隶。农民与奴隶同受天灾同样需要救济，晏子以“民”的名义请求景公救济，如果“氓”是别国来侨居而又受到优待的自由民，则晏子自可以“氓”的名义去请求以招徕远人；而且来侨居的自由民从别国到来的时候就应受到优待，比一般的农民生活好，为什么这时还这样飢困呢？如果說是刚才从别国来侨居的自由民，为什么又被編入里籍；如果是自由民既已編入里籍，就应该称为“民”，为什么还称为“氓”呢？“里”在《周礼·遂人》中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鄩”，它是一种基层组织。齐国从管仲执政以来，基层组织的編制很为严格，“制五家为軌，軌有长；六軌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管子·小匡篇》），做到了“乡无长游，里无士舍，时无会同，春蒸不聚”（《管子·八观篇》）。在“里”中居住的有“氓”也有“民”，而“氓”又是自古被錫賜、被刺目而愚拙的奴隶遺种，它当然不是从别国来侨居的自由民。晏子之所以重視对这些奴隶的救济，一是因为“氓”的家底比“民”薄，需要救济的情况最为紧迫，奴隶主为了这生产工具的

延續，自然是知道分別緩急而先去救濟“氓”；一是因奴隶社会末期，奴隶主为緩和奴隶的反抗，也对奴隶施行一些恩惠，这在外国也有通例，我們看看苏联新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二卷下册866頁所叙述的情况就可知道，不必多說。晏子被称为春秋时代的賢大夫，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晏子的做法是这样，《晏子春秋》一书的作者（一般都肯定为战国时人所作）并没有失去晏子的原意，他是将“氓”当作奴隶来看的。

“氓”是奴隶，并不止是战国时代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秦汉时代的人也是这样。秦汉时代虽然奴隶的数字是大大减少下来，但不是沒有奴隶階級的残存，因此，秦汉人在著作中写到“氓”和“甿”、“萌”这种奴隶身分，仍然保持它的本义。如《史記·秦始皇本紀》、《陈涉世家》，都以“甿隶”并称；《汉书·司馬相如传》就直称为“氓隶”，并没有象我們近代人一样認它为从別国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自由民。而且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的著作中，遇到要說明从別国或別地来侨居的农民时，他們总是称为“客民”、“遊客之民”、“逆旅之民”、“新民”，在“民”上要加一形容詞。如《商君书·徠民篇》：“新民給芻食”，《垦令篇》：“逆旅之民”（这些“民”正是李蔭农同志所举的“三晋之人”）；而說到逃亡的奴隶时，就要在“氓”字上加一形容詞，如《呂氏春秋·高义篇》：“比于宾萌”，“萌”字上加一“宾”字；《周礼·地官旅师》：“凡新萌之治皆听之”，“萌”字上也加一“新”字，很明白的，这是指从別国逃来的奴隶。如据近人字义的解释，則“氓”既为“自他归往之民”，又加一“宾”字和一“新”字，不是变成“自他归往”的“归往之民”，或者是“从別国来侨居”的“侨居的自由民”的複用嗎？这是断难解释得通的。“宾萌”和“新萌”之所以是奴隶，除了上文对“氓”、“萌”、“甿”詮釋的理由外，从“宾萌”和“新萌”的出处亦可得到凭据作为它是奴隶的証明。按《呂氏春秋·高义篇》的“宾萌”，实际上是从《墨子·魯問篇》来的，《魯問篇》說：“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高义篇》則改为“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自比于宾萌”，“臣”与“宾萌”似乎有字面上的差异，其实在墨子以前，“臣”是豎目的奴隶，这在《令殷》、《不嬰殷》等金文中所謂賞“臣十家，鬲百人”、“錫汝弓一矢束臣五家”可以得到証明，《呂氏春秋》将“臣”改为“宾萌”正是注意了个字的历史內容；不但如此，从“度身而衣，量腹而食”二句亦可得到証明：这种“宾萌”并没有因为受到优待而过着舒服生活。《周礼》上的“新萌”，“使无征役，以地之嫩恶为之等”，这个无“征役”，不是象某些注释家所說的不納稅或出力役，而是奴隶主不相信他們，不要他們去打仗，但仍然要受“师旅”的管制；奴隶主将土地給他們耕种，也要根据土地的好坏为級差以繳納他們的收获物，連系前后文义来看，是很难解释为从別国来侨居的而且又受到优待的自由民。

二、关于“野人”和“草莽之臣”的階級地位問題

“野人”和“草莽之臣”，是否同一身分？据我看来，“氓”是“野人”这一命題

并没有错。《淮南子·务修训》：高诱注“野人曰氓”，李蔭农同志说他欠妥，可是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欠”在什么地方，只以当时情势来推测，那是很难使人信服的。李蔭农同志不相信近古的高诱而独信生在两千年后的段玉裁字义，这就很难使人明白这种信与不信的理由何在。事实上除高诱注外，扬雄著的《方言三》亦谈到：“氓，野人之称”。难道高诱注欠妥，扬雄说又欠妥吗？我们不妨再看看郭沫若同志对《墨子·尚贤上》：“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也”所作的如下的解释：四鄙之萌人，即为首都四郊所安置的农业俘虏。应该说，这是解释得很对的。因为周人代替殷人的奴隶统治，分封殷民给亲贵的诸侯国（见《左传·定公四年》），这些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就是以奴隶身分住在鄙野从事生产，也就是“野人”称谓的由来。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阐明过奴隶制时代城市统治农村的道理，是大家知道的，因此，在野外从事农业生产的“氓”是奴隶说并没有错。郑玄在《周礼·地官遂人》注中说对：“变民言萌，异内外也”，这个内外，不是国家的内外，而是《尔雅·释地》所说的“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的内外，即城乡的分别，在野外从事生产的“氓”不是可称为野人吗？

在野外从事农业生产的“氓”是“野人”，这个“野人”是农业生产奴隶，也可以在《晏子春秋·谏上》篇中看得出来，试例举于下：

“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

野人在这里被作为随便杀戮的对象，这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上记载的重耳返国在五鹿所遇的“野人”被认为是随便可以鞭笞的对象一样，他是无知而卑贱的。李蔭农同志引《淮南子·人间训》关于“野人”的一段，举出两点理由说明曾经扣留孔子的马的“野人”为自由民，第一条理由是说他敢于扣留孔子的马；第二条理由是说子贡卑辞往说不听，后来经马圉夸奖一番，他才喜悦而解马，这证明野人有自尊心和自豪感，因此，它不是奴隶而是自由民。依我看来，这些理由似乎不够充足。第一条理由是敢于扣留孔子的马，就说明他胆大勇敢吗？我们暂且不管从心理状态上去推测是不是能说明问题；即使能够，难道不可以说是因为奴隶愚鲁才敢于去扣孔子的马吗？如果“敢”是意味“勇敢”，那末，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勇敢大胆的奴隶，否则，奴隶主相互之间的战争便会出现一次胜负也没有的现象！第二条理由，说野人有自尊心与自豪感，那么，子贡那样的卑辞为什么不能给他的自尊心与自豪感以满足呢？按《淮南子》这一条故事出于《吕氏春秋·必已》篇，其故事大同小异，前者为“食农夫之稼”，后者为“食人之稼”，都不是野人之稼，这很难想象是有生产工具自己耕种的从别国来侨居的自由民。自然，说“氓”是“野人”，并不等于说战国时代的“野人”都是“氓”，由于社会的变革，战国时代在野外生产的是有奴隶也有农民的，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包摄关系，不要划错了等号。但战国时代的人习惯上一般都指“野人”为奴隶，如孟子所谓的“所以别野人也”就是这样；有时，也沿用“野人”是奴隶的称呼以形容粗鄙的人或从野外出来的人，都含

有輕蔑的意思，正如近代人用“公子”一詞來稱有錢人的少爺或排場闊綽的青年一樣，它的語源的确是公侯之子。“公子”，被用做形容詞，但事實上有些達官貴人的兒子也稱“公子”，我們要注意語源又要注意是虛用抑或實用。子路、管仲等被稱為鄙人、野人這是虛用，李蔭農同志卻又把它虛作實看，忘記了這是一種形容詞的使用方法。按：子路姓仲，仲出于湯左相仲虺或為宋莊公子仲之後（《通志·氏族略》）；管仲曾“幽囚受辱”（《史記·管晏列傳》），也可從語源及名詞的活用上證明原來的“野人”是奴隸。

李蔭農同志說“齊東野人”是“逸民”，這是說得很對的，但問題是“逸民”不是自由民，而是夏殷二代的遺民。《論語·微子》：“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伯夷、叔齊是義不食周粟的遺民，虞仲是自己逃為夷虜、柳下惠也是在魯國被廢黜的；又《論語·堯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這是說武王坐穩了奴隸主的寶座以後，舉用一些殷族“逸民”以籠絡其他奴隸。這些逸民有文化，有些逸民在殷代還曾任職官，他們在殷朝滅亡之後，自稱不願臣服于周，可是周人把他和他的同族一起分封給周朝奴隸主的諸侯或被強迫遷移，他們之中除少數自殺（有些採取餓死的方式）之外，大多數人也不能不承認現實，“比事承我宗多遜”（《周書·多士》）。可能因為齊國的始祖太公曾經“避紂居東海之濱”，和一些逸民原有交往關係，所以後來的齊國容納這些人較別國為多，他們的種族在齊國繁衍，這就成為“齊東野人”的由來；他們世傳的殷族故事不被周族所承認，被周族奴隸主認為是妄誕不經的東西，這就被斥為“齊東野語”。“草莽之臣”，是後代隱士或遺民借來作“逸民”的謙稱。但在孟子時代所指的實際內容，還是奴隸。按孟子這幾句話的源頭實出于《周禮》，《周禮·士相見禮》說：“宅在都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孟子把它解釋為：“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孟子的解釋也沒有錯，“庶人”正是奴隸，這在《大孟鼎》、《矢毀》有明確的記載，如“錫汝邦鬲四百，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庶人”等，不必多引。大家都公認它是奴隸。如果解釋為“多聞者”與“賢者”，“其實就是孟子自己”，那就未免太簡單了。孟子說：“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召之役則往役”，說明庶人被召則要“往役”，不傳質則“不敢見于諸侯”，正是一種奴隸身分。試問：孟子是召之則往役，不敢見于諸侯嗎？我們知道：不是。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滕文公下》），游說諸侯，排場非常闊綽，還不“以為泰”；諸侯不以禮接待他，他還要发脾气呢。李蔭農同志所引的《萬章下》那段話，正是孟子的氣頭話，他忿怨別人以庶人身分看待他。請不要會錯了《孟子》書中的本意。

也許是由于倉卒成文的原故，李蔭農同志在“孟子的階級劃分論”中會錯孟子的文義的還有數處。如舉出三條理由說明“氓”是從別國來僑居的自由民就是這樣。第一、認為“氓”如是生產奴隸，則許行等決不肯降身為之；第二、許行等有生產工具，有文化……可見“氓”不是無知的奴隸；第三、孟子是以僑居的自由民稱“氓”的。這几点理由都值得商榷。第一、許行對滕文公說：“願受一廛而為氓”，這是一句謙語，並不是

已成过去的事实。他的意思只是說：“希望給我一間茅間即使做奴隶也愿意”。李蔭农同志在这里对原文的本意体会不够确切，竟認为是“比在原籍居住所受的剝削有所減輕，这才使他們愿意迁居”，将謙語变为已成过去的事实。試以我国宾主应酬的客套形式来看，我們能够設想一个客人会对主人說：“因为你家比我家吃得好，所以我就愿意来你家做客嗎？”我們揆度人情和玩索原文意旨，觉得李蔭农同志的解释和許行所說的原意是大有逕庭的。第二、由于李蔭农同志对許行的話体会不够确切，建立了不十分正确的大前提，于是从許行不是生产奴隶得出“氓”是自由民的邏輯結果。我和李蔭农同志一样認为許行有文化有生产工具，不是生产奴隶而是农家巨子，但我却認为这和“氓”是不是生产奴隶根本是两回事，因为許行有生产工具不等于“氓”有生产工具。第三、說孟子是以侨居的自由民称“氓”，缺乏事实根据。从李蔭农同志所引《孟子》的原文来看，大意是說：士不敢象亡国的諸侯那样托食于別国的諸侯，但諸侯将“士”当做奴隶一般救济，在士有急需的时候，士还是接受諸侯的救济的。下文紧接着是：对于国君來說，如果老是采取救济的方式，不給士一个职位接受士的主张，便是象犬馬奴隶一般地养士，那就不算尊賢。李蔭农同志对本章的解释之所以失掉原意，我們認为蔽在不从原文的上下文意上去看問題。

三、关于孟子的思想实质問題

荀子說孟子“聞見杂博”（《非十二子篇》），孟子的思想的确是这樣，有精华也有糟粕，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給我們做孟子思想評价增加許多困难，但我們如果从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是从一言一語下判断，我們就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孟子說过許多“民貴君輕”的話，很容易使人迷惑，摸不准他的主意所在，因此，有人說他是民本主义，甚至还有人說他是民主主义的先驅。其实，孟子講过民貴君輕，可是也講过“位卑而言高，罪也”（《万章下》），“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要維護巨室的利益；同时主张位卑者說話的权利也应剝夺，这就很难解释是专以民为貴的什么民本主义。孟子以排斥“杨朱为我”、“墨子兼爱”为己任，并說杨朱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而“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我們知道：杨墨学說并不是真的无父无君，这是孟子的誣蔑，但孟子以无父无君罵人为“禽兽”，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在推尊君父。从《万章上》、《尽心上》等篇章看来，孟子的基本思想是肯定“使民”、“定天下之民”为君的天职的。也就是說，君是奉天命来治民的，民虽然代表天意，但天意并不是改变君民的治与被治的地位。他推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賊子惧”（《滕文公下》）；又說：“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尽心下》），可见他是怎样在維護君臣上下之义。自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問題还不在于他要維護君臣上下之义，而在于他維護的是什么性质——是封建性质的抑是奴隶制性质的君臣上下之义。

李蔭农同志說：孟子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等話，只是泛指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关系，似乎不易分辨出它是封建制性質还是奴隶制性質的。我們知道：封建性質的階級关系在战国初期應該是剛出現的新東西，可是，孟子所說的偏偏不是这样，它只是旧的奴隶制階級关系的遺存。这个論点的有力証明是：“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的这些話并不是孟子所創制的，而出于周代奴隶主的“往旧”，它是属于奴隶制性質的。換句話說，這句話并不是孟子的“造說”，而是在遵奉周朝奴隶主的老制度。《左传·襄公九年》記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又《国語·魯語》也有記“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訓也”，这种“訓”“制”，无非是要“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襄公九年》），也就是要維持并巩固“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工商皂隶不知迂业”的奴隶社会秩序，它不是新出現的封建性質的階級关系。我們知道李蔭农同志也是主張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那末，这“先王之制”、“先王之訓”，自然就不能說封建制性質的先王，問題已摆得十分明白：孟子是在維持奴隶制而不是封建制。孟子自称：“遵先王之制”“莫若师文王”（《离娄上》），正是遵西周奴隶制的先王（孟子称尧舜，只是一种美丽的外衣），这和荀子的“法后王”、“随时設教”的思想比較起来看，更可看出誰在維持奴隶制誰在維持封建制。

历史唯物主义告訴我們，評价一个历史人物，要联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自然也要联系历史条件来看他的具体思想內容。而且，我認为不仅要看这个思想怎样認識世界，还要看他提出什么方案去改造世界。孟子的“民貴君輕”說，无疑是孟子思想的精华部分，这种思想的产生自然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被統治者的力量已很强大，奴隶主的統治已衰亡下去，應該說，孟子是看出了被統治者的力量，在他的思想中部分反映了被統治者的要求。但孟子并没有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一些适合社会发展和人民要求的新方案——实行封建制的改革；而是向后看——“平谷祿”；“复井田”；“正經界”；而又反对“辟草莱”；“任土地”；这就决定他是在拥护奴隶制，維持奴隶主的利益。因为井田是奴隶主視察奴隶勤惰的一个土地单位，目的无非是把奴隶固囿在一块土地上：“死徙无出乡”，使奴隶主“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周語·魯語下》），使仕者有“世祿”，“谷祿平”，“井地均”，把奴隶制維持下去，使奴隶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得以长期延續。孟子和奴隶主階級不同的是：奴隶主要加紧剝削奴隶，他却主張緩和剝削以延长这种剝削的期限；換句話說：奴隶主对奴隶的剝削要求杀鸡取卵，而孟子則主張养鸡取卵。孟子向統治者提出民貴君輕等等表面似乎很进步的主張，其实只是拿被統治者的力量和声势，去吓唬統治者，迫使統治者向被統治者让步，以接受他的复井田、正經界的主張，把奴隶社会紧张的阶段对立关系維持在比較緩和的程度上，这就是他所以要倡“民貴君輕”的原因，也就是他的“仁政”的实质。我們知道，奴隶社会并不是沒有开明的奴隶主沒曾主張过向奴隶施仁政的，西周初年奴隶主階級的政治家如周公旦、召公奭，也曾主張奴隶主要控制自己对奴隶的压榨，提倡“德治”，提倡“保民”，甚至还主張奴隶主也要

某种程度的操劳，这在《尚书·周书》中历历可见。拿周公、召公的主张，和孟子的主张比较，我认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至多也只能说孟子接受了奴隶主阶级的优良传统罢了。不过，问题还在于：西周初年是奴隶社会的上升期，周公、召公的主张，还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是奴隶社会末期而来提倡这些，事实上不特不能为奴隶主全部接受，“所言皆以为迂远而关于事情”（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联系社会发展要求来看，不管他自己的主观愿望如何，都可以看出这些主张的内容的进步性是非常有限的。

自然，提倡“仁政”，要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减轻压榨，在奴隶制、封建制、甚至资本主义这些阶级社会都是对被统治者有或多或少的好处的。但是十分令人惋惜，孟子的“仁政”说内容——“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下》），特别是他从正经界而复井田，对奴隶主的好处多，对奴隶的好处少，对社会发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更使人难以想象。李蔭农同志说：要解决土地问题，除井田制外，没有别的方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稍为注意战国史实的人就可明白，似不用牵涉到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对于本问题的说明没有多大用处的地方去，也不用牵涉到什么经权问题上去，如果说孟子当时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好从权主张复井田，这虽然可以说得过去，但我们只要看商鞅的变法情况就可知道这一说是很难说得通的。商鞅变法于公元前360—340年之际，和孟子同时，恰恰和李蔭农同志的说法相反，他没有搬出井田制那一套，而是废井田，开阡陌。在孟子以前的李悝变法甚至子产行政，都没有搬出井田制这一套，他们都得到成功，可见当时并不是没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可寻。同时，孟子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我们也不能说他提出的政治主张只是“从权”，没有经过自己的思想酝酿。如果这样，就无法解释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从而又贬低了孟子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当然，说孟子的政治思想不行，谁都不会一般地从他的哲学上去使用类推的方法：因彼及此，而是要有事实根据。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固然能提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张，但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也可能提出一些。对孟子的政治思想研究不是依据他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对其他思想家的思想研究也是这样。荀子主张“复其户”，“利其田宅”（《议兵》）是找到了封建制改革的出路，可是，孟子却不是荀子那样，这就更可以从孟荀政治思想的比较，看出孟子思想的实质了。如果说，孟子复井田主张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性质的，我们从他所提出的方案，看不出丝毫封建性质，已如前说。就具体地方来看，孟子主张复井田的地方是在滕国，我们看：滕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复的是奴隶制土地制还是封建制土地制度呢？我们知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国家的奴隶制已向或正在向封建制转化，一些国家虽已转化但很不彻底，或者还有一些国家根本没有转化。具体说来，如滕国就是一个未曾向封建制转化的国家。滕，是文王的后代（《左传》“郟、雍、曹、滕、毕、原、鄆、郕，文之昭也”），正是“周公封建以屏藩周”的亲贵诸侯；滕国的所在地又是殷族的故居，分封的殷民族必定很多；从春秋时代一直到战国时代，不见滕国有政制的新

改革。《論語·宪向》載孔子說“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無疑，滕是一個猶秉周禮的國家，也就是一個奴隸制還濃厚存在的國家，孟子在這樣一個國家復井田，是很難說它是復封建制性質的井田的。

如果有人認為秦朝統一是封建制的統一，於是孟子曾經主張“定于一”，這就是擁護封建制的統一，而孟子也就是擁護封建制的。這種說法只是一種前提錯誤的邏輯推理，他忘記了“統一”有封建主的統一，也有奴隸主的統一，西周就是一個奴隸主統一的國家。如果說孟子對周天子已經失望，在注意找尋一個新的統一主，而這新的統一主就是封建性質的，這一說也很難成立，因為代替周朝統治的統一主在社會性質上不一定處於周朝奴隸主的對立面，它也可能是另外一個奴隸主。這種代替方式，有“周代殷”的先例在那裡，統治者是變了可是它只是從一個奴隸主到另一個奴隸主的變換。而且，對周天子的失望，不始於孟子，孔子早就在打算建立一個“東周”，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種打算和孟子的勸諸侯“王天下”、“定于一”的思想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但是，他們把人民的意旨體會錯了。人民要求的是封建制性質的在法的基礎上的統一，不是恢復周禮的奴隸制的統一；是“廢井田，開阡陌”，“使民得名田”和“農分田而耕”，而不是“復井田”，“正經界”，“制民之產”。人民是要求奴隸的解放，“人臣隸圉免”，而不是僅向“國人”開放政權，不是“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的枝節讓步。有些同志只注意到孔子和孟子的主張“統一”思想，沒有注意到這種實質內容，也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廣東歷史學會決定有計劃地繼續開展關於社學問題的討論

關於鴉片戰爭時期廣州地區社學在抗英鬥爭中的性質與作用的問題，是近年來廣東史學界還在爭論的一個問題。為了把這一問題的討論繼續深入一步，廣東歷史學會最近舉行了一次有關社學問題的座談會，與會者一致認為，近年來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已經初步澄清了一些問題，有些問題看法漸趨一致，同時還發現一些新的有關資料，為進一步探討社學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但關於社學性質與作用問題的看法還有分歧，特別是怎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具體地分析具體問題的方法來分析和研究有關資料的問題，仍須繼續討論。為此，廣東歷史學會根據過去爭論的情況提出下列幾個主要問題：

1.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決定一個政治性組織的性質是什麼？怎樣根據這一理論來考慮鴉片戰爭前、戰爭時期和戰後社學這一組織的性質？鴉片戰爭時期廣州地區社學的性質有無變化？如果各個時期社學的性質起了變化的話，那末這種變化是由那些條件促成的？

2. 鴉片戰爭前、戰爭期間及戰後，廣州地區的經濟狀況及階級關係的變化情況。在鴉片戰爭時期，特別是在廣州地區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地主階級各個階層的政治動向及其在抗英鬥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怎樣？

3. 鴉片戰爭時期清朝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廣東人民的反侵略反投降鬥爭的開展問題。

4. 鴉片戰爭時期廣東人民的反侵略反投降鬥爭是群眾的自發鬥爭，還是有領導有計劃的鬥爭，或者是那一方面為主？社學有沒有起組織領導的作用？怎樣才算起了組織領導的作用？

廣東歷史學界將參考上述問題，對鴉片戰爭時期廣東社學的性質和作用問題繼續開展討論。

資本主义教育理論体系探索

杨 荣 春

本文拟就資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兴起、繁荣和衰落阶段），来探索资产阶级教育理論体系，初步闡明各家的基本主张及分析其思想实质。

—

資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产生于十四至十五世紀的意大利。当时的“文艺复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发端和资产阶级起而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态等領域内反对封建主义的反映。十六世紀后半期，尼德兰发生了反对封建統治的欧洲第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紀中叶又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切推动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生产力从封建束縛下解放出来。教育理論在这个資本主义关系兴起阶段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下，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科学知識和哲学思想启发下，出现了嶄新的面貌。作为新时代教育理論代表人物如夸美紐斯（1597—1670年）、卢梭（1712—1778年）和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黑尔維修（1715—1771年）等，虽然他們的阶级出身和思想傾向有所不同，但在教育思想的实质上都符合了新兴資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成为资产阶级教育理論体系的組成部分。

夸美紐斯出身于制粉师的家庭，他参加了捷克民主教派的社会斗争运动，具有人文主义、唯物主义和爱国民主义思想。他对教育的基本主张是：（1）让一切儿童，不分貧富、貴賤、男女，不管住在城市或乡下，都能在初等学校受到教育；（2）教育应该适应自然，使儿童获得有关现实事物的广博的和确实的知識；（3）按照儿童成长过程和年龄分期，规定学校教育制度和智育內容；（4）学校教育应该实施学年学期制和班级上课制度，教学应根据直观性、系統性、循序渐进和量力性等原則；（5）反对棍棒紀律，要求培养“自我管束”的精神。夸美紐斯是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奠基人，是教学論的革新家。他所以在資本主义时代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历史功績，就在于比較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方向和根本原則，适应着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領主和僧侶的革命斗争要求。让一切儿童受到教育的普及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针对封建社

会統治者蒙昧政策而提出的，是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意識的反映，也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夸美紐斯极力論証普及教育的必須实现。一方面，他否定封建統治者和天主教会把人看成奴隶和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說法，認為人类是世界上最完善、最优美的創造物，所以儿童本身有受教育的可能性，儿童受了教育便能变为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另一方面，他建議实行一套新的学制、教学組織和班級教学制度，为实现普及教育提供保証。当然，他还没有懂得普及教育的真正实现，关键在于人民經濟生活条件和人民掌握了政权，所以这种普及教育只符合于资产阶级的要求。再看他倡导适应自然的教育理論，总的精神是反对封建社会崇拜权威与教条，反对經院学校的知識貧乏与死記硬背，而要求面向自然和现实事物，按照自然法則进行教育教学和获得广博确实的知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提出“泛智”要求，提出遵循自然发展順序的要求，具有初步的科学教育的因素。在道德教育理論中，重視自我約制而反对强迫紀律，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爭取民主自由精神的具体表现。

卢梭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反映了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法国社会第三等級中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斗争要求。他坚决反对封建暴君、反对僧侶和貴族的特权。他根据洛克的“社会契約論”，証明人在自然状态中本来是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自然权利”；因而特別激烈地譴責封建統治者的苛政剝削，主张凡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权都必须推翻。这种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正合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要求，与夸美紐斯比較，卢梭在主张发展个性和自由教育的言論中大大前进了一步。

卢梭教育思想的中心是自然教育論。他的名著《爱弥儿》开头便說：“無論何物，出于自然底創造，都是好的，一經人手，就弄坏了。”他从自然的观点去衡量社会，因而主张人类享有“自然的权利”；也从自然的观点去看待儿童的教育，主张任何教育必須根据自然发展趋势，不能违背儿童本性。夸美紐斯比較強調遵循自然事物发展順序来进行教学，卢梭則比較強調根据儿童天性或他的发展趋势来进行教育，前者着眼于知識的传授，后者着眼于个性的解放。卢梭十分突出地以尊重儿童、热爱儿童、解放个性、追求自由为教育的根本要求。在这一点，他比夸美紐斯更具有革命性，更为鮮明地对封建关系与天主教会的压迫提出抗議。这种遵循自然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是与自然权利說密切联系着的，根本目的在于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爭取民主自由的革命要求，坚决地向封建势力及其教育影响展开尖銳的斗争。但卢梭的民主性是不彻底的，这特別表现在对女子教育的见解上。他說女子教育目的在于为男人服务，为了博取男人的欢心。女子的使命是养育小孩、料理家务、創造家庭的和乐与男子的幸福。所以产生这样的不彻底性，是由于他站在手工业者、小资产者的眼光看女子問題，他仍然把原来小私有者的家庭生活当作理想的家庭生活，保存着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等級特征。因此在他看来，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是卑微的，一切要以男人为主宰。卢梭重視劳动教育，認為劳动是人的不可避免的義務，劳动可以使人变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把劳动当作人的義務，当作教育的

手段，这是具有民主性的因素的。但归根到底也不外从手工业者的立场来歌颂劳动和承认劳动教育的意义，和我们所主张的生产劳动教育是根本不同的。

十八世纪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黑尔维修，和卢梭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张教育万能，根据“意见统治世界”的信念，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由于人的偏见所造成，要改变社会制度就必须先用教育力量改变种种偏见。黑尔维修关于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对于社会历史就陷入于唯心主义的泥沼了。应该指出，教育万能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就是为了挣脱当时极端不合理的封建教会压迫和束缚，渴望“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理性社会的来临。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企图以教育的手段来扫除一切偏见，对封建教会的思想教育影响展开斗争，使社会制度得到革新。因此教育万能论的主张虽然是唯心主义观点，但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的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黑尔维修的另一教育主张是智力平等说。认为每一个具有普通良好器官的人，都具有同等的智力，所以贵族阶级在智育上的特权应该反对，要求人人都有享受中等教育的权利。不难看出，这个主张是和卢梭的自然权利说、和夸美纽斯的普及教育理论一脉相通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者与天主教会种种垄断特权中，他们要求政治权利平等、社会地位平等、教育机会平等，提出所谓自然权利说、所谓智力平等说，等等，毕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加速封建社会的解体。黑尔维修比夸美纽斯进一步提出普及中等教育，足见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已越来越感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意义。到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康多塞（1743—1794年）在草拟有关教育法案中，就要求实施普及教育，要求国家对全体公民和各级学校实施强迫教育和免费教育。这个法案虽然没有实现，但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利益而倡导普及教育的主张，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从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中夸美纽斯、卢梭和黑尔维修的教育理论来看，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1）普及教育，（2）发展个性，（3）适应自然。这些正体现了封建制度瓦解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育方向性和原则性，也就是为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为培养资产阶级社会所需要的新人而提出的教育新方向和根本原则。在封建社会，由于落后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简单，由于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垄断教育权，由于专制暴君的无上权威与宗教迷信，由于经院哲学的烦琐和脱离现实，所以在经济领域内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思想领域内就长期形成相对的静止与停滞状态，这一切都是对初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妨碍的。要使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种僵化和停滞现象。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要求迅速发展生产力、发展贸易与自然科学，这就需要决定教育的新方向和根本原则。提倡普及教育是为了把教育权向资产阶级子弟开放，让他们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以供经营和发展工商业的需要；提倡发展个性是为了冲破封建制度的种种压迫与束缚，培养追求自由平等理性社会的资产阶级新人；提倡适应自然是为了面向现实、尊重儿童天赋能力与事物发展顺序，使受教育者得到更广阔的切合实

用的知識。歸納起來，第一個是屬於掌握教育權問題；第二個是屬於培養什麼樣的新人問題；第三個是屬於教育教學工作路綫問題。這些就是新興資產階級對教育所提出來的總方向和根本原則，這是從一個舊時代轉到新时代的過渡階段，新興階級在教育上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二

自從十九世紀初期起，西歐資本主義便踏上發達和繁榮階段。英國於十八世紀後期發生了工業革命，法國也在这个世紀末發生了震動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先進的啟蒙思想家們所渴望的“理性的王國”終於來臨了。其實，恰如恩格斯所說：“這個理性的王國，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正實現於資產階級司法之中；而平等則歸結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並且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被宣布為最根本上的人權之一”^①。當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掌握了統治權後，這個世界同樣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階級特權從封建主和僧侶那里轉移到工廠主、商業家或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手上。廣大的農民和工人看不見正義和理性的光明，他們仍然過着悲慘生活，迫切要求改變現狀，扔掉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收斂起來了，他們面前的任務是進一步鞏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利用各種手段來保證自己的統治權，並轉向勞動人民進攻，反對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以維護本階級的已得利益。

在資本主義發達繁榮階段中，裴斯塔洛齊(1746—1827年)、赫爾巴特(1776—1841年)和斯賓塞(1820—1903年)等，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忠忱地為在經濟上政治上掌握了統治權的資產階級服務。這個階段教育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灌輸調和妥協精神與宗教教育，以緩和越來越尖銳的階級鬥爭，如何充實和豐富教學論，使資本主義教育學成為更完備的體系，而更有助於資產階級子女掌握科學知識技能和形成他們所需要的道德習慣以及世界觀。

裴斯塔洛齊出生於瑞士，他的國家雖然到十八世紀末才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國內資本主義生產已經發展，人民受到封建主和新兴資產階級的双重壓迫。封建地主逐步向資產階級轉化，他們以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改造經濟，並加強對廣大農民的剝削。農民飢寒交迫，攜子帶女到手工場和新兴工廠作工，忍受着殘酷的待遇。面對着這個社會現實，裴斯塔洛齊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要求改善農民生活，解決社會迫切問題。可是他不認識農民痛苦遭遇的根本原因，缺乏革命的銳氣，只採取溫和的改良手段，期望用合理教育兒童的方法來拯救農民。所以他的教育思想雖然一面發展和補充了十八世紀的民主主義、人文主義因素；一面又從啟蒙運動時代所茁長出來的革命性向後倒退。他認為人民貧困的根源並不在經濟條件，而在于缺乏教育和文化。因此，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主张所有的人(包括最贫苦者)都須获得必要的教育,通过启发与教育来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他又以为每个等級都应当获得符合自己社会地位的教育,农民、手工业者的儿童要准备做农民、手工业者,貴族的儿童仍然准备当貴族。由此可见,他的教育改造社会观点和教育平等主张比諸启蒙学者是明显的后退了。启蒙学者黑尔維修企图利用教育来改造封建社会的偏见,代表资产阶级对建封統治势力及其影响作尖銳的斗争,思想实质虽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当时有其进步和革命意义。裴斯塔洛齐则企图借助教育来調和广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轉移人民群众斗争方向,把贫困根源归结为缺乏教育文化,主张用教育来救治贫困,这个药方包含了浓厚的毒素,对于劳动人民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是十分不利的。固然裴斯塔洛齐出发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主观上希望以教育来改善人民生活,但客观上正符合了当时资产阶级緩和阶级斗争的要求。他又一面主张普及教育,一面主张符合社会地位的教育,在“平等”的口号掩盖下实施不平等的教育,阶级身分界限极为鮮明,和卢梭、黑尔維修比較,民主精神已削弱得多了。这里充分反映了裴斯塔洛齐思想的妥协性。在調和阶级矛盾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主张,认为教育应该与农业、手工业的劳动相结合,儿童要熟識乡村里最好的农场、手工业作坊,劳动应作为培养人的理智和道德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劳动教育观是卢梭思想的补充,同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但裴斯塔洛齐附加了新的意义,即通过劳动教育来使贫苦家庭子弟学习关于农业、手工业知識技能,以为改善贫困生活、实现阶级合作的张本。虽然这样,但也应该指出,在教学論方面,他进一步发展了夸美紐斯的观点,除了注重感觉經驗以外,还强调在这个基础上使感觉經驗形成明确的概念,故主张教学任务首先在于帮助学生根据感性經驗以积累知識,其次就要发展他們的智力。又說,发展儿童的实际技能,也是教学任务之一。对于教学过程提出这样明确完整的任务,把知識、技能、智力三者结合起来,把感性与理性統一起来,这是教育学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同时,他要求确定最简单的要素作为基础来进行教学,提出“数”、“形”、“語”是教学的基本要素,归结为“計算”、“測量”和“語言”三者,不但建立了初等学校的教学法,并由此改变了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他把小学教学科目扩张为閱讀、书法、算术、初步几何、測量、繪画、唱歌、体操、历史、地理及自然等科,使初等学校的教学計划更丰富,又奠定了小学各科教学法的基础。这就可以看出,裴斯塔洛齐在夸美紐斯的教学論基础上,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普魯士国家制度下的意識形态的典型。这是因为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期,德国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統治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障碍,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是軟弱无能的。他們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曾一度感到振奋,但到后来德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日益扩大时,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就从同情革命而变为与封建地主勾結一起反对革命了。

赫尔巴特反对德国社会的进步运动,他梦想凭借哲学、科学和教育来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因此主张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培养为巩固现存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所必需的善

念。有了善的观念，就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夸美纽斯、黑尔维修两人希望通过教育来克服人的缺点和偏见以推动社会前进，裴斯塔洛齐则幻想利用教育来拯救贫困、缓和阶级斗争，而赫尔巴特竟要求借教育来扼杀革命、阻止前进中的历史车轮。赫尔巴特的反动性就在这里。所以他强调宗教教育，认为宗教可以培养“顺从的感情”，使人的心灵平和而宁静。德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色溢于言表。但是不容否认，他系统地用心理学的观点来阐明教学论，提出了教学中的教育性问题、启发多方面的兴趣问题，提出了叙述、分析、综合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过程顺序，以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来规定教学步骤，这些对于组织课堂教学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夸美纽斯对于教学方法论只是提出革新的根本原则，而赫尔巴特则对于组织课堂教学，提供了更具体完整的方法步骤，不能不承认这是教育学发展史上一个进步。当然，由于他的心理学是观念心理学，所提“经验的”、“思辨的”、“审美的”、“同情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六种兴趣是凭空虚构的；而四段教学法也建筑在形而上学基础上，机械的要求一切科目在各种场合都套用这个形式步骤，限制了教师的积极性，抹杀了各种科目内容的特点，也漠视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习具体情况，这都是他的教学阶段论带来的不良影响。

斯宾塞是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巩固和繁荣了的英国资本主义代言人。那时英国是欧洲的最大工业国，成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并拥有许多殖民地。他狂热地歌颂资本主义制度，宣称“工业社会”表现了一片安乐与和平的景象，阶级斗争逐渐在消灭下去，把资产阶级与工人间的关系叫做“自愿的合作”，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抱着仇视的态度。他根据“实证哲学”的观点，说人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应该承认宗教的存在，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必须有“自然和根本的协调”。又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一种进化过程，否定革命的质变。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头脑“统治着”人的身体，资产阶级就是人类社会的头脑，必然居于统治的地位。又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生存竞争的永恒规律性表现，陷于贫困生活的劳动人民是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他利用这种哲学来“证明”宗教的必要，革命的不应该和劳动人民被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是符合社会规律的。

斯宾塞的教育观充分反映了他的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意图。他要培养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人，保证他们能在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以进一步维持资产阶级社会的“安乐与和平景象”，因此主张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教导年青一代善于对待自己的身体、丰富自己的知识和发展智慧，如何教养儿女，如何处理社会事务，如何做个好公民，和如何利用自己的才能以达到个人最大的成就。他所要培养出来的理想人物，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和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在他所著的教育论文中，首先提出了“那一种知识对我们最有用处”的问题，他从人类活动范围着眼，把必须学习的知识作如下分类：（1）直接关于自我保存的活动；（2）关于获得生活资料，因而间接关于自我保存的活动；（3）关于种族保存（以养育子孙为目的）的活动；（4）关于履行社会义务的活动；（5）满足趣味及感情的活动。为适应这五种活动而定出中

等教育的教學計劃，它包含了廣泛的學科（解剖學、生理學、衛生學、論理學、算術、幾何學、機械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及外國語等），而以數學和自然科學占着最大的比重。這個計劃不但充分體現了以個人利益為學習出發點，也大大發展了實科教育的內容，反映了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在道德教育方面，斯賓塞認為個人自保是重要的道德原則：好的行為便是種族自我保存的行為；而作為道德的最高階段就是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調和折衷。又認為體育必須著眼於個人利益和準備應付現代社會的生活競爭。

從智育、德育和體育各方面看，斯賓塞的整個教育思想除了極力為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之外，則著重於保身、保家和保存種族，要求充分利用科學知識和道德規範以及健強體力來應付“生存競爭”。他十分反對工人教育的普及，聲言無力繳納教育費者就不必享受過多的教育，並認為高深的教育只會激起工人對於自己地位不滿的情緒。到了發達繁榮階段，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了，代表着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斯賓塞的教育思想，也就把他們的前輩啟蒙思想家的言論：所謂享受教育的機會平等，所謂“理性的王國”來臨，所謂尊重人的“自然權利”以及發展一切兒童的天性和創造才能等等，都露骨地給以否定了。

根據上邊所考察，自十九世紀初葉起至十九世紀末葉，當世界資本主義已到了發達繁榮階段，資產階級的教育理論為了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為了對勞動人民進行欺騙，普遍地體現了調和妥協的落后性，甚至有的還摻雜着反動的反科學的性質。資產階級教育理論在前一階段所表現的對封建和教會僧侶的革命性、民主性、科學性已不同程度地被擱置了。裴斯塔洛齊的教育作用論、普及教育論、勞動教育論，都是以調和階級矛盾為最終鵠的。至於赫爾巴特的教育目的論、宗教教育論，以及斯賓塞的教育任務論、科學與宗教調和論與對工人教育的態度，除了表現調和妥協精神外，還充分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反動意圖和反科學傾向。但同時也應該承認，在教育學的發展上說，這個階段的顯著特點是關於教學內容與方法的研究跨前了一大步，使資產階級教育理論更為完整化、體系化，補足了和發展了資產階級在興起階段初步提出的教育方向和原則。如裴斯塔洛齊關於教學的任務和初等學校教學計劃、教學法，赫爾伯特關於教學過程的方法步驟，斯賓塞關於實科教育的廣泛學科，都是根據當時科學發展水平而作了較前一階段更為完整而又細致的論述，並初步打下了教育心理學的基礎。這在人類教育理論發展史上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不能加以忽視。

三

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社會開始進入衰落階段，從此成為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伴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繁榮，無產階級的队伍日益壯大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無產階級先鋒隊

(共产党)指导下,他們的覺悟也更加提高了,对剝削者所进行的有組織有綱領的斗争,不断加强和扩大。早在十九世紀中叶,无产階級的革命运动已經开始,1848—1849年在欧洲发生了多次群众革命风暴。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階級第一次夺取了政权,結果虽然失敗,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17年在无产階級政党和伟大領袖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突破了资本主义围墙一个大缺口,从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开始了。垄断资产階級为了挽救日趋灭亡的命运,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的愚弄人民政策,他們的教育理論也就在这个卑鄙企图下形成的。

这个阶段的资产階級教育思想家杜威(1859—1952年)、凱兴斯泰納(1854—1932年)、拉伊(1862—1926年)等,是在教育理論上散播毒素戕害人民的典型人物,他們中有的倡导“生活教育”,有的主张“公民教育”和“劳作学校”,有的提倡“行动学校”,中心要求在于推行愚昧政策,反对科学真理,麻痹人民革命斗志。他們教育理論的特点是偏向劳作活动而抹杀系統知識,歌頌儿童直接經驗而忽視教师主导作用,取消完整的課程而导致学校职能退化。

帝国主义的头号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学。他宣称实用主义就是一种“行动哲学”,这种哲学包含下列主要内容:(1)人类的思想意識只是一些配合人的行动的工具;(2)真理就是对人們有利有用的东西,而所謂有利和有用是自我滿足的感觉;(3)实践是个人对目的的追求或謀得个人利益的活动,是主观的性质。根据“行动哲学”观点,杜威把教育看作是为了儿童生活的自我滿足。他主张“教育就是生长”、“就是生活”、就是“儿童經驗的改造”;而学校只是一个有組織的环境,学校本身就是生活。因此,劳作应该是整个学校生活的中心;学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要在菜园、果园、食堂、厨房以及木工、金工、紡織、裁縫等各种工场里劳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学校課程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②他又认为,儿童是“在做中学”的,学校教育应从儿童实际經驗出发,而不是学习书本知識。

杜威所以在教育上这样強調生活和实际經驗,強調学生的劳作和社会活动,首先是企图根本上否定教育的明确目标和迷惘教育的階級实质,借以蒙騙人民,使人們誤認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并没有为特权階級所垄断,因为教育与生活一致,儿童过什么生活就受什么教育。这就可以堵塞劳动人民爭取教育权的道路,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其次,由于特別重視劳作和实际經驗,就把人类社会传递下来的科学系統知識放松了,这也正符合了资产階級的愿望:只給人民以零碎的、仅供雇佣劳动需要的少許知識,使他們不会因多得了知識而对本身地位感到不滿。这些教育主张,把教育与生活等同起来,把学习与劳作(活动)混淆起来,否定了严密完整的教学計划,忽視了系統科学知識的传授,貶低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抹煞了学校的特定职能,这是资产階級教育

^② 杜威:《今日之教育》,1940年英文版,第9頁。

理論的倒退。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腐朽性與反動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指導下的美國“進步教育”派，更明目張膽地主張：學校基本上是一個社會的、而不是“求知”的機構，學校的任務在於幫助兒童解決自己的問題、滿足自己的需要；課程應基本上由學生決定，基礎的知識只是附帶地教給學生，教師應該是學生的顧問、不起主導作用，等等。這種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培養兒童的主動性而實際上排斥系統知識、降低普通教育的水平的做法，無疑是首先對於廣大勞動人民的子弟不利。

凱興斯泰納是德國帝國主義的思想家，他的教育觀點也不折不扣地為壟斷的資產階級服務。他提出“公民教育”和“勞作學校”的論調，利用“公民教育”以培養青年具有“個人服從於一切公認的權威”的精神，並要求“公民教育”去反對“內部敵人”（指無產階級）。他認為，反對“內部敵人”的最好辦法不是大炮、戰艦和刺刀，而是必須用更巧妙、更可靠、更有效的武器——公民教育，使他們了解國家的使命，產生公民責任感和對祖國的熱愛。他又創議組織“勞作學校”，學校任務在訓練青年某些適應職業需要的手工技術（僅僅授以最低限度的普通常識）。他主張勞作學校應設有教學實習工廠、校園和供實習作業用的廚房；在勞作過程中，還須培養學生勤懇、老實的品質習慣。對於工农青年來說，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為資產階級訓練稱心如意的奴才，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主人的安寧。”^③ 凱興斯泰納的主張便是這樣。

德國的另一資產階級教育家拉伊，把教育學當作生物學來理解，企圖把教育說成是超政治超階級的，以便達到欺騙人民的目的。他認為任何有機體都會受到外界刺激而引起反應，這種反應過程是按照“感受——加工——表現（或摹擬）”的公式而構成。他把這個公式機械地搬到教育和教學過程中去，說教育和教學便是由“對學生的影響”和“學生的反應”兩者的統一過程。根據他的解釋，學生首先是通過觀察而獲得印象和知覺（“感受”）；其次是把所獲得的印象和知覺在意識里進行“加工”；最後是利用各種動作把所感受與加工的印象和知覺“表現”出來。他認為，表現或摹擬在教育過程中富有特別重要意義，因為這可鼓勵學生的主動性，使他們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他的“行動教育學”也就因此而得名）。他主張開設“行動學校”，把學生的主要精力放在“表現”上面，強調“行動”或“勞作”，學生大部分時間用於圖畫、泥工、演戲等方面，這和杜威的“從做中學”、凱興斯泰納的“勞作學校”，具有同樣性質。結果學校職能退化了，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勞作”而不是“學習”，學生所獲得的知識是支離破碎的。拉伊又熱誠擁護宗教教育，主張在每一科目的教學中都應充滿着宗教意識。拉伊的用意是極為明顯的，一面抹煞科學系統的知識，一面灌輸宗教信念，目的在於造成群眾的愚昧與迷信，培養馴服的為壟斷資本家所需要的奴才。

③ <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頁。

此外，在第二次大战后，为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反动统治者所欢迎的新托马斯主义派、科学人文主义派、存在主义派、人格主义派等教育理论，或以培养“全面的人”，或以培养“仁慈、谅解、冷静头脑、合作精神”，或以提倡“个人责任”、“全人的教育”，或以“人的完全发展”为幌子，他们理论的共同点就是宣扬绝对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归根到底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教育主张，企图以个人主义反击集体主义，以唯心主义反对科学的唯物主义，引导人们走向宗教信仰境界。如新托马斯主义派所谓一切应服从于信仰和爱，所谓教育不应为革命服务而应为“解放”学生的心智服务；又如人格主义派所谓人格是最高的实在，要求“自我实现”；再如存在主义派所谓摆脱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的影响等等谬论，无非是大资产阶级要借助教育这块盾牌，来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

资本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很清楚地表明教育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不但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不同，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的兴起、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也各有特点。这些特点的产生和形成，不能孤立地从各家的论点本身去找寻原因，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矛盾中去找寻。马克思教导说：“这个意识正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④同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和受资产阶级的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总特点可以初步归结为：（1）普及教育与资产阶级垄断教育权的二重性，（2）发展个性与压制群众创造才能的二重性，（3）崇尚科学与提倡宗教的二重性，（4）发挥独立思考与反理性主义的二重性；这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轮廓，这就是资本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规律。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我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

王季思

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它通过舞台人物的科介、宾白、歌曲、舞蹈来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时有音乐伴奏。形成戏曲的每一种艺术因素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国劳动人民从来就爱好艺术，也懂得艺术，他们经常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生活的愿望。相传出于葛天氏时期的《八闋》歌，是由三人执牛尾边舞边唱的，歌题有《逐草木》、《奋五谷》等，表现了他们对农业生产的愿望。相传出于伊耆氏时期的《蜡辞》、出于黄帝时期的《弹歌》，同样表现了古代人民的生产、劳动和狩猎生活，以及他们希望怎样避免水灾和虫害，怎样猎取更多的鸟兽。这些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活的歌辞和舞蹈，成为我国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部门的远祖，同时是我国戏曲发展最远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民间配合着祈雨、驱疫、祭神，有种种歌舞的表演，但就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和歌辞看，还是比较简单的。到了秦汉以后，跟着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和邻近民族经济上文化上的交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错综复杂，人们的社会生活愈益丰富，于是在诗歌以及民间传说里出现了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富有戏剧性的冲突和完整的故事形式的作品，如乐府诗里的《孤儿行》、《妇病行》、《羽林郎》、《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民间传说里的孟姜女故事、太子丹故事、卓文君司马相如故事、王昭君故事、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等。这些来自广大人民之中的诗歌和传说，不论从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或对后来的戏曲影响看，不论从它们的思想内容或故事情节看，都不能不承认是推动我国戏曲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就音乐、声腔及舞蹈说，汉乐府所吸收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以及汉魏以来在民间流行的平调、清调、杂舞、杂曲也都辗转流传，给唐宋以来组成戏曲艺术的歌舞、音乐以影响。我国戏曲所以具有那样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自始至终植根在广大人民的土壤之中。

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参军戏”，替我国后来以净、丑打诨为主的讽刺短剧创造了一个优秀的范例。参军戏的得名，相传始自对后赵参军周延的讽刺。这种戏主要由一个装作官僚的参军的和一个装作奴仆的苍鹘对演。在演出过程中，参军总是成为被打击和被讽刺的对象。从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思想倾向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由民间流入宫

廷的。

比参军戏的产生稍迟的《踏摇娘》，替我国后来通过生旦的载歌载舞和其他人物的穿插来表演一个完整故事的戏曲创造了雏形。《踏摇娘》产生在北齐时期，相传当时北齐有个姓苏的酒徒，每喝醉了酒就打妻子。他妻子向邻人诉说她的怨恨，他又追来跟她闹。戏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根据崔令钦《教坊记》的记载，戏里还有典库的穿插。可见内容不仅是家庭的悲剧，同时揭露了当时凭实物抵押来放高利贷的封建剥削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和各种歌曲、舞蹈、杂耍在民间发展的同时，历来的封建统治者也都在宫廷里豢养一批俳優、侏儒、歌儿、舞女，供他们玩弄。这些在宫廷里供统治者玩弄的男女奴隶，由于演出比较经常，有可能熟练地掌握某种艺术形式。然而由于他们长期离开广大人民的生活，他们的演出要投合皇帝、贵族的胃口，因此他们演出的艺术内容总是苍白无力的。乐府里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它们的内容都陈陈相因，毫无生气，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切在宫廷里被僵化了的艺术形式，到了后来往往在宫廷里也不能继续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一些在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艺术形式又开始被封建统治者所注意，加以吸收和修改，来供他们自己的娱乐。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主要是为吸收当时民间流行的歌曲和舞蹈来供宫廷的欣赏而设置的。唐代教坊的设置和官伎制度的确立又标志着我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我国各种歌舞技艺从两汉到中唐，发展异常迟缓。因为在这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间虽不时出现一些表现新的生活内容的创作，但由于没有经常的演出，艺术内容不容易继续丰富和提高。宫廷里虽有较为经常性的演出，但内容的空洞苍白又影响了艺术形式的发展。到了中唐以后，庄园制的封建经济逐步代替了均田制，许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流亡到都市里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活动。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为民间戏曲的经常演出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根据钱易的《南部新书》，唐代的首都长安已有许多戏场集中在慈恩、青龙、荐福、永寿等几个大寺院里。到了北宋时期，汴京的各大乐棚就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地演出各种杂剧和曲艺。民间的演出总是较宫廷里的演出为丰富而有生气，因此在唐玄宗开元时期就设置教坊和梨园，掌管各种来自民间的俗乐。许多在梨园演出的艺人自称皇帝梨园弟子，有的乐工更受封官职，和士大夫交往，开始改变了过去俳優、侏儒的宫廷奴隶地位。唐时称宫廷里的侏儒作矮奴，长的不过三尺左右，是由湖南的道州进贡的。到唐德宗时期才由道州刺史阳城的上奏而停止。我想这首先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到中唐以后，宫廷里的演出主要由皇帝梨园弟子、宜春院教坊内人来担任，由宫廷里豢养一批矮奴来演出的制度已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阳城的上奏才能得到皇帝的批准。

中唐以后，由于各种歌舞杂戏在大都市里经常演出，可以不断吸取广大人民的生活内容和艺术养料来丰富自己；同时由于演出场所逐渐固定，有利于各种艺术的交流融

合，从而促进了以综合各种艺术因素为其特征的戏曲的产生。民间歌舞杂戏的繁荣，还改变了宫廷里豢养俳優来演出的情况，乐工舞伎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到了后来，有些文人也愿意跟他们合作，共同为丰富演出的内容、满足观众的要求而努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戏曲从中唐以后得到飞跃的发展，经过五代、北宋，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现在我想谈谈从中唐以后发展起来的官伎制度和戏曲发展的关系。中唐以后，在长安、洛阳、成都、扬州等地方由于商业发展，人口集中，出现了许多卖艺而兼卖笑的妓女。当时的封建官僚为了达到自己荒淫无耻的目的，把她们编好名籍，集中在行院里，选定一个色艺兼优的妓女作行首。官府里有需要演出的时候，可以随时叫她们来，这叫作“唤官身”。官伎们除承应官府外，可以在勾栏里自己组织演出，这使她们有可能为了符合广大观众的要求而逐步提高自己演出的水平。我国宋元时期许多优秀演员，多数是当时著名的官伎。我国戏曲里旦角的表演艺术特别丰富，旦角的戏往往更能吸引人，也与此有关。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到，就是隋唐时期从高昌、龟兹流传来的胡部乐，以及两宋时期传入中原的“辽金杀伐之音”，丰富了我国民间原有的音乐，在后来戏曲的乐调上起了有益的影响

总之，从秦汉直至初唐，民间的各种艺术表演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和经常的演出而难于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宫廷及贵族家里虽然养了一批俳優、侏儒、歌儿、舞女，由于他们长期过着被禁闭、被玩弄的奴隶生活，他们演出的艺术内容也不可能得到充实发展。中唐以后，各大都市的官伎既有了固定的演出地点和经常性的演出；利用民间艺人的供奉宫廷、承应官府，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向来宫廷、贵族豢养大批宫廷奴隶来演奏的作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从秦汉以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构成戏曲艺术的因素，到中唐以后，很快就在许多民间专业艺术人的手里融合起来，出现了完整的戏曲形式。然而宋元时期的“唤官身”，依然是奴隶制度在我国戏曲史上的残余影响。这种制度本身和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对戏曲事业的贱视，一直妨碍着我国戏曲事业的健康发展。直到全国大陆解放，这种长期封建社会残余下来的思想意识，才在我们人民戏曲事业中得到彻底的清除。

伴随着中唐以来封建社会庄园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文艺本身的发展也达到了可以产生完整的戏曲艺术的阶段。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话本小说、说唱文学以及各种队舞和杂戏的发展，包括院本、杂剧、傀儡戏、皮影戏等在内。话本小说不但替戏曲准备好了故事内容，同时刻划好了人物形象。最早的戏曲艺人要把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形象从陈寿的《三国志》里直接搬上舞台是困难的，经过说话人的转手，困难就少得多。罗懋《醉翁谈录》记录南宋时话本小说名目109种，许多都是宋元戏曲的题材，于此可以了解话本小说和戏曲的亲密关系。说唱诸宫调跟戏曲的距离比话本又近了一步，因为它更替戏曲准备好了乐曲和唱腔。傀儡戏、皮影戏多演历史故事，它们给我国戏曲

的舞台动作和脸谱以更多的影响。各种队舞使戏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美也更多样了。

在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里，更其重要的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中唐以来长短句歌词、话本小说、说唱文学的发展，以及跟着这些新的文艺类型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它表现在思想倾向上是爱憎分明，象《梦粱录》所说的：“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表现在创作方法是依照不同类型的人物来描写他们的精神面貌，如《醉翁谈录》里所叙述的那样^①。这种文艺上的进步因素使一些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和完整的艺术形式的戏曲剧本的产生成为可能。而剧本的产生无疑地使我国戏曲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飞跃的阶段。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施君美等伟大作家的作品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出现的。

当我国戏曲事业在广大人民哺育之下得到飞跃发展、给广大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带来了鼓舞力量时，它不能不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嫉视。他们先是毛手毛脚地加以干涉、禁止。禁止不了，于是搜集民间优秀的剧本加以篡改和歪曲。最后是豢养一批御用文人，大量编写教忠教孝的剧本，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封建统治阶级的这些做法，虽然也暂时地局部地给我国戏曲事业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因素；然而由于戏曲是跟广大人民密切联系的艺术，封建王朝或地方官府的干涉，在离开他们耳目所及的地方常常不起作用。宋元以来的统治者也经常公布一些禁止演出的剧目，其中包括《赵贞女》、《王魁》等为人民所爱好的戏。然而禁者自禁，演者自演，这些优秀戏文七八百年以来在我国舞台上并没有绝迹过。至于那些御用文人编的戏曲如《月令承应》、《劝善金科》等，它们的演出范围往往不能跨出宫廷大门一步。

和大都市里的戏曲演出因有固定的游艺场所和专业的行会组织而愈来愈吸引人的同时，一些较小的市镇以及农村里的戏曲活动也频繁起来了。这些市镇和农村里的戏曲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民在业余时间自己组织起来演唱，它们的规模一般比较简单，音乐唱腔比较自由，象《南词叙录》所形容的初期永嘉杂剧：“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后来流行在各地方的对子戏（由一旦一丑或一旦一生对演）、三小戏（由小旦、小生、小丑合演）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一种是由大都市的行院组织班子到其他市镇或乡村演出，如《宦门子弟错立身》里所说的“在家牙队子，出路路岐人”，《蓝采和》杂剧里所说的“村路岐”。元代的太行散乐忠都秀到山西等处作场（见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所遗元代壁画），也是这种性质。这种演出情况使我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跟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而永远保持它艺术生命的青春。

跟上面说的戏曲在都市和农村里演出的情况相关，我国宋元以来戏曲主要是通过下

^① 《醉翁谈录》原文：“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須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閻怨遣佳人緣慘紅愁；说人头腐挺，令武士快心；雷两陣对鬪，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寄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这虽然是就说话技艺说的，实际也是说唱、戏曲等通俗文艺的共同要求。

面三种方式向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一种是各地民間流行的說唱或歌舞，在当地或外来剧种影响之下，逐步向戏曲形式发展。这些戏曲演出一般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扑人的生活气息；但音乐、唱腔不免单調一些，故事内容不免简单一些，往往只能在某一地区流行，如河北的絲弦戏、上海的滩簧戏、閩南的采茶戏、云南的花灯戏等。一种是某些地方小戏在流行到都市以后，在艺术上吸收了其他大型剧种的长处，逐渐发展成为流行国内广大地区的大型戏。南宋时期的永嘉杂剧流行到杭州以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南戏是如此；近几十年来嵯县的“的篤班”流行到杭州、上海以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越剧，也是如此。另一种方式是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剧种流行到某一地区以后，吸收某一地区的曲調唱腔，学习某一地区的語言，表演某一地区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某一地区人民所爱好的剧种，从而在地方生根。明代南戏流传到福建之后出现了閩南戏，清代的皮黃戏流传到广东之后出现了粵剧，都是它的例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从宋元以来新的剧种不断出现，老的剧种也經常在推陈出新，使我国的戏曲艺术創造出多种不同的风格和积累下数以千計的优秀剧目。这些优秀剧目大都热情歌頌历史傳說中热爱祖国的英雄，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替人民主持正义的清官，以及为他們自己的爱情而斗争的年青一代；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那些汉奸、叛徒，维护封建势力的老頑固，仗势欺人的恶霸，貪富欺貧的財主。我国这些优秀剧目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凡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不管他們的社会地位怎样，在戏里总是以正面人物出现，而且經過复杂曲折的矛盾斗争，最后总是取得胜利。长期以来，这些舞台艺术形象就这样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教育并鼓舞了广大人民在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时坚决起来斗争。

我国戏曲既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产生的，而且过去的封建統治阶级曾經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这种文艺形式来麻醉人民和点缀他們腐化堕落的生活。因此在我国戏曲艺术里也出现了一批内容庸俗、甚至思想反动的作品。即是許多来自民間的内容基本上健康的作品，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免杂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封建伦理观念、因果报应思想，以及色情的表演、无謂的噱头等。我国戏曲里这种因素，长期以来在人民中間起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这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国戏曲史时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的。

向来研究我国戏曲史的资产阶级学者存在着两种較为严重的錯誤傾向。一种是看不到广大人民在我国戏曲艺术历史发展上所起的推进作用，而把宗庙巫覡、宫廷俳優以及历代帝王的侈陈百戏，看作是我国戏曲的来源。自从王国維的《宋元戏曲史》开了端，后来学者很少能够摆脱他的影响。我国戏曲所以富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主要由于它是植根在广大人民之中，不断得到人民的培养。历代封建王朝的豢养俳優，侈陈百戏，一般只能在戏曲的艺术形式上有所丰富，他們反动的伦理观念和腐朽的艺术趣味却往往給戏曲艺术带来了坏影响。那些资产阶级学者看不到我国戏曲艺术里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与愿望的思想内容，而只看到它的一些表现形式，如曲調、舞蹈、臉譜等等的变化，这就不能不把我国戏曲的起源归因于宫廷、貴族的提倡。另一种偏向是过分强调我国戏

曲艺术因素中的外来影响。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以为“南北曲之声皆来自外国”，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以为我国戏曲的体例及内容有不少来自印度的梵剧。有的人更进一步说梵剧也染有外来影响，因此谈我国戏曲的起源当上溯到希腊。这种说法分明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我国学术思想上的反映。我们承认宋元时期的南北曲里杂有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带来的曲调。这些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间流行的曲调在流传到我国中原地带之后，有的慢慢为汉族人民所爱好，改用汉谱歌唱，和原来在中原流行的曲调、唱腔融为一体。同时，原来在汉族人民中间流行的曲调，在受到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乐曲影响之后，也逐渐为这些少数民族所爱好。这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文化上互相融合的现象，怎么能说我国宋元时期流行的南北曲都来自外国的呢？至于许地山就戏剧演出的一些共同形式来牵强附会，就更不值得一驳。不同民族的生活和历史发展既有其共同之处，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艺术也就不可能在形式上绝无共同之处，难道我们能因为中国的诗歌和西洋的诗歌都有音节，都要协韵，就说中国的诗歌是从西洋来的吗？

长期在我国封建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戏曲艺术，到了最近百多年来，受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一方面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大城市里的演出为了迎合那些洋场买办的胃口，出现了一批片面追求机关布景、情节离奇而趣味庸俗的剧目；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以来在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影响之下，许多人分不清戏曲里的精华和糟粕，把它一概看作封建落后的东西，全面否定。这就使我国这个时期的戏曲艺术的发展遇到了重重的故障和困难。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情况更为严重，当时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里，戏曲舞台上呈现一片混乱现象，好的剧目越来越难得上演，而象《大劈棺》、《纺棉纱》、《铁公鸡》等恐怖、色情、思想反动的戏却大量在舞台上出现。跟着舞台剧目的混乱现象而来的是演出的场数和剧团的不减少，演员失业的一天天增加，有的地方剧种已经长期没有上演，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淡漠下去了。

正当我国戏曲事业在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双重压迫之下，处在奄奄一息的时候，一声春雷，全国大陆解放，掀去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给我国戏曲事业带来了新生。

解放以后我国戏曲事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方针。一面在中央及各省市成立戏曲改革委员会，剔除我国旧戏里封建性的糟粕，突出它民主性的精华，使它向创造社会主义新戏曲的道路发展；一面组织全国会演、全省会演、以及各剧种的交流演出，在艺术上采取自由竞赛的方式，提高各剧种的演出水平。在党的这种正确的政策方针指导之下，解放十年来，我国戏曲舞台上呈现了“百花竞艳，万鸟鸣春”的气象，基本上满足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同时，它还作为我国艺术使节到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国演出，受到各国人民狂热的欢迎，大大缩短了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也获得了艺术上最高

的荣誉。当越剧团在莫斯科演出《西厢记》时，《真理报》发表评论，评为“高尚爱情的诗”。又发表《古老文化的青春》，评该团《梁山伯、祝英台》的演出。当京剧团在伦敦、巴黎等处演出时，有些欧洲观众认为比之过去的京戏，有如珠宝拭净了尘土，焕发出异样的光彩来。许多剧评家更预言中国古典戏曲表演形式上的特点必将影响今后西方戏剧的编导和演出。我国戏曲事业中这种伟大成绩的取得，首先由于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同时不断批判和纠正一系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使它得到健康的发展和飞跃的前进。

当全国解放初期，剧目混乱不堪，人们还不知用什么标准分清好戏和坏戏、精华和糟粕时，政务院在1951年5月5日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到了这年十月，文艺界与戏曲界又对戏曲改革工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展开了批判，指出当时一些新编的戏曲如《新天河配》、《新白兔记》等，强迫古人说今人的话，是既歪曲了历史，也歪曲了现实。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彻底清除了胡风和他的反革命集团在新文艺工作者中所散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解决了戏剧界中长期以来把话剧和戏曲对立起来的问题。在1957年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以大量铁的事实彻底驳斥了右派分子“今不如昔”、“戏改坏了”、“戏曲界没有培养出新人”等等谬论；同时教育了戏曲工作里一些厚古薄今的保守派，使他们懂得戏曲不但要继承传统，而且要发展传统。

由于我国文化历史的悠久，戏曲遗产的丰富，更由于解放十年来党对戏曲事业的领导，我国戏曲事业正取得辉煌的成就和出现灿烂的前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必须首先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戏曲工作的方针在戏曲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从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戏曲而奋斗。这样，我们的戏曲研究工作才能跟当前的舞台演出密切联系而愈搞愈有劲头。反之，我们如果仅仅把它当作纸面上的东西看待，仅仅在一些名词、概念上打圈子，那很有可能重蹈前人厚古薄今的老路，一头钻进牛角尖去，再也拉不回来。其次，戏曲是综合性的艺术，它的发展和成熟和其它文艺部门，尤其是诗歌、小说、说唱文学等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研究戏曲史必须同时考察和它密切相关的其他文艺部门的历史；而我们在戏剧史研究工作中的收获，亦将有助于其它文艺部门历史发展问题的解决。在我国戏曲发展过程中曾经不断吸收邻近各民族文化以及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同时我国戏曲上的辉煌成就又不断影响了东亚邻近各国以至欧洲各国戏曲艺术的成长。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对我国戏曲的影响；同时也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过分夸大我国戏曲对邻近各国文艺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明我国戏曲发展在世界文化事业上所起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际文化交流的意义，在戏曲研究工作中更好地贯彻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精神。在今天，我国各剧团到国外演出普遍受到各国人民欢迎，我們友好各国的艺术团体也經常把他們最优秀的节目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总结我国历史上以及当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不仅对今后各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起积极影响，同时有助于我們通过文化艺术的交流，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解放十年来，我們的戏曲改革工作、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和戏曲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这是首先值得我們高兴的。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我們的前进步伐还是远远落在时代要求的后面的。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之下，无数的先进人物在我們的生产战綫文化战綫上涌现，他們的英雄形象沒有及时地在戏曲舞台上得到反映。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优秀的剧作家和民間艺人創造成千累万的剧目，整理和改編的工作也还仅仅在开始。戏曲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怎样更好地結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方針，怎样更好地贯彻？戏曲音乐、舞台装置、导演、表演，如何更好地配合，把一个戏曲脚本搬上舞台，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統一？这里提出的种种問題要求导演、演員、剧作家、戏曲音乐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和爱好戏曲、关心戏曲的同志們，在党的領导之下，通力合作，及时加以解决。同时，回顾一下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解放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对于我們今后創造社会主义新戏曲的事业仍有其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这篇稿只意图就这方面談談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限于水平，錯誤必多，希讀者多多指正！

陈汉标教授論述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問題

最近，华南师院教育系陈汉标教授应邀在广东教育学会举办的講座会上，做了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問題的学术报告。他說，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所研究的心理现象是由物質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心理是人在参与社会实践过程中人脑对其所处的社会客观现实的能动的反映。所以心理学研究必須考虑到如下二方面：一、不能离开物質（包括作为心理源泉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心理的物質本体的大脑高級神經活动）来研究心理现象；二、不能把人的心理看作消极的靜止的反映，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反作用于客观现实的能动的反映。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的研究有所創造、发展，而不会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僵死的东西。同时，要学习吸取謝切諾夫和巴甫洛夫关于反射論的学說，注意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以及主观和客观的互相轉化等，要探求这些过程所賴以进行的生理机制，才能把人类心理的研究放置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

陈教授不同意近年来有的同志过低估計实验室实验的作用的种种看法。他认为心理学科学实验法中的自然实验与实验室实验两种方法都十分重要，亦各有长短。实验室实验能够更有效地控制条件，易于利用精密的仪器、仪表进行观察、记录，因而就能排除一些偶然的因素，便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細致的心理实验，得出比較精确可靠的結果，因而更能掌握心理活动的因果关系。至于說实验室实验会把复杂的情况简单化的問題，这也是符合于人的認識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的规律的；况且，我們还可以用模拟的方法来解决所謂“实验室实验与社会、日常生活因素隔絕”等問題。正确的道路应该是，把自然实验与实验室实验結合起来，把实验研究与实际教学、教育实践結合起来，才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从而使心理学研究工作在理論联系实际上大大前进一步。

（孺子牛）

越南汉詩的渊源、发展与成就

黃 軼 球

越南文学，具有千多年光輝灿烂的历史，創造了无限的珍貴遺產。不少篇章，反映了越南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历代反侵略的斗争图景，反映了中越人民悠久的真挚友誼。尤其在近代反帝反殖民主义波瀾壯闊的运动中，显示了文学的光輝战績。許多优秀作品，在东方文学領域里，占着崇高的位置。

在越南文学中，汉文学是越南古典文学中最丰富最光彩的部分之一，是越南人民珍貴的文学遺產。它和“国語”文学一样，为反映现实，为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有力武器。尤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它所起的作用，不但影响鼓舞越南人民的斗争意志，而且在使用汉字的广闊地区里，收到比“国語”更宏大的宣传效果。因此，对越南汉文学加以重視和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越南文学，頗似朝鮮、日本文学一样，过去曾受中国文学深厚的影响。因此，在越南文学史上，汉文作品，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据可靠的历史記載：紀元前二世紀，越南便采用了汉字，直至二十世紀初，长期广泛地成为全民所通用的“正統”文字。虽然十三世紀已有民族文字“字喃”(Chữ—nôm)的产生，但两者并行不悖，无损于汉字的重要地位与普遍使用。因为汉字的根基深厚，汉文学的各种体裁，亦自然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表现形式。名篇巨著，随着每个时代的特色而相继出现。

可惜的是，在越南处于殖民統治时代，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禁止与毁灭汉文作品，企图通过貶損或否定汉文古典作品的真正价值，借以阻遏中越两民族的友誼发展与泯灭越南人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加以历代兵火灾厄，往代名作，百不存一。^①然而汉文学仍为越南文学史上一宗巨大的遺產。昔人称越南文风：“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詩而

^① 黎初、潘学先編《越音詩集》，已感到往代作品，散佚甚多，不易搜集。他說：“國家号称文献之邦，而制作昔者礼义之國。自丁李之肇造，岂乏作者于其間，及陈胡之迭兴，咸有鳴名于当代。惜其屢經兵燹，散失独存；倘有收藏，舛訛难信”（見《皇越文选》卷六《上进越音詩集表》）。其后，黃德良編《摘艳詩集》、杨德顏編《精选詩集》、黎貴惇編《全越詩录》、裴存庵編《皇越詩选》，他們在例言或自序里，都談到了这一点。1959年越南文史地委员会編纂的《越南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4章，更詳尽的叙述这一历史經過。

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誚長吉者，有談古今而齒齒者”^②。李賢《贈錢溥出使安南序》，謂“安南乃詩書文物之邦，封王使非儒者不可”^③。至于黎聖宗自詡詩駕義山，胡季犛菲薄孔孟程朱，都是載諸典籍，傳為美談的史實。^④不少越南漢文學在藝術上達到了令人驚嘆的造詣。然而我們研究越南漢文學，不僅僅在於藝術的欣賞問題（這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作品，使我們獲得教育意義，鼓舞和推動兩大民族友誼的增進。通過這一面時代的鏡子，使我們對胡志明主席所說“我們越中兩民族數千年來，血統相通，文化相同”^⑤的巨大意義，有更深廣與更親切的體會。

越南漢文學範圍很廣，可以說也就是一部越南文學史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本文只就漢詩歌這一体裁加以初步闡述。

越南漢詩歌的發達以及偉大的成就，並非短時間所造成的。其間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孕育極其複雜曲折的過程。淵源深遠，根基牢固，才有可能獲致後來光輝燦爛的成就。

首先，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象郡，謫徙民與越雜處的時候開始，歷漢至唐，千有餘年。現代越南史家明崢說道：“自西漢以後，越南的生產條件，日見改進，物資交流也日見增加。為了便利內河的交通和航海貿易，在各條河流兩岸的城市不斷興起：麋冷（在今日永安省內）和龍編城（即河內一帶）瀕臨紅河；靠近天德江的北寧順城府的羸隴；在馬江上的胥浦（今日的清化）……是西漢在統治我國時候的一些商業已經相當集中的地方”。^⑥到了唐代，龍編成為商業重鎮，國際都市，繁盛景況，幾乎凌駕廣州。

隨着經濟的發展，有貢舉制度的吸引，地方上地主階級有餘裕從事漢文學的學習，並由此走上政治舞台。漢文學的傳播，有了優越的條件，而且在當時沒有其他文字可供使用，就一般社會文化活動，也非靠漢文字作為交流思想與交際的工具不可了。

其次，從中越人民的友誼交往和漢人南遷來說，對漢文學的流傳，同樣起着巨大的作用。牟子《理惑論》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三國時，薛綜上吳主疏云：“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有類似”。其實所謂《異人》或《罪人》，無疑地都是當時優秀的人物。《安南志略》把這些人物列入《歷代羈臣》卷里，是符合實際的。

② 見徐延和：《越南概略》文學編。

③ 見李文國：《越嶠詩》卷十七。

④ 均見《大越史記全書》叢紀。

⑤ 見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時胡志明主席《致華僑兄弟書》。

⑥ 見明崢：《越南史略》（初稿），漢譯本，第1卷，第3章，三聯書店1958年版。

至于有计划地推广汉文教育，在当时实具有特殊的意义，黎代著名史家吳士連謂：“我国通詩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⑦我国历史学者范文瀾同志指出：“汉献帝时，士燮做交阯太守，統率交阯七郡。内地士人到交阯避难，多至百余家。这对交阯說来，是一次大的文化輸入。士燮任职四十余年，境内安宁，当全国战乱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阯七郡独免兵祸，应该說是士燮安民保境的功績”。^⑧建立学校和避难人口的迁入，意味着汉文学更广泛更深入的散播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不断的繼續增大，〈資治通鑑〉載：“光緒元年三月，宁州頻岁飢疫，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可见交阯人民的接受汉文化，并非徒凭几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物枝节的零碎的提倡启发，而是經過长期的頻繁的友誼交往，才能达到“血統相通，文化相同”的境地。虽然在政治上，由于封建統治者无厌的剝削，导致越人不断的反抗，征王（40—43）、李南帝（541—544）、李嗣先（687）、枚黑帝（722）、馮兴（791）、杨清（819）先后的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残暴的統治，但仍无碍于汉文化的持續和扩大它的影响。

越南人民采用汉文字，熟习汉文学，便是在上述历史条件基础上所决定的。

因此，在十世紀前，即越南宣告民族独立之前，在汉文化陶育下，已有不少越南学者或政治家，占着中国文化史上很光輝的地位。如汉代的李进、李琴，晋代的张重、杜瓌，六朝的杜弘文、杜慧度，唐代的姜公輔、姜公复、廖有方……等，其中或以功业著，或以文章显，均见于載籍，名垂青史。至于独立之后，交阯士人来中国应试，成进士，登仕版，蜚声一时的亦所在多有。〈明会要〉載：“景泰甲戌，进士黎庸，交阯清威人，阮勤，多翼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广，扶宁人。成化己丑，王京，嘉靖癸未，陈儒，俱交阯人。儒仕至右都御史。”又有流寓中国，不乐仕进，惟以文艺名世，见重士林的，李介〈天香閣随笔〉云：“江邑邓欽文，字征父，号薇山。先世自交阯来归。邓、其賜姓也。詩仿唐，婉丽清新，善小楷行书，深得赵文敏笔法，画能写意，尤工花卉。同邑观察沈建南、大参季連江皆重之。而尤与大司馬刘公应谷相友善。自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无一日不与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搢謙选得若干首寿之梓，总名〈邓山人詩〉”。^⑨这些例子，正好說明在汉文学修养上，交阯人才与中国知識分子相較，毫无逊色，积千多年的涵濡孕育，汉文学已奠下了巩固的基础了。

二

在公元 939 年吳权击破南汉軍，越南宣布独立之后，历丁、黎、李、陈、黎、阮各

⑦ 见〈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三。

⑧ 见范文瀾：〈中国通史簡編〉修訂本第 2 編，第 3 章，第 5 节，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4 月版。

⑨ 见李介：〈天香閣随笔〉卷二，粵雅堂本。

朝，共千余年，汉文学得到继续的发展。

当时越南统治阶级继承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方术，仿照中国政治体制，提倡儒学，因此，诗赋经义，也成为越南一般士人所熟习的学问。汉诗歌的写作，几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黎贵惇的《艺文志》和潘辉注的《经籍志》里，可以见出他们写作的丰富，经史子集、旁及佛教道书，各类皆备，而诗歌的数量，尤为突出。

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有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在文学上也有不同的表现。越南自然也不会例外。

越南汉文学从何时开始？根据越南文学史家阮董之的意见，认为应从黎、李朝代开始。^⑩黎朝（981—1005）国祚短促，其间篡夺兵争，变乱频仍，政权还来不及巩固安定，当然谈不到文化建设。我们不妨确切点说，汉文学从李朝开始，更符合实际。

李朝（1028—1225）享国二百余年，北抗宋侵，南伐占城，曾经成为印度支那半岛上一个文化昌明的国家。在文化上，沿袭中国唐代崇信佛教的风气，先先后后修建了很多规模宏大的庙宇。明崢先生说：“僧侣不仅仅在宗教界有其地位，而且还扩大到政权方面。李朝初叶，大部分的官员都是从僧侣中提拔起来的”^⑪。例如李仁宗时“诏遴选诸僧有投献诗及僧官之识字者，隶为书家，以补其职之缺”。又高宗贞符四年孟冬“试三教子弟辨写古诗及赋、诗、经义、运算等科”。又天资嘉瑞十一年孟冬“试三教子弟辨写古人诗、运算、赋、诗、经义等科。赐及第出身有差”。李朝末叶，建嘉十四年，惠宗出家于“真教寺”。^⑫可以说，李朝政治完全贯串着佛教的色彩。佛教思想在当时占着显著的地位。

裴存庵《青池县文典社先贤祠址碑记》云：“自斯道（儒道）既南，国为文献之国。而有陈以前，除都城外，求所谓学宫文庙，未尝一见。今不惟路各有学，即微而一社，亦知所以从事如此。明都之壤，其涵浸于圣教者日益深，不其盛歟”^⑬。可见在陈代以前，佛教的势力是比儒教更大的。

这样的社会，自然也反映在文学上。而且从黎朝开始便以僧侣文学登诸史册，资为美谈。《大越史记》载：“黎大行八年，宋遣李觉来，至册寺，帝遣法师名顺（即杜顺），假为江令迎之，觉甚善文谈，时会有两鹅，浮水面中，觉喜吟云：‘鹅鹅两鹅，仰面向天涯’。法师于把棹次韵，示之曰：‘白毛铺绿水，红棹摆青波’^⑭。觉益奇之。及归馆，以诗遣之曰：‘幸遇明时赞盛猷，一身二度使交州。东都两别心犹恋，南越千重望未休。马踏烟云穿浪石，车辞青嶂泛长流。天外有天应远照，溪潭波静见螺秋’。顺以诗献，帝召吴匡越观之。匡越曰：‘此诗尊陛下与其主无异’。……觉辞归，诏匡越制曲以饯”。阮董芝先生说：“杜顺吴真流僧侣们的诗作，如果对当时的文学没

⑩ 见《越南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4章。

⑪ 见明崢：《越南史略》（初稿）汉译本，第6章。

⑫ 见《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及《越史略》卷二。

⑬ 见裴存庵编《皇越文选》卷之二。

⑭ 按《全唐诗》卷七十九载此诗，字句微异：“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为明崢所作。杜顺的应答，不但善用原作，且见才华。

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至少在外交方面，也就是在文学开始为政治为祖国服务的方面，它已起过作用。就这样，此后作品，便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⑮。情形确实是这样。李朝年数较长，而遗留下来的作品仍以僧侣文学为最多。依据黎贵惇《艺文志》所载，李朝著述凡十二种，除官书三种外，其余尽为佛道著作。可见僧侣文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不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传播一些寄生阶级的超脱虚无精神，内容不用说都是空虚、苍白、毫无意义的。

然而，当国家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统治阶级不能不起来作保卫自己的国土而斗争的时候，一些爱国主义的诗歌，便随之而产生了。1075年至1078年抵抗宋军的战争，李常杰将军的战歌，便是反映民族感情最富代表性的作品。

应该说明，黎李时代的诗歌是相当发达的。尽管写作的人仅限于少数的上层知识分子，但其中不少刻划山川，抒发情感，或使节应酬，敦睦邦交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仍有一定的研究、流传价值。可惜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主要原因，除水火兵燹等灾厄之外，还由于当时对印刷术还未能充分利用，手抄本容易失传。历史条件限制，这不独越南古代文学为然了。^⑯

继李朝之后，出现了陈氏王朝。

陈王朝（1225—1400）在越南史上是一个光辉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无论政治、经济或文化上，都比李朝远远地跨进了一大步。

更重要的是，它在保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巩固和提高了民族信心，树立了反侵略的英雄典范。1257年第一次击败元军，第二次（1284—1285）又粉碎了五十万元军的进攻。最后一次（1287—1288）再击溃三十万元军的水陆部队而光荣地结束战争。

陈朝，便是这样地以慷慨激昂的民族歌声开始它的文学序幕。陈光启、范五老、陈仁宗、陈明宗等，都是身亲行伍，捍卫祖国的英雄人物。他们的热情壮志，发为诗歌，应该说这是这时期爱国主义文学的代表。永为越南人民所珍贵传诵的。

相反地，也有一些丧失民族信心，腆然事仇，希图富贵的人物。他们降元之后，奢愿难偿，因而个人出处，家国兴废，思想感情上的种种矛盾，也时见于诗，甚至从诗歌

^⑮ 见《越南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4章。

^⑯ 黎朝洪德年间，黄德良编《摘艳诗集》十五卷，自序云：“诗不尽传于世有以也。余炙天下之绝味，锦绣天下之绝色，有口眼者皆知贵重。至如诗，乃色外之色，味外之味，不可以常目观，不可以常口尝。惟诗人能为睹之、甘之，一也。李陈建国以来，才子鸣世，岂乏其人。居馆阁者，以事烦不暇編集，其官散职卑，困于场屋者，皆不留意，二也。其间或有好选录，任重力弱，率皆迷途，三也。陈时诗文，未得旨不敢刊行，四也。夫以四者所拘，历三代之久，虽金石之器，神为之词，鬼为之护，犹散落淹没，况遗草纸，在篋笥之下，经兵火之余，而犹保其无隐乎”。他没有注意到印刷术在这方面的关系。

越南潘家祿在《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里说道：“十五世纪中期，梁女学在出使中国期间学会了用刻版印刷的技术，回到国内。而在这以前，一切刻版印刷都必须依靠中国工匠”。（何廷庆汉译，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可见在当时条件下，作品多为手抄，数量极少，印刷术的未能充分利用，实为书籍易于失传主要原因之一。

中作自我譴責。這些人物中以陳益稷、黎範為典型的代表。

中叶以後，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階級矛盾的加深，最後招致方興的明成祖的軍事征服，陳朝卒于崩潰。在陳王朝政治腐爛的過程中，不少作家已敏感地想象到未來的禍患。在他們的作品里，憂時傷亂，已成為總的主題。即流連風景，抒情寫意之作，亦不禁隱寓哀傷的情調了。大儒如朱安，詩以性靈超俗見稱，但撫時感事，也難免“聞說先皇泪暗揮”（《龍池》）的喟嘆。至于陳元旦，更爽直指出“白日升天易，致君堯舜難”（《題玄天觀》），道出對一個昏庸統治者的不滿。社會現實使他觸目惊心：“年來夏旱又秋霖，禾稿苗傷害轉深”。在這種情勢下，窮民只好餓死填溝壑，回顧自己高官厚祿，不能不感到“三万卷書無用處，白頭空負愛民心”（《壬寅六月作》）的內心責備，卒至憔悴而死。^①

陳朝的作家很多，阮忠彥、張漢超、范師孟等均卓然成家，各具風格，無愧作者。甚至號為英主的陳英宗、明宗，亦認真寫作，毫不苟且，並且在死前命人將稿焚去，深恐不成熟的作品貽譏後代，這都足以說明有陳一代漢詩歌注重質量的一面。

陳朝滅亡之際，尚有一頁壯烈的史迹，為陳朝抗戰放射最後的一點光輝，就是黎景恂、鄧容等的熱愛祖國，從容赴義的壯烈精神。“身雖老矣心仍壯，又有當然死不辭”（黎景恂：《無意》），與“國仇未報頭先白，幾度龍泉帶月磨”（鄧容：《感懷》）這些都是結束陳代一百七十年歷史的豪壯歌聲，永遠留傳在越南人民的記憶里。

在三百六十多年黎王朝所建立的大越國歷史中，可以分為前後兩期，而以莫登庸“僭位”為分水嶺。

在文學上，亦大致與歷史發展的兩大階段相符合。前一階段是一個統一的局面，後一階段則為藩鎮割據長期內亂的社會。因此，反映在文學上各具有不同的特色。從整個黎朝文學來說，作家作品之多，較前代更為繁盛。由於經過陳朝百餘年長期培植，漢文學已有了穩固的雄厚基礎，黎朝繼續倡導，配合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的劇烈，豐富了、充實了文學的內容。而且印刷較前便利，作品流傳較廣，時代距今較近，文獻保存較多，這些條件，使黎朝漢文學在越南古典遺產中佔了很大的比重。

從黎朝開國至聖宗年間，因為對外驅逐了明軍，對內採取了對人民社步的改良政策，因而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出現了物阜民安的小康局面。特別是黎利藍山起義，不少作家參與抗戰行列，豪情勝概，輝煌業迹，足與陳朝三抗元軍的光榮紀錄，先

^① 阮厲《冰壺遺事錄》云：“冰壺相公、陳氏之親族。父人內太保威肅公、諱文璧，……祖文肅王、諱道載。……曾祖上相太師昭明大王、諱光啟。太宗之次子，重興年間，功居第一。

公諱元旦，家傳詩禮，嘗出神明，霽月光風，雅有出塵之想，青天白日，明其許國之忠。……數年之間，海內平治，國人稱曰賢相。雖兒童走卒，莫不知名。自胡氏逆用，閉冰始凝。公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于是創清虛洞于鳳山縣之昆山，以為退休之處。

公雖迹寓林泉，志存宗社，其憂愛之念，惓惓未嘗一日暫忘于懷。每托之詩歌，寓其忠憤，或去或留，一動一靜，莫非諫說也。芝宗終不之察。……臨終病弗服藥。子孫有勸之者，必曰：時事如此，卒得死幸矣。豈復求生見禍亂耶？……有《冰壺玉壺集》行于世”。（《皇越文選》卷三）

后媲美。他們就以雄壯豪迈的詩篇來作為黎朝文學的開端。

例如黎利（黎太祖）《征刁吉罕還過龍水堤》一詩：

崎嶇險路不辭難，老我猶存鐵石肝。義氣掃空千嶂霧，壯心夷盡萬重山。邊防為好籌方略，社稷應須計久安。虛道危灘三百曲，如今只作順流看。

全詩充滿了慷慨、英雄的氣魄，表現出向上的蓬勃的氣象。

“憶昔藍山玩武經，當時志已在生靈”。（《賀歸藍山》），這是開國元勳阮廌的自白，“一戎大定何神速，甲洗弓囊樂太平”（同上題），是何等樂觀、昂揚的精神。阮能靜《抑齋先生詩文集序》云：“蓋自宋明之吞交也，奴其人，漁其貨，夷其山川地紀，神怒民怨郁而不得伸者數十年。先生起，首獻大策，不言攻城而善言攻心。卒使其十五道之人士，挈而歸之我，先生之功昭昭矣”。吳世榮序云：“先生平生吟詠，窮而堅，老而壯，前輩稱不忘君親，一一于集中見之。夫其晦有所養，顯有所用，藏專足以相忘，行專足以大得，此豈剽竊陳迹而試其或成者哉”！^⑧ 實則這種豪迈氣概，不僅阮廌個人如此，這是黎初一般作者所共有的向上、激揚的情感。題材風格各有不同，而樂觀曠爽的情調是幾乎一致的。

漢詩歌到了黎聖宗（1469—1497）時代，隨着國力的繼續上升，社會安定，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提倡風雅，準備了條件。加上聖宗好大喜功，自負才略，史稱其“手不釋卷，經史篇集，歷數算章聖神之事，莫不貫精，詩文隻出詞臣之表”^⑨。並且組織“詩壇”，自為元帥。申仁忠《聖宗昭陵碑銘》序云：“（聖宗）萬幾余暇，留意藝文，不邇聲色，不御游畋，不尚珍貨，不為侈靡。……況乎聖學淵源，則書林冊藪，罔不蒐羅；聖文光焰，則奎畫云章，同其昭晰。精神心術之所著見，道德事業之所發揮，其在《天南前後集》及御制諸書，歷代英君制作，鴻儒著述，未有如此之宏博艷冶”。陶舉在《瑯苑九歌詩集》後序里也同樣頌揚：“聖天子……乃于燕閑之際，斥聲妓之娛，絕游畋之好，清心寡欲，端本澄源。……故發于英華之外，形于吟詠之余。始則詠時和年丰，以志天心之協應；中則言君道臣節，以勉人事之當勤；末則托物寓懷，以勵臣工之清操。理致高邁，詞氣雄渾，勸勉之情，溢于言表。……”^⑩ 對當時的聖宗來說，這種做法肯定是為了興趣，為了消遣自己閑適光陰。不過也出乎他個人的意料，這種在歷史上的創舉，卻成為詩壇上千古美談，對漢詩歌的寫作起了鼓舞的作用。

他自詡詩駕義山，稱義山《錦瑟》詩“奇麗精美，可與吾侪，而清瑩澄徹，未及吾詩句也”^⑪。雖然失之浮夸，但他臨死時還盡力作詩，醉心藝術的精神還是很動人的。他的作品豐富，惟內容貧乏，追求形式的居多。然亦有感情豪迈，描繪祖國美麗山川或人民生活的。至于隨從諸臣，騷壇名宿，他們的詩作，無非陪宴應制，工穩雅正，做些

⑧ 見《抑齋先生詩文集》序二。

⑨ 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實錄卷四。

⑩ 見《皇越文選》卷三。

⑪ 見《大越史記全書》黎紀。

点綴升平的功夫罢了。甲仁忠、杜潤、阮冲慤等代表了这一阶层的人物典型。

圣宗逝世后还不到三十年，换了五个王帝，統治阶级集团内部傾軋，日益加深，結果权臣莫登庸篡夺了王位（1527）黎氏王統中絕了六年。在这社会騷动，民生離困的时候，詩歌所反映的现实，已不是快乐的气氛，而是对統治阶级的憤怒和控訴了。武睿的《书憤》和阮躑的《絕命詞》便是那个时代一幅悲慘的现实图画。

黎王朝后期，始則有黎莫南北朝的对峙（1527—1592），继有阮、郑两大軍閥的混战。前者兵爭凡六十五年，后者达百余年。兵連禍結，荼毒人民，徭役繁重，田园荒废。广大农民迫得鋌而走險，相率起义。終于在西山起义軍的鉄拳下，粉碎了南北軍閥集团，赶走了黎王昭統。长久分裂的局面，至是又告統一。在軍閥混战的期間，外国資本主义乘机侵入，进行剝削和掠夺，造成沿海都市的表面繁荣。随着商品經濟的发展，开始了資本主义的萌芽。^②

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丰富而多彩的。长期的战乱，把人們全部卷入了漩涡。现实生活提供作家們写不尽的題材。残酷的现实，再不容許知識分子躲在象牙塔里，现实迫使他們投身到火热的生活里去。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富于政治性、现实性，长篇巨制，陸續出现。有的是揭露黑暗，反对战争，有的是向往自由，反对封建。出现了“千岩竞秀、万壑爭流”的雄伟局面，这是越南汉文学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第一部最重要的作品是邓陈琨的《征妇吟》。这首三千五百言的长詩，在当时已負盛名，到今天仍然在广大群众中普遍传誦。^③它細致的描写南北两藩繼續百年的战争景象，征人苦戍与征妇的忧伤。作者在这里运用丰富的想象，以及使用形象的語言，曲折地表现时代的灾难，分担着一切遭受战争痛苦的人們悲剧的命运。它的雄伟气魄，謹严組織，实为喃文《宮怨吟曲》《金云翹传》长詩的先导。

同样，有些人虽然是為旧朝廷、为封建道德尽忠节，本无足取，但他們各經忧患，秉性倔强，在严重关头，往往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例如随昭統向清廷求援的黎儂、陈名案，他們拒絕剃发改服，保持民族的尊严，情願下獄而不改初志。《嘯亭杂录》称他們为《俊杰之士》，^④在这一点上，应该肯定他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陈名案的《感怀》，黎儂的《劫后》，都是极沉痛动人的作品。

此外，有借詩以發揮哲理或宣扬儒教的（汝公瑛：《遺同年范立斋》、裴公璧：《寄家弟》、《蚌蛤沙》……等），有歌咏祖国山川的（此例甚多），有痛心国事，感怀身世的，体裁多样，范围广泛。汉詩歌到了黎末，标志着艺术发展已达到一个高峰。

越南黎朝名学者黎貴惇曾經率直地指出：“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中国，黎先皇送宋使李觉一詞，婉丽可掬，李家圣、仁二宗，皆能书工詩，今无可考。太宗二首、仁宗一首，仅见《禅苑集英》。陈朝諸帝，最爱題咏，各有詩集，散落失传，见于《越音集》

^② 关于越南資本主义萌芽問題，見潘嘉紘：《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第9章，何廷庆譯，1959年商务版。

^③ 按民間所传誦的为段氏点的譯本，但相得益彰，并无損原本的光輝价值。

^④ 按平步奇：《海外攬勝》卷一，《安南四臣》条，亦載此事。

仅数十首。大抵托兴夷曠，寄情高雅，风味溢然犹存。虽禅語为多，亦足以见当时政教声音之梗概。

“本朝（黎朝）再辟山河，高皇倥偬馬上，而御制三詩，气盖一世，直与沛公旗鼓相望。淳皇守成，好为詩章，多至千首，每命名臣評品。今见于輯录者，豪逸峭激，炯然帝王气焰，当不下于汾水英风。……”^②黎氏更就当时一般詩人——甚至禅衲、妇女（当时妇女在封建制度下，很少受教育的机会，詩作不多）的詩作，加以論述，說明越詩的巨大成就。

名作家吳时仕也有同样的評述：

“我越以文献立国，詩自丁李，至于陈，大发扬于皇黎洪德間，一部全越詩，古体不註汉晋，近体不註唐宋元明，曼玉敲金，真可称詩国。就中求其机杼大段，可称詩家者，蔡呂塘、白云庵諸公……暨乎皇黎中兴以后，名家之詩，杂见于使华諸作，其或寻幽訪古，触景生情，去国怀乡，因事迹意，残膏剩馥，真可以沾溉后人。……”

“为詩亦然，涉程朱之藩，逾屈宋之国，越韓范之室而超李杜之衢……”^③

黎吳議論，未免稍涉夸大，但按諸实际，越南汉詩的成就是不愧称为“詩国”的。

在黎朝文学結束时，应该特別提出莫天錫的《河仙十咏》来談談。河仙是明末遺民莫玖所开辟的，玖死后，子莫天錫与当地越南人民合作，艰苦經營，成为一大都市。

“撫劍徘徊独登楼，中原极目不胜愁。等閑未了平生志，野鳥蛮花几度秋。”（莫玖：《无題》），可以见出遺民飘流异地的凄苦与对祖国的怀念。到了天錫时，河仙地方大大地改观了，《河仙十咏詩集序》云：“安南河仙鎮，古属荒陬，自先君开創以来，三十余年，而民始获安居，稍知栽植。……此詩不特为海国生色，亦可作河仙志乘云尔”。（莫天錫作）。往昔荒涼的僻壤，經中越劳动人民的艰苦經營，成为詩人墨客所歌頌留恋的美丽地方，无怪莫天錫认为“风声浪迹应长据，浓淡山川异国悬”，感到无限的热爱和欣慰了。^④

《河仙十咏》标志着中越人民真誠合作的友誼，真正地成为《河仙志乘》的一頁宝贵史料。

事实上，在莫玖建設河仙之前，远的且不說，仅就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而論，就有杨彥迪的开辟美湫，陈胜才的拓地盘麟。这些事迹，在中越人民友誼合作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永垂不朽的盛事。^⑤自此以后，更有不少在文学上政治上作出了贡献的人物：

与《河仙十咏》相媲美的有《嘉定三家詩》。三家是：郑怀德、吳仁靜及黎光定。

^② 见黎貴惇《全越詩录·例言》。

^③ 见《星槎紀行》詩集序。

^④ 关于莫玖父子事迹，参见李星可譯《阮氏征服南圻与华侨的贡献》。載《南洋学报》十四卷，一二輯合刊，1958年。原著Paul Boudet: La Conquête de la Cochinchine par les Nguyen et le Rôle des Emigrés Chinoise 原載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Orient, Vol. 42. (1942)

他們都各有專集行世，欲譽一時。其中鄭、吳二人原籍中國，明亡之後，先後流寓越南，成為越南卓越的詩人政治家，都曾出使中國。

鄭懷德《艮齋詩集》自序云：“余原籍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福湖鄉，遠祖國浦公，兵部尚書。……暨顯祖，會大清初入中國，不堪變服剃頭之令，留髮南投。客于邊和鎮、福隆府、平安縣、清河社，受一廛而為氓。……庚子年，余入贅黎家，得所依托。……戊申、中興初，當路群公，不揣虛譽，舉余翰林院知制誥。……”阮迪吉序《嘉定三家詩》，着重指出：“鄭侯良齋，今之聞人也。其先，中土閩建人。卜居于南几世矣，至侯而昌焉。”他出使中國時，《過零丁洋有感》云：

千里星槎逐水東，零丁洋里晚帆沖。虎門牙制臨關險，鵬嶼屏開接地雄。趙尉來時南氣王，文山過後宋圖空。無窮岳瀆興亡感，滄泣波号午夜風。

又《粵中懷古》：

萬家鷄犬夜相聞，帶楚襟闔九郡分。駝馬禁前南自帝，褚衣賜后北尊君。黃昏祠冷龍川月，白晝关沉虎嶂云。朝漢（原注：台名）尚留當日氣，嵐烟晨夕散香熏。

字里行間，仍微露睠懷故土，隱寓興亡之感。鄭懷德在文學上固然有很高的造就，而在史學上貢獻亦大。他的巨著《嘉定通志》猶為今日研究越南南部的重要文獻。^②

吳仁靜在越南同樣也受到當時社會的重視與稱頌。裴楊瀝序吳氏《拾英堂詩集》云：“汝山（仁靜別號）兵部大人，負中州英氣，來游我越。方其天造云雷，自許馳驅，以輔大業，忠愛之情，發之于詩。……固知越運當興，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大人

② 關於楊彥迪、陳勝才（或稱陳上川）的開辟南部，Paul Baudet 這樣的寫道：“這些人，有的從事商賈，有的致力农垦。他們的地点选择的很好，不久，不单本地人，就是其他的中國人、日本人、甚至西洋人，也漸漸湊集來和他們交易買賣了。這真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新中心，蔚然暢盛，自成風習。……為了人口發展，曾經招募廣平的農民來移住開垦，建立了不少村庄。土地分配了，賦稅也經厘定，華僑也是同樣待遇”。他着重說出：“這就是中越合作的開端，將來的輝煌收獲，這時已經十分顯然。”

關於莫玖父子的建設河仙，他寫道：“在這塊新地上，他（莫玖）創立了河仙城。他又招募廣南、廣義的流民以及占婆人來沿岸各地居住，建了不少村庄。他強迫新來的移民種稻種菜，他建築房屋，興建碼頭，這碼頭一時是船舶湊集，有的來自中國，有的來自東京（北圻）以及暹羅，安南人說‘那船桅多的不可勝數’。儼然是個小廣州。這塊洪荒不毛之地，莫玖雖然沒有把它變成‘人間樂園’，至少是開發成一個人口繁盛的可居之地了。

“莫玖卒於1736年。……他的長子莫天錫繼位。……由於莫玖，河仙發達成為一個可以居住，甚至可愛的地方。他的兒子，進一步使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文化中心。福建以及歸仁的文學才藝之士，其中還有許多僧人，都受了他的羅致，接踵而至。他創立了‘招英閣’講論儒學，羅致文人武士；這些人一共十八位，他稱之為‘十八英’。

“莫玖在河仙三十年，利用當時的太平無事，他教會了本地人耕種稼穡。

“莫天錫繼承父業，他在公余之暇邀集文學之士，談史詠詩。

“交趾支那的西部，從朱篤到金甌，從貢嘔到邊和，今日的稻田收獲如此美麗，這一部分應當歸功于當日的中國移民，特別是應歸功于安南人民的克苦堅毅”。（同注②）

這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學者，在事實面前，也不能不承認歷史上中越人民合作的偉大成就。此外，關於華僑開辟越南中部的史事，可參見阮紹樓《明鄉社的構成與發展》一文。（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é. No. 4.1941.）

③ 按鄭懷德於1804年出使中國，著《觀光集》及《可以集》。

之得全于天也，固有来矣”。^⑧

他的《客中杂感》十二首，为奉使中国时作，有云：

南北分万国，乾坤是一家。送情风窈窕，遣兴月光华。柳拂黄金叶，雪开白玉花。遥看春草色，无限绿天涯。

爽朗的襟怀，愉快的笔调，写出了中越一家的美好理想。

另一个作家黎光定，以诗画名于时，著《华原诗草》，《登黄鹤楼作》一律云：

黄鹤楼头象外宽，汉阳城郭远晴澜。吕仙醉后重来杏，崔颢诗成再和难。尘梦未醒青草畔，乡心每寄白云端。翰飞迹古炎阃远，人景遭逢有此观。

又《长派侯发》一律云：

肯因零落换容颜，松柏应同节操看。不为焦头依北阙，宁教蓬鬓整南冠。知君回首求长易，笑彼吹毛见短难。比美当时应可鉴，争来千古一奇观。

前一首写黄鹤楼的壮观、传说，结合自己旅途的感想；后一首写越南长派侯黎侗，不甘剃发易服投降清朝的史实。都可以见出作者的才华与抱负。

这些例子，仅仅说明文学活动的大致轮廓，至于披荆斩棘，开荒辟土，创造了无穷的物资财富，中越劳动人民团结合作，对文化上的卓越贡献，史册流传，更彰彰在人耳目，无待赘述了。

所以，黎朝一代的汉诗，无论在政治性、艺术性乃至作家作品数量上，都是跨越前代，成就奇伟的。

西山朝（1786—1802）统一了越南之后，对施政各方面，都有新的进步的改革。在文化方面，固然尽力提倡民族文字喃的写作，但汉文文学，同样亦获得长足的发展。属于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先后出现的有：阮行（1761—1823）的《鵝鳴詩集》、《观海詩集》、《天地人物事詩》，武輝璠（1749—1800）的《华程随步集》，武时任的《寒閣英华》，潘輝益（1750—1822）的《裕庵吟录》、《星槎紀行》，阮浹（1723—1804）的《幸庵詩稿》，阮攸（1765—1820）的《清軒詩集》、《南中杂吟》，范廷琥（1768—1840）的《东野学言詩集》、《松竹蓮梅四友》，阮案（1770—1815）的《风林鳴籟詩集》，陈名案（？—1796）的《了庵詩集》，宁巽（1774—？）的《拙山詩集》；吳世璘的《风竹集》……等。可惜“西山掌握政权仅仅只有十年左右的光景”，^⑨便以腐化变质，为凭借外力的阮福映所推倒。

1802年，阮福映依靠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击溃了西山政权，在顺化建立起阮王朝（1802—1945），并向清廷“朝贡”，请求封号。

阮王朝投靠法帝国主义的結果，便是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酷过程。1858年，法寇开始攻占沱瀾，直至1884年《顺化条约》的订立，越南便沦为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然而阮王朝虽签下了卖身契，而英勇爱国的越南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法

^⑧ 吳仁靜，广东人。1804年与郑怀德出使中国，有《拾英堂集》，与粵中文士唱和之作极多。

^⑨ 见明尊：《越南史略》（初稿）第3卷，第9章。（汉译本第290页）

帝刺刀和枪尖下生活了八十多年，同时也前仆后继地斗争了八十多年。斗争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从勤王运动(或称为文紳起义)至1929年印度支那共产主义組織成立前各項运动，从未中断停息过。但由于阶级利益、阶级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把越南革命引向在基本上既反帝又反封建的地步。“只有到革命的領導旗帜，在工人阶级手中高高举起并且紧紧地掌握住的时候，向越南革命提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两个任务才能够完成。”^②

在这多灾多难的历史阶段中，傀儡王朝还极力推行为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各項反动政策，^③扼杀那在十八世紀中刚刚有了某些发展的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和一切进步力量。就文教事业来说，还极力保存愚民政权的科举制度。以为这样，便可以“长治久安”，可以长过傀儡王帝的生活。然而一般爱国的知識分子，在接触到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生活，接触到殖民制度的政治社会现实，他们一些人勇敢地冲破这个鋼閉民智的堤防，大胆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他们的血和泪，甚至生命，写下了不朽的民族史詩和热情的爱国篇章。长征同志指出：“近一世紀中的越南历史，是一部越南民族反对法殖民者残酷的殖民地政策的历史”。^④因此，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自然也反映这一社会的斗争现实。

事实正是这样，文学史家怀清說道：“十九世紀中叶，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为止，在整个法帝国主义統治时期，沒有那个时间不发出激烈反抗异邦侵略和声討卖国贼的呼声。这表现在十九世紀末叶，爱国詩人阮庭炤那些充滿着憤懣情調的作品里；二十世紀初叶，潘佩珠那些洋溢着豪放气概的詩文中，以及最近許多作家詩人那些强烈的仇視敌人和热爱祖国的創作中。”^⑤

在汉詩歌的范围里，我們可以举出一連串的光輝的名字：阮尚賢、潘佩珠、潘周楨、乃至于慷慨殉国的潘廷逢、杜輝燎、阮高……等英雄人物。他们不仅以文艺名世，他們的功业已足以增輝史册，永垂不朽，而他們的作品(那怕是片言只字)，都是他們崇高人格的表现，集中地表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或反封建的进步意識，永远为越南人民所传誦、记忆。

例如1860年間起义抗法的胡勛业、1868年起义抗法的阮有助(即首科勛)、1886年雄岭起义的宋維新，他們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慷慨就义或临刑賦詩的英雄形象，却永远銘刻在越南人民的心上。《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写道：“首科勛在被法国强盜押解到龙島处决之前，还咏了如下詩句：‘无怖已惊胡虏魄，不降甘断將軍头’。以及胡勳业所咏的詩句：‘此身生死何須論，只恋高堂鶴发垂’。一个是表现了败将的英雄气魄。一个是表现了視死如归的大无畏的精神和人子的一片孝心。”^⑥

^② 引自陈輝焯：《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汉譯，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94頁。

^③ 同注^②第6頁。

^④ 见长征：《越南社会性質与越南革命》，何廷庆譯。載《史学集刊》第1期，东北人民大学1957年版。

^⑤ 见怀清：《在革命斗争中前进的越南文学》。載越南河内《新越华报》，1959年3月2日。

^⑥ 见汉譯本《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34頁。

阮尙賢、潘佩珠、潘周楨等人的作品，更持久地、广泛地影响着广大的群众。尤其潘佩珠、潘周楨反帝反封建的詩歌，深刻地教育了当时的知識青年，提高了青年的政治觉悟。我們可以說，两潘是这一时代的两面光輝旗帜，他們的作品是这时代的瑰伟史詩，是越南人民的荣誉与驕傲。

潘周楨（1871—1926）反科举制度的《至誠通圣》一律云：

世事回头已一空，江山和泪泣英雄。万民奴隶强权下，八股詩文醉夢中。长此百年遭唾罵，不知何日出牢籠。諸君岂是无心血，請把斯文貫一通。

又《赴昆仑獄口占》：

累累鉄鎖出都門，慷慨悲歌舌尚存。国土沉淪民族瘁，男儿何事怕昆仑！

潘佩珠（1867—1940）1913年以奔走革命至广州，为反动軍閥龙济光拘捕下獄，潘氏《羊城入獄作》一律：

飄蓬我輩各他乡，辛苦千般份外尝。性命几回瀕死地，須眉三度入灵堂。惊人事业天陶鑄，入世风云帝主张。假使前途尽夷坦，英雄豪杰也庸常。

又《从上海被逮解回越口占》：

既不生除天下乱，那堪死后累来人。好从虎口还余愿，肯让夷齐一个仁。

两潘的著作很多，上举数首，仅示一斑。这些詩作都和他們英雄的革命的一生、斗争的生活分不开的。

至于阮尙賢（1868—1926），他九十篇遺世的名作，沉雄悲壮，早为我国文坛所传誦，例举如下：

野草东风战血多，六龙宫闕泣銅駝。鈞天夢罢成烏有，易水歌終喚奈何。去国烟光空烂漫，題桥名姓欲消磨。关山跃馬心犹壮，醉握灯前越石戈。（《感怀》）

川原渺渺角鳴秋，夜挾龙泉上戍楼。万里黑云风扫尽，中天星斗照神州。（《即事》）

雉雠南城夕照过，千年国邑訪东阿。亲王百战匡时早，祭酒孤忠感事多。虚倚一图安社稷，直留孤塔对山河。阳陵石馬今安在？烟雨漁舟入醉歌。（《陈宫怀古》）

回首龙城剩劫灰，三朝宫观暮烟衰。秋风一水兼天去，落日千山繞塞寒。桥上聞鷓知地气，草間射虎惜人才。西湖不記当年事，漫放蓮花照酒杯。（《即事》）

一声义鼓壮山河，仇血滔滔逐逝波。无限笔鋒并舌剑，回头終愧魯阳戈。（《南望》）

微风无計逐鷓鷃，望断南溟积雾昏。种族存亡书上血，山河来往梦中痕。时危益叹人才少，道丧爭推霸术尊。我愿重生汉忠武，为留正气补乾坤。（《有感》）

涉險攀危不計年，南穷桂粤北幽燕。此头未碎宁忘国，孤掌难鳴欲問天。夜雨哀吟吳苑側，秋风慟

哭岳坟前。龙渊锈涩浑无用，惭愧灵胥九节鞭。（《书怀》）

艤棹滄洲独放歌，云边回望旧山河。人間罗网空如織，万里长天一鷁过。（《舟泊香港》——三首录一）

越南现代作家文津說得对：“十九世紀末叶的越南文学基本上是爱国文学。它的目的在于歌頌人民的战斗和勇敢精神，或斥責封建階級卖国求荣的卑鄙行为，或描写人民在世事紛乱时期的境遇。……它对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有着巨大的作用。”^②我們可以用来作为这一时代文学的扼要說明。

三

八月革命，依靠伟大的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英明的领导，越南人民取得了光輝的胜利，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十六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設各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巨大成就。文学艺术，亦毫无例外地呈现出空前蓬勃的气象。

汉詩歌，虽然在现代越南文学中并非重要的部分，但我們兴奋地看到它在嶄新的时代、环境中，和国語文学同样成为評价很高的銳利武器，放射出社会主义艺术的巨大光芒。

胡志明主席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出了許多杰出的战斗詩篇。1960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庆祝胡志明主席七十寿辰，出版了胡主席的《獄中日記》詩抄。中越人民都怀着相同的深厚感情来閱讀这部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伟大作品。

1917年，法殖民主义者正式宣布在全越范围内停止汉文教育与废除汉文科举制度。因此，一般文学史家以这一年为汉文学宣告終結的一年。計越南立国以来，使用汉字，讲求汉文学，已历千年。究竟汉文学在越南文学史上应占何地位，如何評价？过去是有爭論的，^③但从历史事实証明，它的成就是卓越的。

但是，在概述了越南汉詩的这些卓越成就的同时，应该指出，它和国語文学、民間文学相較，显然存在不少的缺点：

第一，在早期的汉詩里，很少触及階級斗争的題材。这是因为絕大多数汉詩的写作者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层分子。他們对于外国侵凌，可以有民族反抗的立场，但对于普遍存在的階級矛盾，他們的立场，便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以在作品里所反应的，只有微弱的同情呼声，缺少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比之国語文学和民間文学，自然相形见拙。

第二，汉詩很少触及男女爱情的題材。这是因为越南封建統治集团以礼教为統治艺术，提倡礼法，束縛思想。所以关于男女爱情的描写，极少以汉詩表达，多以非“正統”的国語歌謠来抒写。

汉詩歌有了上述的缺点，因而許多作家热情于国語詩歌的写作。他們能够准确地运

^② 见越南文津：《越南的古典文学》。載《越南新聞》，1958年11月。

^③ 对这一问题，在过去（1958年）越南文学界是爭論过的。有些作者持否定的态度，有些持肯定的态度。还有一部分作者持折衷的态度。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結論。在现在來說，問題渐渐明确，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少了。（詳見《越南文学史讲义》，第1章，北大东語系，1958年。）

用民族語言和民間生动、丰富的詞汇，使作品具有完全的民族色彩与特征——这是汉詩歌所不能达到的境地。我們在越南文学史上看到更多的輝煌的国語作品，足以說明汉詩歌的局限性。

然而汉詩歌是历史的产物，千年来經過多少天才学者、英雄人物心血所凝成的璀璨遺產。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表现的成就是巨大的。

第一、它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越南汉詩的优秀传统。一千年来，我們从越南文学史上看到了許多光輝的詩人名字，他們敢于正視现实，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要求，尤其在国家遭受危难时，不少作者直接参与反抗外族侵凌的斗争。现代越南史家明崢說：“多少世紀以来，我国人民捍卫祖国独立的英勇斗争传统，一直活在越南人民的心目中，活在每一个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心目中。他們曾經建設了越南，当然不允許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的铁騎来蹂躪自己的国土，干預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法国統治时期的連綿不断的斗争，已經証明了这个传统。在我国国土上贏得和平也同样証明了这个传统”。^③ 我們可以說，汉詩歌在实践上完全体现了这个传统，李常杰、陈光启、范五老、阮鷹，一直至抗法时期的許多作者，都是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对民族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之，他們的作品充滿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它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許多汉詩歌作品，不仅在思想內容上有卓越的表现，而在艺术上同样达到光輝的高度的造詣。^④ 我們从越南汉詩里，可以找到不少思想

③ 见明崢：《越南史略》（初稿）第9章，第4节。

④ 我們可以在越南一些作家的艺术論著里，见到他們写作汉詩的艺术修养。摘录数則，以为佐証：

黎貴惇云：“汉魏齐梁、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行乐府，謂之古体。唐以来五言六言七言律絕，謂之近体。古取流动，律取偶对。古贵高峭而暢达，近贵清远而秀丽。格局态度，迥不相同。昔人云：律不杂古，而古不可杂律。”

詩家文字，各有体制，台閣侍从，則溫潤丰縉。軍城边戍，則蒼涼豪壯。时序景物，貴乎清丽。山林隱逸，貴乎閑放。道志須庄重，吊古須感慨，投贈須婉恋。意趣先立，詞調从之。必将此詩移入彼詩不得，始为精切。

香奩題咏，虽非閨閣所宜，但三百篇中，类多妇人女子之詞。后此如易安、希孟，艳称詩选，无妨收采”。（《全越詩录·例言》）

裴楊灑云：“詩者，情之发而神貫乎其間。人莫不有情，尚乎情則情极矣。唯神則行乎情而不囿于情。虽作者亦未知其然而然者。故观詩观其神則几矣”。（《拾英堂詩》序）

裴存庵云：“嗟夫，詩之为詩，三百篇其至矣，汉古詩十九首，犹为近之。自是以还，冲淡称陶靖节，沉雄称杜少陵，飄逸称李太白，彼其骨格特异，要皆有深趣者也。”

我越有陈与国初，其气稍渾，洪德清丽，末流浸弱。中兴乃朴拙，永盛保泰，更为通畅。近年頗尚意格。继今而作，殆将有大雅之遺响者歟？

抑聞之：詩言志，后變教胃子以詩歌，声律养其性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夫子論詩，蔽以思无邪一言。苟能从事于此而审择焉，是亦所以治心而养气，奚仅悅夫文藻而已哉”。（《皇越詩选》序）

阮迪吉云：“天籁自鳴，意到笔到，不費推敲求索之勞，而亦无推斟酌鏤之迹。朱夫子所謂咨嗟永叹之余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其斯之謂歟”。（《拾英堂詩》序）

类此的詩論，各家所见不同，大致承襲我国各派的主張。所以越南汉詩在艺术上，亦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尤其在抗法阶段的爱国诗歌，两潘、阮尚贤、黄叔抗等动人的诗篇，过去曾经感动多少被奴役的中国人民！至于历代名作，受到中国学者所推崇的，更常见于各家专著，无待举例了。

第三、汉诗歌丰富了国语文学的内容，促进了国语文学的发展。越南作家文津说道：“在十八世纪以前，喃字还受到歧视和很少用来进行创作。文学语言仍然受着汉语的严重影响。各种诗体也往往是临摹中国的诗体”。文津又说：“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喃字文学在内容、艺术和语言方面的成就，正是由于懂得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懂得和体现在歌谣民间故事中的民间文学相结合而获得的。”^④

事实正是如此。因为中国文学历史悠久，许多不朽的艺术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庫的瑰宝。越南作家以历史条件关系，使他们能有机会向汉文学古典遗产作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吸收精华，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以此来滋养、提高发展国语文学。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品如《金云翹》、《宫怨吟曲》……等，都突出地显现中越文学融合的烙印，同时又体现出民族特色的高度艺术表现。由此可见，汉诗歌对国语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良好影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越南国语文学，在文学史上，应该占着重要的地位与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但它和汉诗歌，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许多作家兼长两者，左右逢源，相得益彰。是不能妄分轩轻的。

第四、在促进国际友谊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是越南文学很值得珍视的历史传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頁光輝的記載。

最后，从上面的论述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越南汉诗歌的成就是卓越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愈加感到中越两国历史上关系的密切，休戚相关，愈益增进今日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永远团结。同时，也加深我们对越南古典文学优秀传统学习的信心。

1961年9月于广东师院

^④ 越南文津：《越南的古典文学》。载《越南新闻》，1958年11月。

黎族原始社会初探

王 穗 琼

黎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人口共有四十多万，主要聚居在海南島五指山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境内。根据历史文献記載和解放后的考古发现以及多次的社会历史調查，充分說明了黎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少数民族，和祖国其他民族一样，也經歷了一个漫长的无階級的原始公社时期。现就文献、考古和民族学方面的材料，对黎族原始社会的面貌作一簡略的描述，并对黎族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若干問題提出初步的看法，以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于考古工作的重視，在海南島先后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遺址和遺物。特别是1957年夏天的一次考古普查，在海南全島就发现了原始文化遺址共135处^①，其中位于现今黎族聚居的地区五县（琼中、白沙、东方、乐东、保亭）即有57处。这些遺址大多数座落在河流两旁的山崗或台地上，一部分在沿海港湾的沙丘上。出土的器物有石器和陶器。在生产工具方面，有石斧、石磷、石凿、石鏟、石戈、石矛和石質或陶質的网墜、紡輪……等；生活用具則有陶罐、陶瓮、陶缶、陶豆……等；此外还有石环、石珠、陶餅、陶管、陶耳墜等裝飾物。石器中以斧、磷最为普遍，石网墜也較多，而石鏟却无发现。制法多为磨光，亦有少数打制的或仅磨刃部及器身稍加磨制的。有肩石磷、石斧、石鏟，有段石磷和有段有肩石磷、石斧等是比較普遍发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遺物。陶器中以夹砂粗陶比較普遍，几乎在每一处遺址中均有发现，其次为泥質軟陶，而几何印紋軟陶和硬陶則很少。这些陶器大多数为手制，只有火候較高的几何印紋硬陶部分是輪制的，印紋紋飾种类比較簡單。比較进步的夔紋、雷紋和各种組合紋則未有发现。从遺址的文化內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遺址出土的石器，有肩的較少，斧比磷多，陶器全为夹砂粗陶，这类遺址可能年代較早，属于

^① 广东省博物館：《广东海南島原始文化遺址》。載《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130頁。

新石器时代中期，約相当于中原殷周之际或者稍晚一些。一类遗址出土的石器，以有肩的比較普遍，磷比斧多，有肩石鏟較多见，陶片絕大部分为夹砂粗陶，也有少量几何印紋硬陶伴出。另一类遗址出土以几何印紋硬陶为主，也有一些夹砂粗陶片共存，未见石器。后两类遗址的年代較晚，可能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从地面和地层中，均发现有汉代的五銖錢，从这一情况来看，其年代可能会晚到两汉或者更后。这些文化遗址和遺物的发现，为研究黎族原始社会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資料。

二

我們知道，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而陶器的应用与初期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述原始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和大量磨光石器及陶片的发现，可以說明，当时在海南島上的黎族远古祖先已經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經濟生活了。他們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山崗和台地上，使用着装上木柄的石斧、石磷等工具进行着原始的“砍倒烧光”的农业生产。这种原始的鋤耕农业，也就是后来文献上所說的“刀耕火种”。直至解放前，黎族还一直保留着一种“砍倒烧光”的农业生产方法，当地称之为“砍山栏”。大約每年农历正月之后即开始选择“山栏”地（以树木生长茂盛，地面腐叶較多，土质黑色和比較松疏的为佳），到二、三月間便用鈎刀将山上树木砍下，等到枝叶杂草干枯后即放火焚烧（在有些场合仍使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引火），烧后再清除残枝，到雨后表土松软时就进行播种，男子用削尖的硬質木棍戳穴，妇女随后播下“山栏稻”（旱稻）种，不施肥，也不翻土中耕，只鏟除一两次草，到成熟时用手拈小刀一穗一穗的收割。从这种耕作情况我們可以推想原始社会时期的鋤耕农业，在当时使用石器工具的条件下，只能砍伐小片的树林或灌木丛，人們的生产规模是很小的，而且也只能以氏族为单位集体进行。

从文献記載和实地調查都証明，黎族的“砍山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黎族早期主要的农耕方式。根据现有材料考察，黎族从事水田耕作的鉄质农具和技术，都是后来从汉区传入的。黎族古老的民間传说，还保留着不少談到他們远古祖先从事“砍山栏”的故事。据調查，在山区的一些黎族中，如白沙县的白沙乡、南溪乡，琼中县的加峒地区，在百多年前还是不懂得耕种水田的，全靠“砍山栏”为生；解放前，山区“砍山栏”比較普遍而园艺极不发达，接近汉族的地区园艺比較发展而“砍山栏”則显著减少，这除了受地理条件影响之外，也反映出这两种农耕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与受汉区影响的关系。

饲养家禽家畜以及狩猎和捕鱼，也是原始社会时期黎族的重要生产活动。虽然在遗址里未有发现家畜的残骨，但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記載，汉代海南島的居民已經养有“五畜”，因此，原始社会时期黎族人民已經饲养各种家畜是十分可能的。在狩猎和捕鱼方面，从遗址多位于河旁、沿海港湾的山崗台地和沙丘上的情况来看，当时人們生

活在到处复盖着林木的丘陵地带，这是一个良好的打猎场所，而附近的河流、海滩里，有着丰富的鱼类和贝类，这对于捕鱼和捡拾贝介作为食料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从上述遗址所发现的石斧、石磷和石矛、石戈等，可能都是当时人们从事狩猎的主要工具。在海南岛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石箭鏃或骨箭鏃，只在文昌县凤鸣村的遗址出土少数的石箭鏃，这可能与当时人们多使用没有装上石鏃或骨鏃的木箭或竹箭有关。根据《岭外代答》和《广东新语》等记载，古代黎族所使用的弓和箭，都是用竹或木制成的。解放前，山区的黎族所使用的箭已普遍装有铁鏃（铁鏃有从汉区输入的，也有利用残破的铁质农具在当地加工制成的），但弓仍然用竹制或木制，同时还使用一种无鏃的木箭或竹箭来射鸟、射鱼和射小兽等，这可能就是古代使用木箭竹箭的习惯的遗留。

至于狩猎和捕鱼的方法，我们仅从文献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中推想当时的一些情况。北宋后期苏过所写的《夜猎行》中曾有关于当时儋州的黎族在月夜围猎的记述^②。《海槎余录》对于明代儋州地区黎族的狩猎风俗更有比较详细的描写：“黎俗二月十月则出猎……每数十村会，留壮兵一二十辈守舍，男妇齐行……遇一高大山岭，随遣人周遭伐木开道，遇野兽通行熟路，施之以网，更悉置弓箭熟嫻之人与犬共守之，摆列既成……纵犬搜捕，山岳震动，兽惊走下山，无不着网中箭。”这种集体围猎的方法，直到解放前仍然保留下来。在“合亩制”^③地区，集体围猎大多以村为单位来进行，出猎前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选定一位狩猎的领导人（称为“俄巴”意即“带狗的人”），并举行鸡卜或蛋卜来决定出猎的时间和地点。猎获物除了把头分给“俄巴”，把腿分给打中野兽的人以外，其余的就在集体狩猎单位内按人口或按户平均分配。“合亩”内的个别户或个人打猎所得的野兽，猎获者除留出头和腿之外，其余的一般也在“合亩”内平均分配。在捕鱼方面，从大量的形式多种多样的石、陶网罟的发现，说明了当时人们不仅使用弓箭射鱼，并且能够使用大小不同的鱼网来捕鱼。据调查，现在山区黎族捕鱼的方法除了上述的用网捕和用箭射之外，还有用钓钓鱼、用诱鱼笼捕鱼、堵塞河水用毒药毒鱼和用鱼炮炸鱼等方法。这些捕鱼方法当中除了最后一种是从汉区传入之外，其余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们从解放前黎族经常采集野生植物作为生活资料这一事实来推断，在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采集在黎族的经济生活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据调查，解放前在山区的黎族中，采集野生植物作食料仍相当普遍，除了主食之外，副食和佐膳的蔬菜，大多数都是采集来的。蔬菜的种植在黎族山区是近几十年才从汉区传入的。在黎语中，“蔬菜”与“树叶”是同一语词。山区的黎族农民，随便可以列举出五、六十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的名称，许多地方的黎族妇女每天外出劳动时仍在身上系一小竹笼，以便随手把采集来的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装进去。

② 苏过：《斜川集》卷二。

③ 见本文第五部分。

手工业方面，从出土陶片数量众多，陶器的器形多样，而且有些器形很大等情况来看，当时人们制造陶器的工艺是相当发达的。由于代表三种不同制作技术水平的陶系（夹砂粗陶、泥质软陶、印纹硬陶）的发现，说明当时制陶工艺经历了从手制、火候较低的夹砂粗陶到轮制为主、火候较高的印纹硬陶的发展过程。从出土夹砂粗陶比较普遍，而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很少这一情况来看，说明当时海南地区制陶工艺的发展比之广东大陆地区又是比较缓慢的。制陶在原始社会里是由妇女担任的工作。解放前，在山区一些地方的黎族中，仍然保存一种原始的制陶技术，较小的陶器用手捏的方法捏成陶胎，较大的则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陶胎，然后放在柴堆里烧成陶器。这些陶器都是素面的，也未有使用轮制的方法。制陶是当地妇女们的一种副业，男子不会制作陶器。

由于石制、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经掌握原始的纺织技术。纺织的原料是野生的植物纤维，用石、陶纺轮制成的纺锤捻成细线，然后用来织成鱼网，和用原始的织具织成布幅，以供缝制衣、被之用。解放前，在山区的黎族中，还保留一种相当原始的纺织工艺。当地的黎族妇女除了利用种植的棉花、麻类作为纺织原料外，还大量采摘野生的植物纤维如木棉絮和山麻等作原料，用一端装上几个迭起来的铜钱（这是石、陶纺轮的代用品）的小竹干作为纺锤，用两掌搓捻纺锤旋转，把纤维纺成细线，这些细线大部分用来织布，部分用来编织鱼网和其他的用途。织布的工具很简单，只有一块压板，几根横棍，妇女们坐在地上围腰而织，织成宽窄不等的布幅和花带，然后用铜针（原始社会时期则用骨针）缝成衣服、裙子、单被等等。从这种原始的纺织工艺中可以推想原始社会时期黎族人民纺织工艺的大概情况。

除了制陶和纺织之外，当时人们还制造骨器和简单的竹、木器等，同时编织竹、藤器也是相当普遍的。直到解放前，山区的黎族人民自制的木器仍以独木式为主，如木臼、木鼓身、猪鸡槽、织布工具盒子、凳子、棺材等等都是独木制成的，有些比较大型的独木器如木臼、棺材等的制作，还保留先用火烧焦然后进行刮削的原始加工方法。至于日常生活用的编织品如竹刀笼、鱼网、露兜叶席等各家都能自制。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黎族的远古祖先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取生活资料，需要把农业、狩猎、捕鱼三种生产活动结合起来进行，并且辅以经常性的采集活动。到解放时，黎族都是以从事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了，但还起着一定的作用。至于手工业不仅技术水平很低，从采集原料到制成成品都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而且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产品基本上只供各户自己消费而不是为了进行交换。这些事实给我们了解黎族原始社会的生产情况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线索。

三

上面我们对黎族原始社会的生产情况作了一般的描述，与当时那种极低的生产力水

平相适应的社会組織和生产关系，只能是生产資料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沒有阶级也沒有剝削的原始公社制度。

在海南島发现的代表年代較早的一类遗址，在年代上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就是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在未发现年代更早的考古材料以前，我們认为黎族远古祖先开始在海南島居住的时候，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的阶段。人們以血緣为紐带联结起来，組成以母系計算世系、妇女在氏族內处于当权地位的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是当时生产、分配和消費的基本单位。

氏族公社的成員过着共同的經濟生活，活动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这一范围内的山岭、河流、土地等都归氏族公有。宋代李燾編的《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三一〇记录宋元丰三年（1080年）琼管体量安撫朱初平对神宗的奏言，其中提到当时一些黎族地区的土地关系时说：“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記……”。可见土地公有制直至宋代在黎族中还有残存。

在母权的残余方面，文献上有一些关于黎族妇女担任首領和有着較高社会地位的記載。宋代周去非所写的《岭外代答》，曾提到南宋时琼山县黎族妇女首領“三十六峒統領”王二娘的事迹，說她是“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于財，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賜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④。这是否能說明母权的残余，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清代的《广东新語》、《洞谿紆志》、《琼黎一覽》等书^⑤曾記載过去一些地区的黎族內部发生糾紛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預或調解，就可以平息下来。根据在“合亩制”地区的調查，約五十年前，毛枝峒和毛道峒之間发生械斗，最后达成和解的協議时，双方还要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叫“蕊瓮”^⑥的和解仪式。从解放前毛貴乡发生的一些械斗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蕊瓮”和解仪式和由妇女作为使者传达通牒的情况。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社会上受到人們尊敬所遺留下来的风俗。妇女在社会上受到尊敬是由于她們曾經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直到解放时，在“合亩制”地区，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男女之間的自然分工，妇女們在农事活动中，担负着播种（在“山栏”地种旱稻时），拔秧、插秧、除草、收割等重要的工作。“合亩”进行一些重要的农事活动时，如插秧和收割，必須先由市头的妻子主持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仪式。

在婚姻和亲属关系及其他习俗方面，在調查中也找到不少母系氏族制的残余。例如在山区的許多地方，直到解放前还保留“不落夫家”的风俗，女子出嫁后不久就返回娘家，居住在村中的“寮房”里，可以随便和不同血緣关系的男子来往，不受社会輿論的

④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⑤ 屈大均：《广东新語》卷七，《人語》、《黎人》条。

陆次云：《洞谿紆志》上卷。

永不足斋：《琼黎一覽》。《琼崖黎岐风俗图說》第三十三图。

⑥ “蕊瓮”，黎語直譯为“給眼”，在举行和解仪式时，置若干銅錢于一盆清水中，双方当事人从清水中取出銅錢，互揩对方的眼，揩毕，对方接过銅錢往自己脑后抛掉，然后共同喝酒言和。

非議，这种风俗称为“放寮”（汉语海南方言），直到怀孕，才回夫家定居，从此婚姻关系才算是稳定的。这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对偶婚的残留。因为在母系氏族公社里，妇女固定在自己的氏族之中，按照对偶婚的形式，每个妇女分别招娶不同氏族的男子到本氏族内居住（所谓从妇居），但这种结合在当时是不稳固的，可以随时离婚。黎族民间故事中有兄妹结婚的古老传说，这可能是反映更早的婚姻形态。其次，解放前在琼中县的壟对地区，男子结婚时，必须在他的名字上加上自己妻子祖先所由出的各村任何一村的村名；在“合亩制”地区，黎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便回娘家和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亲兄弟照顾死了丈夫的姊妹的生活，被认为是一种义务；平时妇女不为自己的丈夫缝补衣服，但为亲兄弟缝补衣服却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妇女患病需要“做鬼”（作法赶鬼）时，须祈求娘家的“祖先鬼”，因为人们认为妇女出嫁后，在祖先崇拜方面仍然是和娘家“同鬼”；病重时，则要抬回娘家，死后只能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坟地里，埋葬后，娘家杀牛招待亲属喝酒，凡与死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丧期的一定时间内都要停止生产；死者的遗物归其亲兄弟所有。此外，解放前黎族人民还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互相通婚的习惯。某些地区的妇女在纹身和织绣衣裙花纹时以青蛙纹为主要而突出的图样（在原始社会时期，纹身和服装上的主要图样就是本氏族的一种标志），有些地区还习惯以动、植物的名称如水牛、芭蕉……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外婚和图腾制的残余。

在黎族地区长期以来保存着的被称为“峒”（黎语称Kom）的社会组织，从中也可找到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一些遗迹。解放前黎族地区一般都有“峒”的组织，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一如原始社会时期每一氏族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一样），一般以山岭、河流等为界，“峒”的疆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如有越界开荒、捕鱼、采藤和伐木等事情发生，往往会引起两“峒”之间的纠纷甚至酿成械斗。据“合亩制”地区的调查，最早同住一“峒”的人，都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他们除了对“峒”的疆界负有保卫的责任之外，彼此之间又有相互援助和保护的义务，特别是受到外“峒”人的欺侮时，必须帮助复仇。每个“峒”都有一个“峒头”，据说过去都是从群众中公推产生的，带有自然领袖的性质。根据《琼州府志》卷二十二，《海黎志八》记载，从明代开始，“峒”的组织已经逐渐演变为封建统治的基层政治单位，但是原始社会氏族制的一些残余形式仍然一直保留下来。至于同属一“峒”的人有着连带的责任和基于这种连带责任而产生的“峒”与“峒”间的血族复仇，在文献上很早就有记载了。⑦

四

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同时又需要经常与毒蛇猛兽作斗争，原始社会时期黎族

⑦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杀为人所杀，见仇家人及其峒中种类，皆擒取……要牛、酒、银乃释”

的生活是異常簡陋的。先談居住情況，目前在海南島雖未發現原始社會時期的村落遺址，但當時人們已經聚族定居是無疑的，因為人們已經以農業生產為主，有了固定的食物來源，這就使得定居生活成為可能。以氏族公社為單位進行生產和生活，也要求公社成員合群而居。至於居住的形式，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考古材料來說明。在保亭縣通什附近的一處山崗遺址的文化層中，曾發現十個大小不同的柱洞，估計是建築物的遺迹^⑤，但這種建築物的性質如何尚未明了。根據文獻上所謂“巢居洞深”、“巢居火種”的記載，宋代時黎族“屋宇以竹為棚，下居牲畜，人處其上”^⑥，以及解放前五指山中心地區尚保留着一種上居人下養牲畜的木架高腳船篷形房屋（這一類的房子在文獻上稱為“干欄”或“麻欄”，是流行於我國西南、華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一種住宅式形）來看，可以推想原始社會時期，黎族所住的房屋是用茅草和樹枝、竹枝搭蓋的一種船篷形的簡陋房子。這種房子可能建築在高樹之上，或用木柱作支架，地板離地面有相當的高度，後來進一步利用底層來放養牲畜。這樣的房屋結構對於海南島潮濕的氣候與避免野獸的侵擾都是很有好處的。

在飲食方面，當時人們的食料以農作物和漁獵品為主，但採集得來的食料也占相當的比重。目前在遺址里未有發現谷物的遺留，但從黎族在“山欄”地上栽種旱稻已有悠久的歷史，可以推測在原始社會時期，黎族食用的農作物當中，這種旱稻可能占相當大的比重；同時一些野生薯類也是當時重要的食料之一。從夾砂粗陶的發現，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普遍使用炊器烹煮食物，但烹飪的方法還是相當簡單的。解放前，在五指山中心地區的黎族中，還保留一些比較原始的烹飪方法。如以三塊石頭砌成的三足灶來煮食，在野外時有用竹筒裝米放在火里烤熟的，宰食獵物和家畜家禽，多用火烤除毛，小動物及魚類則連毛帶鱗放在火上烤熟。從這些事實中可以推想原始社會時期黎族的飲食習慣。

服飾方面，文獻中對於黎族的衣著曾有所謂“島夷卉服”的記載，這裡所謂“卉服”，應該是指用木棉、棉花、苧蕉、麻皮等植物纖維紡織而成的衣服，這在宋代王象之所撰的《輿地紀勝》中就曾經指出過^⑦。從石、陶紡輪的發現，證明王象之的看法是有根據的。至於衣服的式樣，《漢書·地理志》曾提到“郡（指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貫頭（顏師古注：著時從頭而貫之）”。這種中間貫首，無襟無袖，如“單被”狀的衣服，可能在原始社會時期就已經穿著了。直到解放前，在白沙縣的“本地黎”婦女的上衣中，仍然保留着這種“貫頭而穿”的特色。紋身和裝戴耳飾，可能是當時婦女們比較普遍的裝飾，因為在我國較古的文獻中，如《呂氏春秋》、《山海經》等，就有關於“雕題”、“斷髮文身”、“儋耳”等的記載。“雕題”是指刺紋在面額上，“文身”是指刺紋在身上，而山區的黎族婦女直到解放前還流行刺紋在臉上、身上和手脚上的習慣。“儋耳”又稱“離耳”，指“耳皆穿而縋之”，使“累耳下垂”，

⑤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海南島原始文化遺址》。載《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

⑥ 趙汝適：《諸蕃志》卷下，《海南》條。

⑦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四，《島夷卉服》條。

“垂肩三寸”^①。这种风俗，解放前在一些黎族妇女中还可以看到，但她們穿戴的是金属的大耳环，已經不是过去的石质或陶质耳飾了。又《后汉书·南蛮传》記載，东汉时属交阯刺史統轄地区（海南島也包括在內）的土著居民是“項髻徒跣”的，由此可以推断結髻于头頂的风俗（解放前山区的黎族男子还有不少結髻于头頂的，有些还有“大髻黎”之称），可能与“断发”（即剪发）的风俗一样，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經存在。从遺址中陶管、陶珠等飾物的发现，說明原始社会时期人們已經用这些东西来做項飾、腕飾了。

目前，考古材料中有关黎族原始社会人們的宗教观念和艺术方面的知識还很 不 充 分，但通过实地調查，我們发现解放前黎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仍然保留着不少原始的色彩，可以提供我們了解过去这方面情况的一些綫索。解放前，黎族的宗教信仰以祖先崇拜为主（男女祖先同样崇拜），但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仍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崇拜对象之中，只有善恶之分而无等級之別，它們之間沒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关系。除外围地区外，絕大部分地区尙未出现专业性的巫师。巫师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巫师虽男性占大多数，女巫师很少，但其中有一类男性巫师却被称为“娘母”，而且作法时也要穿女子的上衣，这可能是母系氏族制的一种遺迹。在“合宙制”地区，人死后，須按照生前男女自然分工的习惯在坟上放置死者生前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品，这可能是原始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在宗教观念上的反映，也是原始社会人們宗教观念的残留。

至于艺术和审美观念方面，从出土的石器表面光滑外形一般都很工整，印紋硬陶上印着各种紋飾这些情况来看，可知当时人們不仅注意这些日用器物的实用价值，而且也講究外形的美观。从陶制飾物的发现，也說明了人們对于人体裝飾的爱好。而紋身这种可能在原始社会已經存在的风俗，除了作为图腾和氏族标志的作用之外，还有美化外观的裝飾作用。宋代文献提到当时黎族妇女在脸上“涅为极細虫蛾花卉”^②，直到现在在某些地区的黎族妇女中还可以看到这些精細整齐的花紋。至于今天我們看到的妇女們織綉在衣襟上的美丽花紋，在竹、木器上刻着的几何形花紋，以及繪在大鼓皮面上的阴影式和写实体的动物和人形图象……等等艺术上的成就，如同黎族人民其他的艺术成就（音乐、舞蹈、民間口头文学等）一样，它們的历史传统也可以追溯到遙远的古代。

五

随着黎族祖先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結果，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发展，从而推动黎族社会逐步从母系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我們知道，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据研究，在海南島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中，有一部分在年代上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这类遺址出土的石器以有肩石斧、石磷比較普遍，大

① 《后汉书》卷六，《武帝紀》应劭注；又卷一一六，《南蛮传》。

②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型的有肩石鏟也比較多，有些石器磨制工整鋒利，双肩的折角成直角形，并且留有整齐明显的鏟痕^⑬；出土的陶器以印紋硬陶为主，或夹砂粗陶与印紋硬陶伴出。这些比較进步的工具和用具的出现，显示出这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水平比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有了不少提高。社会生产力总的增长促成了黎族原始社会从母系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轉變。按照原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母系氏族公社发展为父系氏族公社的經濟条件是鋤耕农业向犁耕农业过渡，以及畜牧业和农业开始了社会分工；在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方面，是金属工具的出现。但是在海南島黎族地区，这些情况在考古材料中沒有明显的反映。在海南島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遺址中，还没有发现足以說明犁耕农业已經存在的遺物，石鏟刀未见出土。在保亭县通什鎮附近两处遺址发现的两个形似石犁的石器^⑭，它的性质还未最后判明，同时也未发现有石器和銅器共存于同一地层的情况。而畜牧业的不发达和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經濟部門，則从文献記載和实地調查中都可明显的看到。由此我們推測黎族原始社会从母系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一定的特点，那就是这一过渡是在畜牧业不发达，金属工具尚未出现，鋤耕农业尚未向犁耕农业过渡的情况下实现的。当时由于鋤耕农业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烧垦地抛荒的年限不断縮短，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对于土地的修整和加工需要更多的人力，于是男子也逐步参加到农业这一主要生产部門中来，并且逐渐使妇女退居于次要地位，终于导致父系氏族制代替了母系氏族制而成为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

黎族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制的一些残余形式，我們在解放前黎族的“合亩制”中也还可以看到。在保亭、乐东和琼中三县交界处約一万多人口的地区，解放前以“合亩”为生产单位。“合亩”的规模不大，由二、三戶至一、二十戶有着血緣关系的家庭联合組成，但多数“合亩”已加入了外来戶，生产資料所有制已发展到以私有为基础。在生产方面，早已普遍使用鉄器，并以犁耕的水稻种植为主，但“刀耕火种”的“砍山栏”还占相当的比重。“合亩”內各戶的田地、耕牛由“合亩”統一使用。每一“合亩”均由血緣亲属中的男性长辈任“亩头”，领导“合亩”的生产、分配和对外往来等其他活动。“合亩”成員进行集体劳动，简单协作。在某些“合亩”中，收获物按戶平均分配。“合亩”成員遇盖房子和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員都有义务給予援助。从这些特点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原始社会父系家庭公社（家长式的氏族公社）的残余。至于长期遺存的一夫一妻制、买卖婚姻与“放寮”风俗的矛盾，非婚生子的承認与已經确立的父子继承原則的矛盾，反映在宗教观念上的父系祖先崇拜的出现，男性巫师穿女衣“做鬼”等等，都表示出从母系氏族公社制向父系氏族公社制过渡中不发达的父系氏族公社制形态的遺留。

⑬ 梁釗鎔：《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問題的探討》。載《考古学报》，1959年第9期。

⑭ 广东省博物館：《广东海南島原始文化遺址》。載《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六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有了剩余，交换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私有制的出现，这就促成了黎族原始公社的瓦解，并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目前我们对于黎族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社会形成的基本规律还缺乏系统的了解，现仅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从考古和文献的材料来看，黎族原始公社的瓦解与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铁器和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使黎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过程。

从整个广东古代居住的越族来说，早在商代（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前就和江、浙一带的吴、越族以及中原发生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八至三世纪）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关系更为明显^⑤。海南岛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方面的联系也十分密切。据《汉书·地理志》《粤地》中的记载，海南岛以出产珍珠、玳瑁等奇珍异物为中原所知名，并吸引了不少汉族商人前来贸易。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平定南越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之后，汉族人口迁入海南岛的比过去增加了，他们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岛上来，在沿海和河流出口的地方建立了居民点（这从汉代建立的郡县多采用“珠崖”、“玳瑁”、“紫贝”等海产的名称与郡县治所多设在近海近河之处可以得到证明），与当地黎族并肩劳动，开发着当时还是从莽之区的海南岛，并且通过贸易等方面的活动，进一步密切了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由于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传入，以及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加速了黎族原始社会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另一方面因地区和条件的不同，出现了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使这一过渡的进程，从总的来说，又是十分缓慢的。在岛北沿海地带与汉族接触较早的一部分黎族，社会生产力有了较迅速的提高，父系氏族公社在按照原始社会一般规律向前发展的同时，由于封建因素的影响，促使它更快的瓦解，并向阶级社会过渡。至于其余广大的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族聚居区，父系氏族公社却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其次，是黎族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的问题。下面三方面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1. 文献上缺乏有关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记载。虽然在宋代文献上曾有关于黎族首领著有奴婢，黎族内部有“贵贱”与“主仆（婢）”之分的记述^⑥，但是由于材料过于简略，对于当时的所谓“奴婢”的性质尚未能判明，特别是这些“奴婢”除了从事家内劳动之外，是否还从事生产劳动，这一问题未能得到明确的解答。

^⑤ 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广东原始社会初探》。载《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12期。

^⑥ 《宋史·蛮夷传》。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2. 考古方面，青銅器生产工具迄今未有发现。虽然在隋代的文献中，有“里僚鑄銅鼓”的記載^①，文昌、万宁、感恩等县的县志也曾提到当地曾有銅鼓的发现，解放后在黎族聚居的白沙县也收集到銅鼓^②，同时过去有些黎族家里还收藏有具有特色的“青蛙銅鑼”。但是这些青銅器究竟是当地黎族制造抑或外地运入，目前尚难判定。因为直到解放前，黎族是不懂得冶炼任何金属的，他們日常应用的鉄器、銅器均从汉区輸入。

3. 据調查，解放前黎族“合亩制”地区有人数不多的类似奴隶性质的“工子”，这种“工子”的产生多是由于卖身或抵債的关系而形成的，他們結婚之前居住在主人家里，担負“合亩”內的繁重劳动，并为其主人服各种劳役；結婚后仍然承担原先各項劳动，但可以参加“合亩”的产品分配，并可以拥有一定的生产資料和从事各种家庭副业。他們沒有人身自由，但是还没有发现主人随意买卖、杀戮“工子”的现象。此外，也没有发现在战争中掠人为“工子”的事情。由此看来，从解放前黎族的社会經济结构中，也找不到曾經存在过奴隶占有制度的明显痕迹。

根据以上情况，我們可以初步推断：当着黎族原始社会瓦解的时候，在当时与黎族密切接触的汉族已处于相当发展的封建制社会，加上郡县的設立，封建制度在黎族中的推行，以及封建王朝利用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領作为統治黎族人民的工具，加速了黎族內部的階級分化，因此，使黎族原始社会瓦解后有可能越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而向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黎族社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祖国整体的一个組成部分。所以，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經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封建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下，使一些原来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并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来信更正及补正

刘节教授来信，要求对本刊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和第三期发表的《孔子的“唯仁論”》两文作如下补正：第一期第42頁正文第5行“思想家董仲舒。”之后，应加“《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說：‘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第43頁第13行“张載說：”之前，应加“《礼运》篇說：‘敌人者，天地之心也’。”；第46頁第25行“《全唐文》卷789”之后，应加：“《四部丛刊·刘蛻集》”；第48頁第21至22行“所以有‘苗民勿用灵，則修文德以来之’的說法。”应改正为“所以有‘远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来之’（《論語·季氏》）的說法。”；第50頁第21行“孔子”应改正为“孟子”。第三期第43頁第20行“孔子”应更正为“子夏”；第48頁第1行“毋固”应更正为“毋固”；同頁第18行“孔子”应更正为“柳下惠”；第49頁第22行“不令而从；……虽令不行”应更正为“不令而行；……虽令不从”；第51頁第25行“皋陶”应更正为“皋陶”；第52頁第6行“所共守的超实际的原則性問題”应更正为“所共守的原則性問題”；同頁第21行“封建制度”应更正为“領主制度”。

^① 《隋书·地理志》。按：黎族族源属古代里僚的一部分。

^② 梁劍新：《海南島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第104頁。

华南师范学院举行第五届(文科)科学报告讨论会

华南师范学院自5月18日至31日举行第五届(文科)科学报告讨论会,这次科学报告讨论会,提出讨论的论文共29篇。

讨论会上发言热烈,发言的同志能针对文章的内容、作者所持的论点和所引用的资料、历史材料考证等等,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一般做到畅所欲言,贯彻了“百家争鸣”和自由讨论的方针。在各系的讨论中,都展开了对一些问题的争论,而凡是引起争鸣的论文,讨论总是比较深入,引起参加者的兴趣。

政治系讨论得较深入的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作者李匡武教授认为首先应从这两门科学的产生根源、客观基础以及它们的研究对象出发,然后才能说明两者在认识作用、适用范围方面的区别。两门逻辑科学的区别,客观方面的区别是根本的,主要的,主观方面的区别是派生的,次要的,因而,不能同意章沛在〈论“逻辑眼界”〉一文中关于“两种逻辑的区分,是‘眼界’上的区分,而不是任何其他区分”的说法。作者又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应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他认为章沛同志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实际上是把形式逻辑看成是形式主义逻辑,这是牵涉到对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性质的看法问题,有必要加以商榷。讨论会上广东师范学院林振环教授也发表了意见,他不同意李匡武教授的第一点意见,认为章沛同志所提的两门逻辑科学的区别,是“主观眼界”的区别,这是对的,因为逻辑的对象是思维,思维是主观的,第二性的,因而,区分两门逻辑也应从主观方面去认识。林振环教授对李匡武教授的第二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章沛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把形式逻辑看成为形式主义的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因而是错误的。这一问题讨论很热烈,有助于促进广东逻辑学界进一步开展百家争鸣。

中文系讨论的〈论文学教师世界观的改造〉和〈现实、理想、艺术典型〉等专题论文,是教师结合专业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果。在讨论中教师们畅所欲言。其他如〈〈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试论〉等论文,都是紧密结合专业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及学术水平都有帮助。

历史系讨论得较热烈的有谢振民教授的〈论中国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一文。作者认为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以封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他不同意史学家范文澜关于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形成为民族的看法,认为不能以汉族形成作为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基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民族形成的原因或标志,可以由中央集权的形成而推知民族的形成,而不能以民族的形成来论证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会者对谢振民教授这一论点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教师列举史实说明民族形成对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有作用的。也有的教师认为秦汉时期并非实行土地国有制,而是地主占有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这些问题引起到会者热烈讨论。该系讲师张寿祺的论文〈“季度”与“年度”的起源〉也引起教师们很大的兴趣。作者根据历史文献,从考古学、民族学 and 实际考察的材料,论证了“季度”与“年度”的起源,并从生产观点上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作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认为“季度”起源先于“年度”。这一论断,获得不少教师的赞同。但也有同志对作者提出了问题:根据史书记载,为什么历史上对于“年度”的正确认识先于对“季度”的认识?认为作者应对这情况作进一步的解答。个别教师不同意作者关于“季度”先于“年度”的看法,认为应该是先有“年度”才有“季度”。也有的教师认为人们对于“季度”与“年度”的认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是有所差异的,应根据不同地点不同条件加以具体的论证。

教育系讨论了方懋颐教授的〈美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外语系讨论了〈外国语教学法基本原则〉等论文。

该院的科学报告讨论会,经过为期10天的讨论,已于5月31日结束。通过这次讨论,检阅了过去一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各专业就有关学术上的专门问题进行了探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教学上一些实际问题,对一部分有关教材研究的项目,充实了内容,补充了新的材料,明确了教学内容的某些论点,对于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

学术研究

一九六二年第四期（总第四期）七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7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